

◎社 論◎

開放探親與 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

最近一個多月來，台灣最熱門的政治話題，不能不說是開放大陸探親。探親是一項人人所應享的基本的人權和人道，但是三十八年來，被海峽阻隔所封鎖的人權和人道，一旦恢復，其所包涵的意義就不止於人權和人道，而意味著造成海峽兩岸隔絕的政治意含已遭揚棄。

基本上，我們認為，三十八年來，海峽兩岸親情倫理的阻斷是由於世界二體制對立的結果；今天開放大陸探親則是世界二體制瓦解和重編的結果。這是不以少數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也是潮流的大勢所趨。

一九四九年以來海峽的阻絕來自雙重因素，一是國內的國共內戰，一是國際的美蘇對抗，而且國共內戰又聯繫上美蘇對抗，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的鬥爭密不可分。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實行「圍堵政策」，在二體制對抗下，美國的對台政策是：

——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

——宣佈「中美協防條約」。

——安排「舊金山和約」鼓動「台灣地位未定論」。

六十年代後，以被壓迫民族「天然盟友」自居的蘇聯漸漸走向擴張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為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付出慘重代價的中國人民，當然不能答應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至一九六九年，中蘇邊境終於爆發了武裝衝突的「珍寶島事件」，蘇聯在中蘇與中蒙邊境佈置大軍，進行軍事壓迫與武力恫嚇。於是中蘇共聯合抗美的二體制對立的陣營發生瓦解，而有「中（共）美關係正常化」到「中（共）美建交」以來之國際秩序的重編。

在重編後的國際秩序中的美國對台關係，就不能不聯繫上中（共）美關係，中（共）美關係愈深刻化，國民黨能對抗中共的條件也就愈稀薄。至今年三月五日，美國國務卿舒茲在上海發表談話謂：

『美國在上海公報內表明，我們的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無意遵循「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在上海公報內，美國重申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的關注，我們了解體會到致力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也是中國政府的大政方針。』

『這些一個中國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仍是我們對華政策的核心。儘管我們的政策一直不變，局勢本身却非如此，而且無法靜止不動。我們支持一個朝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持續演進的過程。』

『我們曾經歡迎那些包括間接貿易和有增無已的人員交流發展，這都有助於緩和台灣海峽的

緊張情勢。我們堅定不移的政策，在追求培植一個使類似發展足以繼續發生的環境。』

事到如今，美國不再要求海峽的阻斷，國民黨又有何能耐獨力阻斷海峽？再說清楚一點：美國已不願使台灣問題成為與中共關係發展的阻礙，又不願台海兩岸的關係發生突變（武力解決）的現象，只能在漸變的過程中，一步步的審慎觀察和掌握，以保證在發展過程中的美國最大利益。

所以，海峽的逐步開放是新的國際秩序下的大勢所趨，開放探親只是這一必然趨勢的第一步。至今才來宣佈開放探親，這是國民黨政策落後於形勢的表現。落後於形勢的政策只能顯現國民黨的被動與反動，為了順應潮流和形勢的發展，我們認為研議中的開放大陸探親政策應儘量放寬，而取消一切年齡和親等的限制。並且，應以開放大陸觀光為政策。其要點為：開放在台之外省人和本省人前往大陸探親、祭祖、尋根或旅遊，也開放在大陸之台灣同胞來台探親或旅遊。

我們知道，一切違逆潮流和形勢的禁制均將滯礙難行，所以，中國的政治哲學是要求『順乎天，應乎人』。否則國民黨能增加的不只是民怨，而損失的却是威信。

在開放大陸探親之聲中，我們要特別為因國家分裂受害最深的孤苦老兵呼籲：他們為保衛國民黨政權而奉獻了青春，又把退伍後的壯年貢獻給石門水庫、橫貫公路……，現在年老體衰，或給養於榮民之家，或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各角落。所以，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有責任輔助貧困榮民完成返鄉探親的心願，並且，對自願留在故鄉定居養老的榮民應繼續定期發放終身俸，直至其逝世為止。

三十八年來海峽阻絕，似乎使得朝野人士忘記了國家處於分裂之中。來台的國民黨政權早就「樂不思蜀」了，一心只想將台灣在公元二千年建設成一個已開發「國家」。在野的某些反對派，也從來沒有想起台灣之外還有大陸，甚至自以為可以透過「自決」而「台灣獨立」。

現在台灣有些人鼓動一種看法，以為只要一千九百萬具有共同的分離主義的意願，只要國民黨把目前「蔣獨」的實質換上「台獨」的招牌，使「台灣國」正式出現，就可以避免和大陸的糾葛。

這種主張，最早出自於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五角大廈的遠東戰略小組，但是，我們却認為問題沒有這麼樂觀。

國際法和國際協定本來就是國際的強權政治，分離主義者所樂道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是美國企圖分裂中國所製造的工具理論，在美國國勢如日中天，對台具有支配性權力時，尚不能取消中國對台的主權而達成台灣獨立的目的。勢移時轉，今天「台灣國」一旦出現，又如何能得到國際的承認和支持？

再者，要台灣一千九百萬得到「台灣獨立」的共識也很困難。雖然海峽兩岸阻絕了三十八年，但是，台灣與大陸的民族、文化、歷史等等深遠的關係，並不是三十八年就能完全疏離得了的。

從七月十五日宣佈解嚴後，與大陸有關的活動便突然蓬勃起來，除了海上漁民的交易外，各返鄉探親的團體紛紛成立，要想到大陸工商考察的團體也出現，林姓宗親會的祭祖團，媽祖的進香團，蘭藝團體的考察團，民謠採集訪問團，以及書攤上滿坑滿谷的大陸學術著作的出現。這種民間自發性的現象，在在說明了過去三十八年來，大陸與台灣的關係阻斷，是國際政治和國民黨的戒嚴體制所强行撕裂的，並不符合兩岸人民的民族、文化、歷史、經濟的自然發展。

雖然，國民黨至今仍口口聲聲宣稱，此次開放探親僅止於探親，而不包括旅遊、商業。但是，台海的和平是國際間所需要的，兩岸的交流也是民間迫切的願望，因此，我們認為探親決不可能只止於探親，而是海峽兩岸全面開放的第一步。並且，兩岸交流既有利於台海和平，也有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海峽

雜誌

The Channel

第五期

社論：開放探親與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

加州大學留學生：教育改革意見書

陳宗文譯：馬克思論資本主義

韓國六月民衆革命的軌跡與展望

韓國民主運動與美國對韓政策

韓國民主化的呼聲

特輯：韓國民衆革命的現況與未來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創刊

發行人 盧思岳

社務顧問 / 王津平 王杏慶 王義雄 李榮武

周合源 林孝信 林宗男 洪銘水

許登源 許達然 莫宗堅 陳映真

張曉春 黃溪南 蘇慶黎 李明杰

楊祖培 蔡仁堅 葉芸芸

社長 王拓

總編輯 / 杜崇仁

編輯委員 / 本刊編委會

主編 / 林新莊

執行編輯 / 彭知度

編輯部 /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11號10樓之1

電話 / (02)7012930 (02)7052635

發行所 /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0巷5弄7號4樓 111

郵撥帳號 / 1134151 2號盧思岳

零售 / 新台幣90元

長期訂閱 / 國內 / 全年新台幣900元 / 半年450元

國外 / 空運全年歐美地區美金55元

亞太地區美金51元

港澳地區美金47元

海外通訊訂閱處 / China Tide Association,

P.O.Box 1724, New City,

N.Y 10956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Tide Association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伍捌伍伍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231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交寄

中華民國76年10月出版

承印 / 龍祥印刷廠 台北市桂林路224巷26號

經銷處 台北 聯宏書報社 (02)5620282

基隆 宏恩書報社 (032)316843

內壢 國華圖書供應局 (03)4553456

中壢 志昇書店 (03)4251897

新竹 文強堂 (035)253101

苗栗 芙華書局 (037)320810

台中 全元書報社 (04)2700617

嘉義 嘉聯圖書供應社 (05)2354993

台南 永茂書報社 (06)2642655

高雄 麗志書報社 (07)3849410

屏東 環球書局 (08)7323071

宜蘭 民生書店 (039)323765

花蓮 花蓮文具店 (038)322941

台東 徐氏圖書文具行 (089)322267

目錄

海峽〈76年10月號〉

《社論》

1 開放探親與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

Correction
Page 0

《大學改革》

76 教育改革意見書 • 美國加州大學留學生

《海峽論壇》

78 對批評「新批評」的批評

——一個歷史主義的觀點

• 樓亮

《人物》

90 帝國主義是

我們最大的敵人 • 黃怡

——奧提佳由戰到和

《世界思潮》

97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馬克思(上)

• Anthony Brewer / • 陳宗文譯

《特輯》

4 韓國民眾革命的現狀與未來：

7 韓國民民主化的呼聲

• 高崎宗司採訪

本文訪問了二十位韓國政界、學界、宗教界、文學界、青年運動、勞工運動、女性運動的代表人物，發表他們對韓國民民主化的看法，頗多發人深省之語。

27 韓國民民主運動與美國的對韓政策

• Bruce Cumings

• DaVid Sadwhite

——「六月革命」後的情勢

美國研究韓國史的專家B. Cummings教授與華盛頓大學博士班研究生D. Sadwhite的對話，

揭露了美國操縱韓國政局的種種手段，

美國以「民主」、「人權」的守護神自居的偽

善面孔在本文中暴露無遺。

44 六月民衆革命的軌跡與展望

• 金淳一

• 安江良介

韓國民法學者金淳一與「世界」雜誌總編輯

安江良介，從韓國歷史透視「六月革命」

的成因，對美國、日本、韓國錯綜糾結

的關係、韓國四·一九學生革命、朴正熙的上台與

被殺、光州事件、勞工運動等，作了全面的

回顧與剖析，極有助於瞭解韓國

政治的癥結。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吾愛
他們的肩上繫著巾帶
他們的額際泛著汗光
他們的心中埋著燒炭
他們的眼神瞭望遠方

吾愛，他們即將出發
為一個繁花怒放的年代
為一個煙硝絕跡的國家
他們將前行，宛似長河

他們的腳底踩踏泥土
他們的手中緊握輪盤
他們要航向灰濛的海域
他們要回到溫慰的故鄉

那些年，禁忌在市井中流傳
好似埋伏天空的陰霾

那些年，兄長在異域流亡
臉孔都荒如灰漢

那些年，噢！吾愛
我認識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被封入地窖
冬夜，他被送往荒寂的孤島

啊！他們都有故鄉
如同你我一般，吾愛
如果你不去踩踏怒刺的蒺藜
流血的將是誰的胸膛？

他們在寒風中挺進
他們在遙遠的夢境中
播下葵花的種籽
讓春天驅走冬日的風寒

吾愛，他們就要動身
他們將拆落心中的灰牆
一如推倒高聳的石壁
讓虛妄的神話流散荒漠

他們的肩上繫著巾帶
他們的額際泛著汗光
吾愛，他們即將出發
結束一個漫長的惡魔

他們的心中埋著燒炭
他們的眼神瞭望遠方
吾愛，他們就要動身
開啓一道道禁忌的開門。

文·鍾喬 圖·蔡明德

讓海峽成爲你和朋友們 共同的精神食糧

透過海峽，你們的友情更踏實翱翔的天地更遼闊

優待本刊長期訂戶：
● 每本訂價90元，全年十二期特價900元
掛號每年另加120元

● 國外一律航空郵寄：

歐美地區 \$U.S. 55元
亞太地區 \$U.S. 51元
港澳地區 \$U.S. 47元

主 管： 經 辦 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郵局郵票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郵局郵票

●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手續費 次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第 1 1 3 4 1 5 1 - 2 號	郵局郵票
戶 名 盧 思 岳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郵局郵票

手續費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俾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朋友！你關心台灣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嗎？

請閱讀最具前瞻性、進步性、思想性、批判性的

海峽雜誌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國外訂閱費率·歡迎為親友訂閱

《海峽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新訂戶 續訂戶 雜誌郵款

從 年 月起訂閱海峽雜誌，至 年 月止。

訂閱(購)人(請用正楷填寫)

姓名：_____ 先生/小姐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郵政區碼：_____

郵寄方式：平寄 掛號(每年加120元)

年 齡：25歲以下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職業：公教 工商 金融 服務業 製造業
建築業 自由業及專業 學生 其他

教育程度：高中 大專 研究所以上

通信欄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費應以關於該此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換單另寫。

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 / 著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仄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劃撥 8 折



台北，台北！ 王拓 / 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練，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鬭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劃撥 8 折



金水孀 王拓 / 著

金水孀代表著漁村中張張飽受風霜的臉龐，佈滿了海水浸蝕的痕跡，映射著窮苦歲月的摧殘，給人深刻而強烈的震撼力。王拓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寫照，充滿了對貧困人家的解析，所有蠶蝕他們的愚昧、迷信、賭博、疾病和絕望，以及他們強韌的生命毅力。這本書中沒有少年的夢囈、沒有娘娘腔、更沒有自憐的感傷，充份表現了人性在現實中的掙扎與奮鬥，冷靜、客觀地揭開人類底真面目。

「金水孀」早被評論家譽為台灣鄉土文學中最傑出、感人的作品，已由新銳導演林清介拍成電影。

定價 150元

郵政劃撥 0784418~8王拓

◎南韓六月革命特輯◎

藝文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化

韓國 民衆革命的 現狀與未來

- ◎ 韓國民主化的呼聲
- ◎ 南韓民主運動與美國的對韓政策
——「六月革命」後的情勢
- ◎ 「六月民衆革命」的軌跡與展望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今年4月13日，韓國總統全斗煥，悍然不顧反對勢力的要求，擱置了修改憲法以行使總統直選制的提議，激起民衆強烈的不滿，6月10日更一意孤行的提名盧泰愚為繼承人，終於引發了連續17天，兩千一百多次的示威遊行，迫使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及其後台—美國讓步，於6月29日由盧泰愚發表「八項民主化宣言」，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六月革命」。這場迫使當權者及帝國主義者退讓的革命，在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中是難得的勝利。

韓國人民「六月抗爭」的勝利，決非倖倖。近百年來朝鮮民族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爭取自主的民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韓國的近、現代史，可說是以血和淚寫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朝鮮半島即告分裂，1950年韓戰後，南韓被置於美國的支配下，成了沒有自主權的國家。美國為了維護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利益，數十年來，極力深化南北韓的對立，並支持獨裁政權，打擊民主勢力，不惜策動軍事政變，扶植朴正熙、全斗煥成立軍事獨裁政權，以血腥屠殺鎮壓反對勢力。

南韓在六十年代初，採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策略，從而被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二十多年來，經濟發展快速成長，創造了所謂的「漢江事蹟」，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但這樣的經濟成長是靠軍事獨裁政權以暴力壓制勞工、剝奪勞工三權—團結權、爭議權、交涉權，强行壓低工資所達成的。此外，為了增強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韓國政府極力扶植大財閥，造成財富集中、貧富懸殊，加深了社會矛盾。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韓國人民展開了數十年的「民主、民衆、民族」的鬥爭。積數十年的血淚經驗，韓國民衆逐漸形成了幾項共識：①驅逐美國（包括日本）的外來支配勢力以求政治上的自主及經濟上的自立，②打倒軍事獨裁，實行民主。③改善勞工待遇，尋求勞動者的解放。這些共識凝聚成「六月革命」的幾個口號：「驅逐外來勢力，完成民族統一」、「撤廢護憲，打倒獨裁」……。

日本著名的「世界」雜誌，在今年的十月號，特別製作了「韓國民衆革命的現狀與未來」專輯，對韓國的「六月革命」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專輯中的文章，篇篇精彩可讀，限於篇幅，我們選擇了其中三篇。

「韓國民主化的呼聲」訪問了二十位韓國各界的代表人物，發表他們對韓國民主化的看法，頗多發人深省之語。「韓國民主運動與美國的對韓政策」揭露了美國操縱韓國政局的卑鄙手段，揭穿了美國的偽善面孔，「六月民衆革命的軌跡與展望」則從韓國歷史透視「六月革命」的成因，對一些重要事件作了全面的回顧與剖析，對當前的政局與未來走向也有深刻的見解。這些文章除了可供瞭解韓國之用外，相信也可給讀者不少啓示。—編者

◎南韓六月革命特輯◎

韓國民主化的 呼聲

■高崎宗司 採訪



楊淳植

統一民主黨副總裁、「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共同代表、一九二五年生。

「六月鬥爭是由於長久以來的犧牲、忍耐與鬥爭之後，所帶來的『朝向變革的偉大契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請簡單介紹一下您與金大中的關係。

楊：我的家鄉在忠清南道論山，1963年當選國會議員，其後擔任執政黨共和黨的財政經濟委員長等職務，但69年因反對修憲被開除黨籍。從那時開始，我就認識了金大中先生的才能，現在則一起行動。

您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楊：從長期來看，1969年為了讓朴大統領第三度連任而修改憲法，使他走向獨裁化。接著72年的維新政變，成立了世所未見的獨裁體制。自69年以來，韓國人民就與這種獨裁體制進行鬭爭，而六月鬭爭就是對此十八年來獨裁體制不滿的暴發。國民已無法忍受而要求能過像人一樣的生活。事實上，我們沒有言論自由、三權不分立、基本人權受到侵犯、貧富差距也愈來愈大。

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尤其是中產階層也參加了六月的鬭爭，這真可說是國民造反啊

！政府是無法想像到這種人心趨向的。

有趣的是，國民高喊政權和平轉移，而且採用非暴力的鬭爭，學生也如此。國民得到共鳴，步調一致，多數人且參加街頭示威所持的標語也是「遵守秩序」，沒有太過於激烈的口號。

我想，六月鬭爭是由於長久以來的犧牲、忍耐與鬭爭之後，所帶來的「朝向變革的偉大契機」。全體國民已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社會意識也提高了，所以今後，民主運動是不會潰散的啊！

您認為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的「民主化宣言」與美國的關係如何？

楊：美國政府承認全大統領四月十三日的護憲聲明，同時也希望韓國政府階段性地推行民主，可是碰到了這回的六月鬭爭，似乎使得「如果運動再繼續搞一個禮拜，政權即會崩潰，軍隊出來也難挽回大局了」。

據說盧泰愚說：「我自己當上總統，也不會在乎七年任期之事，早一點辭職也無所謂。」軍人和七年前也有所不同，有敏銳的判斷力，希望早點收拾場面，擁護盧泰愚。

■ 當前您認為什麼事最重要？

楊：選舉革命，也就是在大統領、國會議員選舉中求得勝利。

統一民主黨希望在不違背國民的期望下，為獲取政權而團結起來。

■ 參謀總長朴熙道曾說「金大中若出馬競選，也許會引起不幸事件」，這句話似引起爭議吧？

楊：這有必要澈查真相，追究責任。所謂實行

民主，就是要廢止軍人統治，他的話並非金大中個人的問題而已，這是冒瀆一般國民的發言，一定要查辦。如果不這樣，就是建立了民主政權，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不過我想絕大多數的軍人都已改變了，政治軍人所餘無幾了。

■ 勞工問題似乎愈來愈嚴重吧？

楊：目前也許問題很多，不過，我想會走向正常的。韓國勞工的學歷不低所以也有自制力，不會把公司搞到破產。工人相當清楚一般國民「遵守秩序而奮鬥」的想法。兩年前學生也是很激進，令人擔心，今天就不一樣了，工人大概也是同樣情況。



金德龍

統一民主黨總裁
金泳三的秘書長
、1941年生。

「美國原以為可以支持不具民意基礎的政府，等到韓國人民發出批判之時，美國為了維持在韓國的利益，就採取勸服韓國政府妥協的機會主義立場。」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請自我介紹一下。

金：我生於 1941 年。1964 年至 65 年反對韓日會談鬭爭高漲時，我擔任漢城大學學生會長，鬭爭委員會委員長，當時很活躍，不過我們所反對的，不是韓日邦交本身。今天韓日關係仍與當時一樣，國民與國民之間很少交流，只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癒合而已，我們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今天仍未解決。我擔任金泳三秘書長，是 1979 年的事。

■ 您對六月鬭爭評價如何？

金：這是我國國民向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要求直接選舉制的奮起行動。雖然尚未完成，不過在意義上，可謂是市民革命。

不僅是基層民衆（工人、農民及貧民），連中產階層也廣泛的參與，顯示了光靠鎮壓是無法維持政權的，政府不得不改

變統治的基本方針。

■ 比起一九六〇年推翻李承晚政權的四一九革命有什麼差別？

金：當時由學生領導，大多數的國民並未參加。因為市民意識尚未成熟。

■ 政黨也還沒有指導力量吧。

金：嗯，所以才會一片混亂。如今統一民主黨已扮演主導的角色了。

■ 您認為美國對盧泰愚的宣言的影響力如何？

金：美國以為可以支持不具民意基礎的政府，而等到韓國人民開始批判時，美國為了維持其在韓的權益，就採取勸服韓國政府妥協的機會主義立場。另一方面，我想盧泰愚在面臨了人民激烈的抵抗下，也認為除了妥協外別無他途。並不是盧氏與美國商量後才發表宣言，而是兩者個別有了一致

的結論。

■ 您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金：在於看清盧泰愚的「民主化八項目」是真正民主化的政治決斷呢？還是為面臨多數人民抵抗而採取的欺騙戰術？

從釋放被逮捕者的問題來看，並未全部釋放；從朝野政黨的政治協商來看，猶未見其對以前所做的事有所反省與道歉，而還想維持其政權。

■ 對於朴熙道的發言有何看法。

金：講這種話是不對的。不過這是私人發言，不是代表全體軍隊的公開發言。軍隊是否與民主運動敵對，恐怕還有疑問。正確內容不清楚，我們要求他澄清。

■ 工人問題似乎很棘手吧？

金：由於工人向來受到壓抑，權利沒有保障。不過，工人也有自制力，因為不自我節制，國民不會支持的。如果有充分時間對話，早晚會平靜的，我們也想從這方面來協助。

■ 金泳三總裁在七月十三日會見記者時，曾要求將在日韓國人政治犯、受統一革命黨

事件及南朝鮮民族解放戰線事件牽連者的長期政治犯，全部釋放。

金：像在日韓人之案，縱使真的是間諜，這也是國土分裂悲劇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另外，也有因燃燒著故國之愛而留學的。像李哲那樣，有未婚妻在長期痾等的人，我想，從人道層次上也應該釋放吧。

■ 國會議員選舉法的目標在哪裡？

金：一區兩人制（中選舉區制）是維新獨裁體制的產物，所以人民不承認，多數的國民希望一區一人制（小選舉區制），民主黨的想法也是這樣。

■ 金大中與金泳三的團結一致沒問題吧？

金：絕對沒問題，兩人的命運是一體的，所以不能分裂，假如分裂，意味著死路一條。

■ 請談談韓日關係。

金：由於日本與獨裁政府親近，韓國國民對日本的感情很惡劣。我的印象是，日本的報紙進入八十年代後半期已變質了，這或許也有韓國當局的壓力，不過希望不要屈服



芮春浩

前國會議員，一九二八年生。

「六月革命可以說是高呼「民族自主、排除外來勢力」的民衆革命。將獨裁連根拔起，匯集工人、農民、貧民及中小企業家的利害之聲來制定憲法，是重要的事」。

■ 您在 1980 年因「金大中一黨內亂陰謀事件」被牽連，後來出獄。出獄之後生活情況如何？

芮：我代表金大中派的一員，參加組織民主推進協議會。其後與文益煥等人一起行動。我反對組新韓民主黨，我認為多數人還受到限制的狀況下，民主化一事是當務之急。

■ 您對六月鬪爭評價如何？

芮：我想主要成員仍然是學生，不過可說是高呼民族自主、解放的民衆革命。七月九日參加李韓烈國民葬的二百萬人，口號就是「民族自主，排除外來勢力」。

■ 對盧泰愚宣言的看法如何？

芮：大家認為政府是被迫的，其中可以看到民主正義黨重組，計劃再掌權。

■ 您認為當前的課題是什麼？

芮：在「不許激烈勢力」原則下，選擇性的釋放，會造成新的亂源。我主張釋放一切在民主鬭爭過程中繫獄的政治犯，並應給他們復權。

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宣言以後，情況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發展。也就是說，並沒有符合民衆的要求，反而後退，有受騙的感覺。應該全面釋放政治犯以消弭隔閡，如果還有人被拘禁而進行修憲交涉，這樣也不太好。

將獨裁連根拔起，滙集工人、農民、貧民及中小企業家的利害之聲而制定憲法，也是重要的事。

■ 您今後將傾力做哪方面的事？

芮：我想設立研究機關，我在朴政權時代當執政黨共和黨的事務局長，碰過反對朴總統、執政黨改革的難題。後來被開除黨籍，此次入在野黨後，也瞭解到在野黨的難題，我想在八月與在野人士一起成立提出革新政策的研究機關。



文益煥

「民主統一民衆運動聯合」議長
· 前韓國神學大學教授 · 1918年生。

「六月鬥爭所產生的國民一體感，誰也摧毀不了。韓國人民是不會向軍事政權，也不會向美國、日本屈服的。」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 您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文：當時我還在拘禁中（七月八日釋放）。六月鬭爭是1985年5月12日大選（甫成立的在野黨新韓民主黨，獲得出乎意料之外的票數，而且在漢城、釜山都超過執政黨）延長綫上，通往革命的分水嶺，也可以說是為兌現民主支票的鬭爭，等獲得民主憲法時就告完成了。

■ 可是85年選舉的意義有那麼大嗎？

文：有的。那次的選舉，顯示韓國的民主化是無可避免的。表明了拒絕軍事政權、深信民主的國民意志活用了選舉制度。韓國的歷史告訴了我們選舉的重要性。1960年4·19革命推翻了李承晚政權肇因於選舉不公；1979年朴正熙政權的垮台源於其前年的大選。這次，在野黨所獲得的票數，超過執政黨1.1%。這次的選舉如果推翻了現在的政權，則是韓國人民第三次用合法的選舉推翻政權。

六月鬭爭所產生的人民一體感，誰也不能摧毀它。此時，如果你坐計程車，可發現司機也很強烈地希望民主，政府却不知道國民的政治水準已這麼高了。

■ 對盧泰愚宣言的看法如何？

文：這是人民迫使的，我認為這是暫時偽裝投降，想再掌權的企圖很明顯。

■ 今後的局勢發展將如何？

文：還在變化中，不過我很樂觀。

憲法是民主的根本。為了祭弔學生（李韓烈）之死，就有數百萬的市民走上街頭，為了憲法，將有更多的市民走上街頭的。

■ 對選舉的預測？

文：我認為會贏。這次比85年時有更多的時間。此外，85年的選舉與政權交替並無直接關係，也就是所謂的中間選舉。這次是政權轉移的選舉。我想農民這次會站在我們這一邊，連受到經濟成長恩惠的中間階層

這次也參加示威，所以未受恩惠的農民當然也沒問題了。農村的氣流已在變，我們有的是時間，我們打算努力使它變。

■ 六月鬭爭由「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所領導，這個組織與您所擔任議長的「民主統一民衆運動聯合」（民統聯）的關係如何？

文：在野黨代表人物也加入國民運動本部，它是包括各階層成員的集合體。民統聯也加入這個組織，竭力參與以國民運動本部為核心的運動。同時，我們也想要解決統一問題。

■ 對日、美的韓國觀有什麼看法？

文：美、日報紙無法評價韓國民衆的力量與民主意識，把參加李韓烈國民葬人數少寫成十至三十萬人。（民統聯機關報「民衆之聲」載二百萬名；韓國新聞「東亞日報」載一百五十萬人）。

■ 七月十四日「朝日新聞」晚報的「經濟氣象台」專欄執筆著者寫著「韓國政情陷於混

亂中」、「在重要的轉換期中，溺在近視私利中而讓不幸混亂持續自毀之事，歷史不乏其例。」我們也認為這些話帶有批評味道……

文：數百萬人參加示威也沒有發生混亂之事，但也有報載在野黨不斷提出新要求而釀成混亂，但事實上問題在於政府的允諾變成空頭。另外，新聞批評兩金競爭這一事，真是可笑。美國的新聞，也可看成是協助維持美國在韓的利益。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民主化，這是政治學ABC，然而，韓國却在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完成民主革命。

■ 您還有什麼話要說？

文：我的結論是：軍人無法搞政治。人民的願望不能被抹殺的，軍隊不能出動啊。韓國人民是不會向軍事政權，也不會向美日屈服的。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朴炯圭

「基督教社會問題研究院」院長、「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共同代表、1923年生。

「國民運動本部的課題在於捨棄自以為無所不能的妄想，總結國民的感受，創造出條件和組織，使國民運動本部隨時可以號召民衆，發起像「六月事件」那樣的運動。」

■ 六月革命有「和平革命」、「民衆革命」的兩種評價，你認為……

朴：是否可以稱為革命？或許在促使變化這一意義下，可以用「革命」一詞，而這種變化，僅是軍事政權受到民衆的壓力而舉白旗而已，實質上的變化是從此開始的。

六月鬭爭，是長久以來受壓抑的民衆的不滿之爆發，其程度出乎「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的預料。我們也沒有真正認識到一般國民的意願。當然，政府似乎也沒想到民衆暴發了這樣的事。據說，六月

初，催淚彈有四十萬發，到了六月二十六日，已用盡了三十六萬發，因此，政府就舉手投降了。

■ 國民運動本部似乎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吧？

朴：大家對國民運動本部的期待太大了，可是它的力量沒有那麼大。國民運動本部也不知如何來總結六月鬭爭，以及今後如何結合衆人力量。國民運動本部的課題在於捨棄自以為無所不能的妄想，而總結國民的感受，創造出條件和組織，使國民運動本部隨時可以號召民衆，發起像「六月事件

」那樣的運動。八月四日所召開的國民運動本部第一回全國總會議，就是我們所邁出的第一步。

■ 請介紹一下今後的方針。

朴：我們的方針是用選舉來完成民主革命，開始為公開、公正的選舉作準備。假如政府不履行諾言，也就是不辦選舉的話，我們就組織像六月那樣的抵抗，打倒現在的政府。

■ 選舉似乎會贏吧？

朴：我想會贏，不過，對方有金錢、組織力與宣傳力；也有人因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的宣言而放了心；中產階層也有要求安定的，甚至還有人說：如果能維護民主的話，軍人也可執政。

■ 您所屬的韓國基督教協議會（KNCC）預定怎麼做？

朴：在政治上我們堅持中立，不過會積極爭取民主憲法。由於現在的憲法是政變（光州屠殺）中所製定的，所以NCC公開聲明反對護憲。我們有很多的牧師在此間以斷髮和絕食表明這個意志。

■ 基督教電台已開始不理會政府的禁令，逕自播送新聞吧？

朴：這是最容易使一般人響應鬭爭，而且也是為民主爭取言論自由的出發點。

■ 國民運動本部位於基督教會館的三樓，而各地的國民運動支部大部份也像這樣嗎？

朴：是的，NCC的牧師在國民運動支部中心工作，成為支持實質運動的主體。

■ 對南北韓統一問題的看法如何？

朴：我想，沒有教會來領導是不行的。

■ 請談談勞工與農村問題……

朴：在政治上我們將努力反映這些基層民衆的生存權利。

■ 對日本人是否有話要說？

朴：問題在於很多人太過於重視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政府或美國軍隊對韓國的控制力。國民力量是很重要的，請認識這一點。你們不是有很多人認為「韓國人由於在封建制度及日帝的統治下，習慣於獨裁，所以捨軍人領導外無他途嗎？」

民衆是很賢良的，在韓國有提倡「人即是天」的東學，也有「人心即天心」之諺，這是民衆的基本哲學。韓國是以信賴民衆、國民而立國的。在日本有武士帶刀統治，但韓國這樣的歷史很短。而且，韓國的歷史上，也有如壬辰之亂（文祿・慶長之役）與丙子胡亂（清朝入侵朝鮮）時，統治者逃亡而民衆抵抗之例。

■ 您擔任院長的基督教社會問題研究院所編輯的「六月民主化大鬭爭」（民衆社刊行），書店已擺出來賣了。

朴：這本書是為應如何看待六月民主化運動而費心寫下的，請務必參讀。



桂勳梯

「民主統一民衆運動聯合」副議長，「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共同代表、1912年生。

「日本不希望現政權被其他勢力取代，我認為抗日運動今後也許會繼續。」

■ 您對六月鬭爭評價如何？

桂：我認為這是民權運動的勝利。在獨裁政府

之下，大家都受到不能忍受的壓迫，已到其界限了。

■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

桂：軍隊問題，因為軍隊是日本軍國主義所留下來的殘渣。

■ 您認為民主化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桂：釋放全體政治犯，並讓他們復權。工人問題也很重要。

■ 請談日本人的韓國觀。

桂：日本政府、輿論界都不行。與日本殖民統治韓國的時代一樣啦。日本不希望現政權以外的勢力建立政權。因此，我認為抗日運動今後也許會繼續吧。



咸世雄

神父、天主教漢城大教區宣傳部部長、1942年生。

「朴鍾哲被刑求致死，使一般人民深信現在的政權是殺人政權。無力的學生之死與耶穌之死有一脈相通之處。我們想為維護人性尊嚴，及為被壓迫的人貢獻一份心力。」

■ 總統於四月十三日發表不修憲的談話後，光州的神父馬上實行絕食。

咸：絕食波及全部的十四個教區，共有三百四十名神父參加。全部的神父有一千多位，故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信徒及修女也一起禱告，在這個基礎上，神父的絕食也宣告成功了。

■ 六月鬪爭，天主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咸：今年一月發生朴鍾哲刑求致死的事件，我想這是決定的契機。以前也有刑求致死的事，不過都不了了之，但這次却證據確鑿，因此，一般人民深信現在的政權是殺人政權。五月，天主教揭發刑求致死的犯人被頂替之事，再度暴露了當局的不道德，長久忍耐的國民因而覺醒，而產生劇烈的變化，人民開始指責，無力的人們也一心一意地禱告。

六月十日的和平大行進，是歷史性的大日子。由於民正黨在漢城車站附近的希爾頓飯店舉行推選總統候選人，所以警備重點也放在附近。託此之福，明洞天主教堂附近的警官很少，因而我們得以佔領教堂，呼籲打倒軍方。佔領教堂至十五日，但午休期間，在教堂附近工作的市民都圍

集過來，並送飯來。

■ 六月十五日警察撤退後，韓國新聞也大加刊登吧。

咸：爲了對付催淚彈，也有人採取投擲石頭及燒夷罐的暴力，不過我們勸止他們這樣做，撤去防禦物，並說服學生，叫他們安全返家，也勸導學生仍應返回學校才對。其間，約有一萬名的警察結集準備鎮壓，但教堂內表現的相當穩靜，所以警官隊並沒有侵入教堂裡面。因此他們聽從我們所說的政府若讓步，學生也會讓步的勸告。

■ 對六月鬪爭的評價如何？

咸：我認為這是朴鍾哲之死所帶來的神意。無力的學生之死，與耶穌之死，有一脈相通之處。我想評價的是，六月鬪爭，終在犧牲者不多的情況下，得以宣告結束。

■ 對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的宣言看法如何？

咸：民主化八項目的內容不錯，可是却沒有實行。政府方面，有穩健派與強硬派，強硬派在阻礙著，不能真正實行民主。民主很簡單，政治家須接受國民的意志，且必須舉止正直。盧泰愚的民主化八項宣言，應受世界讚許。可是這八項目，是我們二十年來所不斷主張的，如果盧泰愚到現在還

不知道這些民主化的重要性，那麼就沒有資格當政治家了。盧泰愚如果謙虛地承認以前所犯的錯誤，在國民面前請求原諒與贖罪，他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

政治犯也要全部釋放才好。如果還想把他們當成人質，那麼民主也是空話。

■ 天主教目前想做的事是？

威：我們想為維護人性尊嚴，及為被壓迫的人

貢獻一份心力。正義暨和平委員會、實現正義全國司祭團以及平信徒一起不斷禱告。每週禮拜五舉行彌撒，為民主及人權而禱告。

在韓國，由於以前發生了不少次的不公正選舉，所以也要開始建立監督選舉的體制。



李泳禧

漢城大學教授，
專攻國際關係，
前「朝鮮日報」
外電部部長，19
29年生。

「盧泰愚宣言是美國導演的一齣戲。美國強迫全斗煥總統，全氏再令盧氏發表宣言。盧氏不是能搞政變的人物。」

■ 對六月鬭爭評價如何？

李：這是繼東學農民革命、三一運動之後的民衆力量的發動。

■ 您為什麼不提 1960 年的四一九革命？

李：四一九雖然也很重要，不過是以學生為主。從民衆的角度來看，無法與這次的鬭爭相提並論。

■ 有人認為六月鬭爭是「民衆革命」呢。

李：不能說是革命吧，因為民衆所掀起來的力量在中途就挫折了。美國為了維持現在的政權而加以干涉，使新興的勢力保持平衡。如果示威再持續兩個禮拜，搞不好會變成革命也不一定。

不過，不讓「光州（屠殺）」事件重演的功績，這點是可肯定的。

■ 盧泰愚宣言與美國的關係如何？

李：盧泰愚宣言是美國所導演的一齣戲。美國強迫全斗煥總統，全氏再令盧氏發表宣言。盧氏不是能搞政變的人物。

■ 軍方如何看待六月鬭爭？

李：據傳六月十九日指揮官會議上，有種種的意見；如：應正確面對民衆力量；雖有必

要出其不意舉行政變，但今非時機；不願與「光州事件」的指揮者視為一丘之貉、不要背離國民、軍方若叛亂則會分裂，等等。不過，最後軍方並未出動。

■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李：推行民主化的主導權在舊政權手上。他們握有政、軍、傳播工具及警察，舊體制力量的基礎也在這裡。或許有必要再動員民衆，這次的鬭爭，學生與市民的力量再度被肯定，不過工人却未參加，因為他們受到鎮壓，不過今後似會參加的。現在（七月三十一日），現代重工業及大韓造船公司等大財閥企業中，也開始罷工了。

■ 50 所大學，1530 位教授參加了要求修憲的聲明，比起去年參加同旨趣聲明的人數多了一倍以上，這是否表示運動的擴大？

李：情況變化到連從沒有參加的人也參加了聲明。不過這種變化，大學教授的貢獻很小。重要的是，韓國大學教授很多是從美國回來的，但這些人之中，對美國的認識多少都產生了變化。

■ 您在七月六日的「東亞日報」上寫的那一

篇「機會主義與知識份子」，批判到一部分知識份子急速轉變為民主主義者，反應如何？

李：以前我也隨手寫了一些文章，但從來沒有像這次反應這麼熱烈的，很多人寫信或打電話來鼓勵與感謝。知識份子不能見風轉舵當機會主義者的。

■ 您已經很久不在「東亞日報」寫文章了吧？

李：七年了。韓國的報紙也正在小幅度的改善中，但仍然必須改善狂信反共主義及拒絕民主化的體質。報社的財閥化也是一個問題，財閥化，則會變成反民主，對於勞工問題的報導也會變成反民衆的。

■ 您曾擔任「朝鮮日報」外電部部長，現又

當新聞傳播系的教授，日本對韓國的新聞報導你覺得如何？

李：大多是不能洞見本質的膚淺報導，僅注意到經濟成長而忽略階層結構的變化，也可以說是光注意既得利益層，而沒有看到社會的矛盾面。日本雖然言論自由，這點却令人扼腕，我認為這樣沒辦法建立良好的韓日關係。

■ 您對韓國學生的看法如何？

李：學生幹的不錯，可放心將未來交給他們。據說走出校門參加勞工運動的學生有二千數百多人，實在讓人熱淚盈眶。

■ 兩金是否會團結一致？

李：有國人在監督，一定會的。



成來運

延世大學教授，
專攻教育學，「
民主教育實踐協
會」共同代表，
1926年生。

我想清算親日、親美的教育，推展民主教育及愛民族的教育。」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成：這是市民響應學生所主張的民族自主路線的非暴力民主革命。

■ 四月以來，各大學的教授先後發表要求修憲的聲明，為什麼會這樣擴大呢？

成：現在的憲法，是光州屠殺後，所制定的與國民無關的憲法。學生為了反抗不惜走入監獄，但教授却隔岸觀火。不過，教授畢竟還是有良心的。這次的行動，是以年輕教授為主，出乎意料的，參加的人相當多。

延世大學教授的聲明上，我也簽了名，但在記者會上却擅自刪掉了我的名字。我表示抗議，但年輕的教授說「成教授在以前曾遭解聘入獄，為了以後不要讓他冒

這種危險，所以我們把他的名字拿掉。」

■ 您認為當前什麼事情最重要？

成：把學生一律釋放，並使他們復學。學生幹部因主張民族自主路線，被判違反國家安全法而遭逮捕，但他們都是由一般學生依民主程序所選出來的，是學生代表。應該停止把這些學生罵成是反美主義以及誣陷為親共者。

到了九月，釋放問題應是學生運動的中心課題吧。

■ 民主教育實踐協議會有什麼樣的活動？

成：我們出版像「民族與教育」、「教育與實踐」等等的機關刊物，也要求釋放被拘禁者，使被解聘的教師復職，同時，我們也準備組自主性的教師團體。

■ 據說已成立了追求「民主化」的全國教授協議會？

成：這是以少壯教授為主所組成的。

■ 最後，您還有什麼話要說？

成：我想清算親日、親美的教育，推展民主教育及愛民族的教育。



李愚貞

「韓國女性團體聯合會」會長、
「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
共同代表、1923
年生。

「為了消弭男女、階級和國與國之間的差別，我們與其他的民主運動協力前進。」

■ 對六月鬪爭的評價如何？

李：新聞、雜誌把它寫成「和平革命」，它的最大特徵在於不用暴力。市民，尤其是女性向要投擲汽油瓶的學生呼籲「不要用暴力」，並向施放催淚彈的警官高喊「不要放了」。所以當局才手足無措，使運動擴展開來。雖然政府仍未被推翻，但或許仍可以說是「革命」。

■ 您對朴熙道參議總長發言的看法如何？

李：很不安，而且很恐怖。軍方強硬派是只要有口實就會發動政變的。但是我們不會害怕，我們會團結起來，不管任何犧牲，也會阻止軍人介入政治。如果朴熙道真的要這麼說，我們打算發動國民運動逼他辭職。

■ 六月鬪爭中，女性相當活躍，請介紹一下在此之前女性所做的事。

李：韓國女性運動主要分成兩個潮流，一是主張男女享有同樣的權利，另一是主張揚棄差別待遇的社會。我們的女性團體聯合屬於後者。為了消弭男女、階級和國與國之間的差別，我們與其他的民主運動協力前進。在工廠等地方，男性領班常利用地位強迫女性與其發生性關係，若不順從則施以虐待，可是這方面，男性，包括從事民主運動者，都沒有把它當做嚴重的事，所以在民主運動中，女性也受到了差別待遇

，我們也將努力修正這種傾向。

■ 今年你們做了什麼事？

李：今年一月，我們在對共分室前示威，抗議朴鍾哲被刑求致死。我們很快地召集人到大家都懼怕的地方去抗議，仍有大約百餘人參加，我們都有全部被逮捕的覺悟，幸好他們不抓人。我們也為因結婚而被強迫退職的女性爭取復職，另外，我們為要求提高工資、承認工會而遭解僱的十八名女性展開運動，迫使僱主收回解僱成命。

四月十三日總統宣言護憲後，我們發表了三、四次的反對聲明，也在基督教會館靜坐抗議。五月二十七日，我們參加了「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的組織。

■ 六月鬪爭中，妳們領先喊驅逐催淚彈……

李：說來真慚愧，我們受到電視的影響，也指責學生投擲汽油瓶及石頭。可是參加六月鬪爭時，在現場直接受到催淚彈的攻擊，才開始想到汽油瓶、石頭等等不能說是暴力。催淚彈的破壞力很厲害，調查結果顯示，催淚彈可以說是殺人彈。所以，六月十八日開始以女性為主，展開了驅逐催淚彈的運動，在市政府及延世大學前舉行示威。我們一邊說：「你們是我們的孩子，延世大學生是我們的孩子，你們與延世大學生是兄弟姐妹」，一邊走向警官，在他們的胸前插上康乃馨，警官也說「謝謝」

、「請你們努力，讓我們以後不必再施放催淚彈」，他們沒有向我們放催淚彈，也沒有抓人。

這個運動，第一，在維護國民的生命與健康，第二，使依靠催淚彈來維持政權不能再使用催淚彈這個武器，所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六月十八日參加示威者有五至十萬人，二十六日則增至一百三十萬人，我認為我們都有所貢獻。

■ 據報載，聽說女性在七月二十九日集會，召開憲法聽證會。

李：女性的人性化與社會的人性化，是直接關聯的。為了使憲法有關女性的條項能更好

，我們也會在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的憲法草案上，反映女性的意見。我們以前也一直進行像改革家族法等運動，今後將繼續推行。此外，像辛仁鈴（梨花女子大學理助教授）小姐等的年輕女性憲法學者也正在努力中。

■ 年輕女性中也有激進派嗎？

李：延世大學所召開的二萬人集會，照我的看法，革命團體在其中僅有六十名左右而已吧，大部是穩健的進步派。在三、四十歲的女性活動家中，激進派的比率也大致如此。



李效再

梨花女子大學教授，專攻社會學、女性學，1924年生。

「六月鬥爭中，每天有六千至一萬名的學生集會示威，最近，學生將南北分裂的苦難視為切身之痛，非常激動。」

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五月十八日，李教授與十七名梨大教授發表時局聲明，一般的梨大學生動向如何？

李：六月鬥爭中，每天有六千至一萬名的學生集會示威，相當大眾化。最近，學生將南北分裂的苦難視為切身之痛，非常激動。

■ 對六月鬥爭的評價如何？

李：我想已到無後路可退的地步了。

■ 對盧泰愚宣言的看法？

李 1960年的自由黨，79年的共和黨，都隨著李承晚、朴正熙的下台而崩潰。這次他們企圖避免重蹈覆轍想安然過關，而不得不發表此宣言。所以當權者仍安坐其位。金錢、官僚機構、軍事力與警察力也都在他們手中。

■ 目前最重要的事？

李：釋放被拘禁者。有位母親說：「女兒被警

察抓走，我想這個家就完了，可是聽到女兒在法庭的陳述後，我實實在在地感到民族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民主化問題，也是我們女性的問題了」，因而以女兒為傲，這實在是令人驚訝的變化。

■ 對於今後的看法？

李：運動不會中斷，也會完成南北統一。選舉的勝利，有賴於我們的努力。萬一輸了，也不能再往相反的方向走，我很樂觀。

■ 請介紹一下女性界的新動向。

李：以前的女性運動，是以領導人為中心，現在則是以會員為中心，且呈現多樣化，我們也面對民衆生活中所提出的問題。為了改革憲法與民法，前日我們召開了聽證會，也組織了韓國女性團體聯合，出版「民主女性」機關刊物，敬請閱讀。



• “民主化的問題，也是我們女性的問題！”一位韓國女性向鎮暴部隊獻花

某氏

(女性運動家)

「中產階級中，很多人誤以為工人運動是革命運動，視鎮壓為理所當然。我想有必要多作啓蒙運動。」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有人把六月鬪爭評價為「民衆革命」……

某：我不這樣想。我認為市民形成反獨裁的聯合戰線參與鬪爭，隨著時間的發展，許多如工人、農民等等的階層也參加，但仍停留在市民運動的水平上，對軍事政權並未完全勝利，指導權仍一成不變的掌握在軍事政權的手中。我想這次的選舉相當重要。

■ 女性在憲法聽證會上討論些什麼問題？

某：討論關於男女平等的條文，尤其是僱用平等一事。我們還提案增設「女性勞動者不應受雇用、薪資及勞動條件等的差別待遇；母性及育兒得享有受國家特別保護的權利」、「為廢除犧牲女性的一切政策、習慣，國家須採取適當的措施」的條文。三十年來一直進行改革家族法的運動，今後

也要繼續走下去。

■ 女工的爭議也發生了嗎？

某：在裡里的工團，有間洋裝公司發生了女工的爭議，而向民主黨投訴，但新聞並沒有報導。

■ 請說明女性團體聯合。

某：它成立於今年的二月十八日，七月十日出版「民主女性」機關刊物，所以我想你看就可以知道活動情況了。女性解放與民主化的政治鬪爭結合在一起，是最大的特色。現在雖以漢城為主，但我們想把它擴展到各地。我們應把女性勞動者組織起來，完成廢除勞動關係惡法，可是一般人認識不足，很麻煩。中產階級中，很多人把工人運動誤認為革命運動，視鎮壓為理所當然。我想有必要多作啓蒙運動。



宋建鎬

「民主言論運動協會」議長、「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共同代表、前「東亞日報」總編輯
· 1927年生。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宋：有人認為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是一個很大的組織，事實上不是，但是百萬人響應了本部的呼籲。1969年憲法修改成可再連任以來，國民已無法忍受十七年之間的獨裁苛政，這是鬱悶的爆發。

■ 有人視為「革命」。

宋：不能說是革命的，「革命」是御用言論使國民滿足於此所用的語詞。

■ 美國的壓力對盧泰愚的宣言有作用嗎？

宋：不錯。不過美國壓制軍方，並不是希望韓國民主化，只是因為美國人不希望韓國人認為美國承認軍方的干預而已。

■ 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宋：最大的課題在於：釋放全部的政治犯，使其復權，並取消通緝。迄今仍被依國家保安法拘禁的人，是否可視為共產主義者？這一點政府與我們的意見對立。其次是修憲。

■ 對朴熙道參謀總長的發言看法如何？

宋：這不是個人的發言，是代表軍方的意見，使人覺得其背後有很大的勢力。若發動政變，雖然會死數千人，但奧運就不能舉辦，接著經濟混亂，政權崩潰，民主化就會到來，有一些年輕人希望這樣的發展，但我們年紀大的人不希望發生這種不幸的事件。

■ 勞資糾紛似乎已經發生很多件了？

宋：有人說九至十月是危機的時段。勞工是低薪政策下的犧牲者，所以要求提高薪資絕

「只要南北繼續軍事對立，民主就不會安定，但如果民主化了，和平統一就為期不遠了。日本政府不希望韓國南北統一，它想個別操縱南北韓，我對日本真正失望。我希望日本能理解我們這種分裂之痛以及對統一的強烈願望。」

不過分。

■ 民主言論運動協會最近做了什麼事？

宋：我們把機關刊物「小道消息」從不定期改成週刊，我們也計畫進一步改成日刊，但需要數十億的韓幣及若干時日。我們也要解決出版自由的問題。

■ 您對日本報紙對韓國的報導有什麼感想？

宋：以前還有同情民主運動的特派員，但兩三年前就變得非常冷淡了，不大報導民主運動的消息而支持軍事政權。去年發生了三位離職記者與現任記者揭發韓國政府發報導方針給各報社而遭逮捕的事件，當時，我期待日本也會加以報導，可是却被抹殺了。

光州事件以後，韓國國民批判的矛頭揮向美國，反日感情淡化，不過早晚還會發生反日運動，要瞭解：如果日本報紙不多報導民主運動、不批判日本再進出韓國，日本的言論機關遲早會站不住腳的。

「朝日新聞」以大篇幅刊載戰前日本的新聞箝制，但却不報導現在韓國的新聞箝制。（最近已報導）如果我批評歐美的言論界人士或外交官，他們不管同意不同意，都會說聲謝謝。但若批評日本的言論界人士或外交官，你們就會不高興，度量真小。我也曾向日本的言論界人士或大使館人員忠告「不要只和政府系的人會晤，也應該與更廣泛的人接觸，美國的言論界人士及大使館人員不也是這麼做嗎？」，可是就是聽不進去。我不禁懷疑日本的民

主義難道是假的嗎？由於允許這些虛假言論橫行，我們不得不懷疑日本的市民運動是否也是假的？

■ 今後也會發生統一問題吧？

宋：只要南北繼續軍事對立，民主就會不安定，但如民主化，和平統一為期就不遠了。日本政府不希望和平統一，它想個別操縱

南北韓。我對日本真正絕望，只有「世界」雜誌與從事於日韓團結運動的人，則帶來了一絲希望。

除了學生以外，最近我們同志之間也使用如「分裂四十二年」的年號，我希望日本人也能理解我們這種分裂之痛以及對統一的強烈願望。



金承均

「出版文化運動協議會」會長、
「民主運動遺囑協議會」總幹事
· 1939年生。

■ 您是1960年四一九學生革命的領袖之一，這次的鬪爭，比起四一九如何？

金：政權沒被推翻，所以比不上四一九。盧泰愚發表宣言後，很多人高呼萬歲，這也有問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種妥協，是要政府方面投降。

■ 您認為目前的課題何在？

金：實際擔任運動的三、四十歲人士，主張四個原則，第一，反帝民族自主化；第二，打倒軍事獨裁、建立民主政府；第三，將民衆從奴隸勞動中解放出來；第四，民族自主的和平統一。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雖然標榜了第一、二的口號，却還未到標榜第三及第四的階段。

■ 未釋放的政治犯數目大約多少？

金：大概在一千兩百名左右，這些人都是重要人物，釋放這些人應為首要之事。

■ 今後以什麼事最為緊要？

金：我認為首在形成聯合戰綫。現在，運動圈主要分成革命派與改革派。革命派主張不妥協，要求軍事政權投降，追求民主革命的目標，但為了要求現政權退位，有必要結成統一戰綫。

「實際從事運動的三、四十歲人士，主張四個原則，第一，反帝民族自主化；第二，打倒軍事獨裁、建立民主政府；第三，將民衆從奴隸勞動中解放出來；第四，民族的自主和平統一。」

七月九日的李韓烈國民葬，所喊出的口號有兩個，即「驅逐美國，完成民族自主」、「打倒軍事獨裁，建立民主政府」，這也是大多數國民的願望。

● 為「驅逐美國外來勢力」而焚身抗議的韓國漢城學生





李敦明

律師、釋放良心
犯對策委員會」
會員，1922年生
。

「執政當局須知自己的氣數已盡。」

■ 四月十三日的總統護憲談話後，律師們在各地發表了相當多的反對聲明……

李：在此之前，對政權恐懼而擔心生活問題的律師，如今已站起來，這是很大的變化。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李：這不是今年六月突發的事件。有些外國人以爲起於一朝一夕，不對。1961年5月17日朴正熙政變以來的二十六年之間，人權受到蹂躪，尤其是72年的「維新統治」以來，韓國已成爲軍事國家。畢竟，軍人與民主無法相容。軍人把學生逐出校園，要他們犧牲。結果，怨恨日積月累，終於爆發了革命。85年，學生開始真正向政權挑戰。學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長久以來一直忍氣吞聲，可是也開始起來奮鬥了，因此就產生了六月鬭爭。

六月鬭爭是民意的表現，也可以說成

革命。的確，政權還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不能說是「完全的革命」，不過，這個鬭爭表現了具有成熟力量，與自信隨時可以走向街頭的自尊，意義很大。

■ 現在的課題是什麼？

李：政府辭職及公正的選舉。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所承諾的釋放拘禁者、言論自由與保護勞動權等，進行的不太順利，保障這些也是很重要的事。六月二十九日以後，應該不是講壓迫，而是解放。釋放被拘禁者乃是理所當然，他們大部份無罪。

■ 國家保安法會怎樣？

李：應該廢止或者是大幅度的修改。

■ 對於憲法協商的看法？

李：各政黨的修正案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因爲顧慮到民衆的力量所以讓步。執政當局須知自己的氣數已盡。



黃哲暎

作家、「民衆文化運動協議會改革民衆文化運動聯合」共同代表
，1943年生。

「國家統一與驅逐美國的外來勢力是今後的課題。為了建立主體性的自主政權，而且為了把支持這個主體性自主政權的民衆意識提升起來，知識份子應盡全力從事宣傳活動。」

■ 八月號的「朝鮮月刊」認爲六月鬭爭是「和平革命」。

黃：我同意這個評價。「光州事件」以後的七

年之間，如死人一樣沒有動靜的都市中間階層開始與鬥爭合流，這是不同於以往的社會變化。民衆的力量使政府產生大轉變

，雖然是未完成的革命，但在下一個階段會完成吧。我們要說，「現在才剛開始呢！」

■ 您認為今後的課題是什麼？

黃：統一的問題。與此有關的是驅逐外國勢力。爲了建立主體性的自主政權，而且爲了把支持這個主體性自主政權的民衆意識提升起來，知識份子應盡全力從事宣傳活動。

■ 黃先生您說過：忽略勞動場所的生存權鬭爭而太熱衷總統選舉，是造成八〇年「漢城之春」失敗的原因。

黃：今天的在野黨關注的層面比八〇年時廣闊，不過仍然與生存權鬭爭有一段距離。

■ 文學家也參加了六月鬭爭嗎？

黃：他們是以一般市民的身份，與學生一起走

上街頭，也有投石頭的作家（笑）。

■ 稍前，文學家發表要求改憲的聲明。

黃：在七〇年代不參加各種聲明的作家，如今也參加了，這是時代的潮流。表演者與電影界人士等也發表要求改憲的聲明，所以這是大事件。

■ 報載實踐自由文人協議會將改名爲「民族作家會議」。

黃：實踐自由，即爭取表現自由，是七〇年代的課題，而如今文學必須對統一運動有所貢獻，故考慮改成合適的名稱。

■ 六月鬭爭之後，在寫處理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時，所感到的心理壓迫減少了嗎？

黃：嗯。今後我想應該比較容易處理統一問題了。「轉換時代的民族文學」將在八月中旬出版，敬請期待。



梁性佑

詩人，前「實踐自由文人協議會」會長，1943年生。

「四十二年來的國家分裂，是一切禍患之源，因此，如果不能解決民族問題，就不能解決民主的問題。」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梁：不能認爲是勝利，他們還沒有流亡。

■ 今後的課題？

梁：克服分裂。四十二年來的分裂，是一切禍患之源，因此，如果不解決民族問題，就不能解決民主的問題。

■ 您參加了六月鬭爭嗎？

梁：當然參加了示威。其時，我聽到了用詩所作的歌，那時我就想，文學也有這樣的功用。同時在鬭爭中，我對學生的期待也高漲起來。學生似乎自覺到「民族運動的主體在我們」。比起四一九革命，此次力量更強、也有主體性與科學性，再也不怕死亡。

■ 文學家也發表要求改憲的聲明而努力奮鬥。……

梁：差不多有二百三十人簽署聲明，其中還包括30位左右以前被視爲「御用文人」的人。可以說潮流開始變了，但是，文學家之中，還沒像學生一樣爲奮鬥而死的人。

■ 您對於「實踐自由文人協議會」改名爲「民族作家會議」有什麼看法？

梁：時期還早吧。如今首要之務在繼續進行實踐自由運動。

■ 請向日本文學家談一點話。

梁：你們似乎不太了解韓國。日本文學團體或文化團體，應對韓國作家、詩人與美術家等等的鬭爭發表一篇的支持聲明才好。

此刻，爲了出版「韓國民衆史」一書，出版社的老板被判刑，希望能對這種問題表

示關心。



柳東佑

「韓國基督教工人總聯盟」議長、
「爭取民主憲法工人共同委員會」共同委員長
· 1949年生。

「六月鬥爭，是民衆對軍事獨裁政權政治壓迫、剝削及腐敗不正的反抗。大部份的國民認爲現在的憲法不行，軍事獨裁政權必須打倒。」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柳：這是民衆對軍事獨裁政權政治壓迫、剝削及腐敗不正的反抗。大部分的國民認爲現在的憲法不行，軍事獨裁政權必須打倒。此次鬭爭的勝利是有其界限的，軍事政權尙未告終，盧泰愚擺出溫和的形象，企圖擦掉以前的軍人的形象。不過，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已較緩和，生存權的鬭爭變成較容易展開。報紙上說「工人運動太過火」、「釀成社會不安」，不過，我們只是合法的主張權利而已。

■ 很多的工人也參加六月鬭爭嗎？

柳：由於加班太多，能參加示威的人很少，而且也無法發揮領導性。

■ 盧泰愚「民主化宣言」後，勞資糾紛增加了。

柳：因爲生存權還沒有受到確實的保障。

■ 對搞工人運動的人來說，當前的課題是什麼？

柳：全面釋放被拘捕的工人，讓被解僱的工人復職，此外，取消黑名單！

■ 七月六日所組成的爭取民主憲法工人共同委員會，目標何在？

柳：目標在於使工人的權利意識及政治意識覺醒而參加政治，目前正在準備勞動法草案中。工人、農民及貧民的生存權確保後，才可以說是民主化，所以，新憲法不僅是條文上的修改而已，還須作實質上的改正。

工人參加政治，或許會讓人想到工人進入國會，而這也是我們的構想之一。

某氏 (勞工運動家)

「工人運動本身的課題是：第一，成立民主的工會；第二，強化工會民主化實踐委員會的組織；第三，爭取勞動三權的保障；第四：爭取被解僱工人的復職；第五，取消黑名單。」

■ 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某：這是全國人民對軍事獨裁政權不滿與憤怒的暴發，中間階級不再支持政權這一點很有意義。

■ 對盧泰愚宣言的看法？

某：這是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暫時讓步，他們爲了繼續維持親美政權，而作了讓步。這很類似 1931 年三一運動後的「文化政治

」。那時候，運動的領導部妥協，而工人、農民則向前行進，現在工人也會繼續前進。當前的政權仍然不承認生存權與勞動三權，而且也不廢止國家保安法。

■ 工人運動今後的課題？

某：爲了支援工人爭議，要強化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的組織。工人運動本身的課題，則是：第一：工會民主化，或者是創

立民主的工會。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宣言以來，我們的奮鬥已有相當進展。第二，強化七月十二日成立的工會民主化實踐委員會的組織。比起八〇年「漢城之春」時，民主工會的數量已較多了。第三，爭取勞動三權的保障；第四，爭取被解僱工人的復職，第五，取消黑名單。

某氏 (勞工運動家·女性·原爲學生)

「雖然現在韓國並非半封建，但却是美國的殖民地，所以，反美鬥爭很重要。」

■ 你參加了六月鬪爭嗎？

某：參加了幾次的示威。

■ 如何評價六月鬪爭？

某：可以很高的評價成民衆的奮起，不過這只是R（革命，Revolution 的隱語）的一個階段而已。

■ 盧泰愚宣言與美國的關係如何？

某：這是美國所導演的一齣戲，因而今後，反帝鬪爭很重要。

■ 要參加這次的總統大選及國會議員選舉嗎？

某：嗯。選舉仍然很重要，是必須經過的過程。我想，爲選舉而建立統一戰綫是有必要的。

■ 對民主憲法爭取國民運動本部的評價如何？

某：在那裡的人並不希望R，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工人的黨。

■ 工場的工作是否很辛苦？

某：我在學生時代開始就當工人夜校的老師，而且也有勞動經驗，所以不覺得很辛苦。

■ 現在關心什麼事？

某：我常與朋友討論殖半論（殖民地半封建論的隱語）等問題。雖然現在的韓國並非半封建，但却是美國的殖民地，所以，反美鬪爭很重要。



張永達

「民主統一民衆運動聯合」事務局次長。原「民主運動青年聯合」副議長，1948年生。

「我們這一邊對暴力手段很自制，而對方若使用暴力，對方只有走向沒落之路。」



■ 請介紹一下您的鬭爭經歷。

張：我 1969 年參加反對三選修憲運動被捕，被大學勒令退學，其後復學，但 74 年因民青學聯事件再度被捕。剛被釋放，又於 75 年觸犯總統緊急措施第九號三度被捕。81 年出獄，83 年參加組織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民青聯），被選為副議長。86 年，民青聯、民統聯遭鎮壓，我被拘禁，最近因六月鬭爭而出獄。

■ 69 年以後的十八年之間，你不斷地持續鬭爭，你的鬥爭經歷正好和整個反獨裁民主化鬭爭的歷史同步。您對六月鬭爭的評價如何？

張：反獨裁民主化鬭爭的歷史，不是十八年，應該是二十六年。1961 年朴政權成立，即軍產複合獨裁體制成立以來的二十六年之間，長期受到壓抑的國民，在刑求朴鍾哲烈士致死的犯人被頂替的真相暴露後，終於將不滿爆發出來。重要的是，六月事件，不是突然暴起的。

■ 您認為六月鬭爭的性格如何？

張：我們周圍的人說這是市民革命或國民革命。這是和平的、國民的奮起，所以也可以說是和平的國民革命。

■ 對盧泰愚宣言看法如何？

張：它顯示了政權已有沒落的危機，為了避免崩潰，他們發表了宣言，所以如果政權方面還想有所要求，那麼他們就完了。從國民的角度來看，這是國民革命的中間勝利。

■ 為什麼說成「中間」呢？

張：因為不是完全勝利。

■ 要完全勝利，必須做什麼呢？

張：必須建立可以執行公平、公開選舉的內閣；全面釋放被監禁者，大赦、復權，以及解除通緝。當舉國一致同意的內閣建立，用選舉使和平的國民革命完成了，就是完全勝利之時。至於是否釋放被監禁者，乃是政權是否有意走向民主化的試金石。

■ 能突破到今天的情形，83 年「民青聯」的

組成，似乎作了劃時代的貢獻吧……

張：「民青聯」是爲了打破光州事件以後的沈默而組成的。由於不能坐視學弟們被捕，就以「民青學聯」一代（1974 年「民青學聯」事件時的學生）爲主，在 83 年 5 月籌劃，而於 9 月 30 日創立，第一任委員長是金槿泰先生。「民青聯」創立時，新聞並未報導。但我們在其他方面也從事組織，發行機關刊物，創造可以發言的環境、契機。我想，這對於 80 年代運動的活潑化，是有開創性貢獻的。

■ 「民青聯」去年遭鎮壓，事務所也被強迫關閉，今後您們想做的是？

張：今後我們想努力加強青年運動，加強與「民統聯」等組織的聯繫，在地方使活動活潑化。現任議長是金熙澤先生，事務所最近要開張，組織將重新整頓、再出發。我擔任「民青聯」常任委員，將致力於加強「民青聯」與「民統聯」的聯繫。

去年為什麼會被鎮壓住呢？原因在於「民統聯」與「民青聯」的關係不夠緊密，有隙而爲敵人所乘。政府對「民青聯」的強化感到威脅，所以利用「民青聯」與「民統聯」還未結成一體之前加以鎮壓。政府至今還視「民青聯」爲不法團體，第一任委員長金槿泰先生自 85 年被捕以來仍在獄中，這次也沒有釋放。

■ 與「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的關係如何？

張：我們同意其大綱，也參加了。爲了完成和平統一與民主，大家一起努力。分裂的四十二年來，南北韓不斷作軍事競爭。然而

，假如互相對立的物理力暴發了，兩者都會完蛋，沒有勝利者，我們必須避免滅亡。

■ 今後有什麼展望？

張：如果和平地爭取發展國民的革命意識與團結，敵人就會投降。我們這一邊對暴力手段很自制，而對方若使用暴力，對方只有走向沒落之路。



金志龍

「被捕青年學生協議會」會長，前漢城大學學生會長。

「現在最重要的是確保工人組工會、罷工及思想的自由，校園的民主化也很重要。必須重新評估以前的犧牲者！反美自主化的鬥爭是一個持續的事業。」

■ 請介紹一下被捕青年學生協議會。

金：本會於今年七月十九日組成，會員有一千兩百名。

■ 對六月鬭爭看法如何？

金：是暫時的勝利。

■ 對盧泰愚宣言看法如何？

金：他不得不如此做。這是為維持法西斯體制與安撫民衆的欺瞞手段。

■ 您認為在哪裡有欺瞞？

金：像釋放被捕者的問題。他們只是選擇性的釋放，却大加宣傳「已經釋放」，真是濫用名詞，而且釋放的準則曖昧，也沒有名

義。全面釋放被捕者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在日韓國人也應該釋放。

■ 青年學生對金大中與金泳三的看法如何？

金：他們認為兩者的力量不大，可是由於共同敵人當前，所以有時也可以一起行動。

■ 現在最重要的事是什麼？

金：作最大限度的確保工人組工會的自由、罷工自由、思想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校園的民主化也很重要，教授們已有組教授協議會的動向。

必須重新評價以前的犧牲者！反美自主化的鬭爭是一個持續的事業！

結語

受訪者大都談到，六月鬭爭的意義是未完成的革命，因此主張十二月的總統大選與明年緊接而來的國會議員選舉之重要性。有位年輕人自信滿滿地說：「選舉時，請來看看！」

至於當前的課題，雖然在優先順序上有所差異，但幾乎全部的受訪者都指出：全面釋放被捕者、加強選舉與組織，令人感覺到統一戰綫已不期而然地建立了。

也有人指出：現仍在獄中的在日韓國人政治犯及南朝鮮民族解放陣綫的被告，他們才是

揭發六月二十九日盧泰愚「民主化宣言」之欺瞞性的證言者。因涉及南朝鮮民族解放戰綫事件，如今仍在獄中的林東圭母親吳愛順老夫人（七十一歲），吞吞吐吐地說：「我的兒子被判無期徒刑，現被關在大田刑務所，身體狀況很差，我真擔心。他沒被放出來，叫我如何能對盧泰愚宣言表示高興！」

各戰綫紛紛成立了新組織，舊組織也再度活潑起來，傳單、手冊紛紛出籠，新的運動已開始了！

◎南韓六月革命特輯◎

南韓民主運動與

美國的對韓政策

——「六月革命」後的情勢

■Bruce Cumings

■David Sadwhite ■徐火土譯

本文是今年八月八日，芝加哥大學布魯士·康明斯教授（專治韓國政治史）和華盛頓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大衛·沙達懷德氏（專攻東亞史）進行的對談內容。康明斯教授已發表過許多有關韓國和中國的論文。其中，尤以兩本有關韓國的力作：《韓戰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Korean War》（第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一年、第二卷近刊）和《衝突的產物 “Child of Conflict”》（編書、一九八三年）享譽學界。沙達懷德氏獲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去年到韓國進行了十個月的研究，剛回美國。目前暫任北美韓國人權問題聯合會事務局代理局長。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取代全斗煥的人物

沙：本刊的定期讀者，對您登在今年三月號的那篇「美國如何應付韓國危機？」一定記憶猶新。您在文中列舉了幾點美國對韓政策的根本性，一成不變的指導因素。您認為在最近將來美國的政策不會有變化，且美國的政策設計者今後也將無法妥當地應付韓國的現實發展。

您認為，後來的發展，特別是自六月十日至二十九日的情勢，還能證明您當初對美國政策所作的評價嗎？即使您還相信當時的預測沒有錯，有沒有必要修正的地方呢？

決定美國對韓政策的原則是：一、韓國的戰略位置遠比人權或民主重要；二、美國政府中人，從不相信韓國人有談民主的資格。

康：我在那篇論文中所指出的四點是根據我對四十年來的美國對韓政策的理解作基礎的。前面的兩點，我認為是決定美國政策的原則。這些都是像吉米·卡特或現任國務卿等人曾經率直表明過了的東西。

第一個原則是：對美國人來說，韓國的戰略位置遠比人權或民主重要。不過，也不是說從來都沒有重視過人權或民主，那是優先次序的問題。因此我說過，即使



● 全斗煥與雷根

在世界上最強烈的人權政策的時代——即卡特政府時代，還是清楚地表明韓國的戰略位置重於一切的原則。

第二點是：美國政府中人，從來也不相信韓國人有談民主的資格。年來舒茲國務卿，雖然不敢太露骨，但也不止一次用種種方式表示過他的意見。例如：他很荒唐地說菲律賓人比韓國人有更長的民主傳統。又說，韓國政治的背後有儒教的權威主義云云。當然，這樣的論點，不太出現在官樣文章中，大都借用美國人所慣用的、非正式的內部評論的形式。

第三個原則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有關。第四個原則是「失去」中國（1949年）、越南（1975年）、伊朗（1979年）等國家的美國總統在下一屆競選絕對贏不了。我直到現在還是相信，以這四點為原

則的美國的對外政策，並沒有基本的變化。

自從去年秋季，美國方面的氣氛或官方立場的確有了有利的變化。這些變化，我想是韓國人的街頭運動逼出來的。

美國政府，至少在八五年二月選舉以後，就已經察覺到韓國危機日趨嚴重。從那時開始——公式上還是保留對全斗煥的支持立場——就抱有一種深刻的不安，生怕全斗煥守不住現有關係的目標。這才開始尋求取代全氏的新領導者。

八五年春天全斗煥再訪美國，和他在八一年的首度訪問，情況全然不同。第一次訪問的時候，雷根曾經大表歡迎。可是八五年的這一次，各大報、電視、廣播、都不再出現歡迎的特別節目。官方的接待方式也顯得輕慢多了。那是因為全斗煥在

突然之間變成美國政府的包袱。

接著，去年秋天，美國政府開始和全斗煥保持距離了。例如，助理國務卿席格爾毫無保留地說韓國軍隊應該回到軍營。我認為這個發言非常重要。雖然我不認為這些象徵表示華盛頓當局「改變心意」，但至少它表現出一種新認識——韓國軍方特別是全斗煥其人，已經為美國政策的執行惹來麻煩，支持全斗煥或軍方所能獲取的「利益」恐怕要小於「損失」，因而針對這種負面狀況必須採行某些措施——這種新認識和曾經在菲律賓事件中所表現者很相近。

沙：外邊傳說美國政府在這兩年開始尋找取代全斗煥的人物。美國同意八八年二月間全斗煥政權的「和平」轉移——讚揚此舉為韓國政局的重大轉機，並稱讚提出和平轉移諾言的全斗煥。但我却認為事情還沒有真正實現以前便強調其重要性，是邏輯上的錯誤。當美國尋找替代的領導者的時候成為問題的是，按照全斗煥的構想，必須由全斗煥本身主動細心地選擇出繼承者。在這個時候，盧泰愚做為全斗煥可能中意的候補者上場了。

漢城的人們都認為，全斗煥在四月十三日發表擱置修憲的言論，美國雖然表示不快，却仍然堅決支持全氏的意見，美國優先考慮的不是韓國國民對此案接受不接受，這樣的本質性問題。而是「和平轉移」這個形式。於是乎美國完全同意盧泰愚成為有力的繼承者。美國大使甚至出席了六月十日正式選出盧泰愚當總裁的民正黨大會。這樣一來，所謂「取代」全斗煥的人物，幾乎沒有甚麼「取代」的意味，和全斗煥一樣，還是軍方出身的指導者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究竟美國所求的是實現真正的政權交替的方案呢？還是不顧國民對交替條件的廣泛的不滿，僅求形式第一主義，只是努力於找來一位比全斗煥稍好的人物

呢？

美國願意委託政權給像朴正熙、全斗煥這樣能維持體制的人，一旦情況不利，被迫檢討時，就再換一位能穩定政局的類似人物。

● 盧泰愚



康：如果把美國在韓國的抉擇原則，用粗略的說法來表達，雖然有些誇張，大概可以這樣講：

第一、美國願意委託政權的，是一位固執於自己的目的能維持體制的人物。美國一旦以這樣的觀點肯定一個人，便會全面支持這個人。朴正熙、全斗煥，都是這樣的人物。然而，一旦發生新情況，被迫重新檢討的時候——像一九七一年的選舉、國家非常事態、戒嚴令、由此導致的維新憲法或七九年夏天的事態等——便改採後退姿勢。於是又見一位新人物的登場。這往往是相似型的人物——上台便能把一切事態「正常化」的人物。這樣的人物總是有的。

朴正熙時代扮演這個角色的是金鍾泌——不用說，他也是六一年政變的共謀者

。到了全斗煥政權的時代，「受屬意」的人物一直是盧泰愚。從八一年開始，部份美國人——包括當局人士和民間，替盧泰愚說好話，往往顯得有如韓國遊說團。他們的口頭禪是：「不錯，這個人相當好。」或者說：「全斗煥可以完全信賴。既然他對七年後的政權轉移有了承諾，盧泰愚接班的可能性很大，而盧泰愚的確是個好人，是相信民主的人，我們必須給予支持」等等之類。

在這七年間，我一直認為這樣的說法幾乎是笑話，却繼續不斷地反覆著，甚至從前年起，被談論得更起勁，更明顯。這使我驚訝不已。有時候我懷疑，那些支持韓國政府的美國人——包括當局者和民間人士，是不是在讀人家分發的類如公共問題說明書的東西？如果真有這樣的東西，即使對韓國政治不具有實際知識，連四個以上的韓國政治人物的名字也舉不出來的人，只要偶然接觸到說明書，便可以把盧泰愚吹捧為韓國下一世代的傑弗遜了。

這樣說來，其中有個過程。第一選擇是掌握權力者，第二選擇顯然是和權力者具有關聯的某些人物。今天美國政府的當局者對盧泰愚的評價都是一樣，如：他是好人，值得信賴。萬一盧泰愚不好，再把金鍾泌拉出來吧——國務院裏的韓國專家會這樣提出金鍾泌的名字。

至於美國政府對真正的民主反對派——也就是，和軍事獨裁政權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們——這裏又有基於現實的選擇順位。如：金泳三是「多少有問題，不過還可以接受」的人物；金大中則至少在今年六月以前是「一貫難予信賴的、不可捉摸的、不易相處的」人物，是「圈外」人物，美國當局者必定指出這位金氏是在韓國國民之間極不受歡迎的人物。

展望這些事態，就可發現前面所說的，相當諷刺性的過程。美國當局在這過程中表現出幾次後退。不過看來絕對不會



●金大中

後退到承認韓國國民直接及自由選舉大統領這條線上去。

美國如何評價直接選舉制

沙：由於這一年間所發生的情況及六月的民衆力量的展示，使執政黨不得不在實際上接受反對黨所提的大統領直接選舉制，這的確把美國的政策設計者逼向最後的選擇了。這一點很重要。美國究竟對兩年來漸趨高漲的，要求大統領直接選舉制的運動有何看法？在八五年二月間的選舉中，反對黨有了很大的躍進，後來反對黨就以爭取直接選舉為中心綱領。再說，是盧泰愚屈服接受了大統領的直接選舉制。那麼在那

前後，美國所表示的是怎樣的一種姿態呢？

另一方面，我們有必要提及反映廣大國民的、真正的全國性努力的運動。在這兩年來，數不清的團體舉行集會或署名運動、發表聲明等，活潑地要求修改憲法。

八五年以來，針對這些問題的輿論調查不多，但也可以看出，大統領直選制比執政黨提議的內閣責任制更受到國民的壓倒性支持。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全斗煥政權——在某種程度上美國也——非常厭惡直選制。最大的理由是，這種選舉制很容易被認為是對當權者的聲望及向來被承認的正統性的挑戰和考驗。

美國雖然瞭解大部分的韓國人民都支持直接選舉制，雖然知道不能反映民意的現行憲法只有使人民更不滿，美國還是不肯支持韓國人民所需求的直接選舉制，因為它知道一旦採直選制，反對黨一定獲勝。

去年十二月，我會見了新上任的駐韓美國大使——李潔明。在他那裏，我也聽到上面所提的美國的隱憂。儘管大使的談話相當含蓄，意思却很明白。李潔明大使舉出幾種選舉制及其可能的後果，他提出了兩點：

第一、大使已經從舒茲國務卿那裡得到指示，不能被捲進有關大統領直選制和內閣責任制的議論。這一點至少在表面上是無可厚非的。但因為美國對現政權的支持，使政治中人一致認為美國是在支持全斗煥政權的選擇——內閣責任制。也就是，美國「不介入」選舉制爭議，被認為實質上是「支持」政府的方案。

第二點表露出更多的問題。我向他表示，反對黨不一定能無條件贏取選戰勝利，只要選舉進行得公正，即使失敗，他們還是會心服。可是大使却對我說：「根據我們的所有的情報分析，一旦採行國民直

接投票選舉大總統、反對黨必定獲勝」。

現在回顧剛才你所整理出來的美國政策——先不考慮反對黨人士，以掌握權力者為第一選擇，再推及與其接近的人物——，則李潔明大使的率直的評價有如下的啓發意義：美國雖然瞭解大部分國民都支持大統領直選制，雖然預料到不能反映民意的制度——現行憲法或內閣責任制——只有帶來更大的不滿，美國還是不肯支持更受民意支持的民主選舉制。因為它知道，一旦支持這個制度，——根據它自己的情報分析——反對黨一定獲勝。按照這個邏輯追論下去，這裡就產生一個疑問——六月廿九日盧泰愚提出接受大統領直選制的妥協方案，美國是否會參與？美國政府是否自信，在選戰中盧泰愚或其他執政黨候選人可以獲勝，政權不至於轉移到反對黨手中，而發生令美國極度不快的結果？

康：有關在韓國舉行直選選舉的結果，李潔明大使向你表示的意見，並不令我驚奇。因為大使館擁有衆多的情報來源，幾年來一般觀察者所看到的，他必定也瞭如指掌。不過現在大使館必須釐清的是下面的兩點：

第一，韓國政治的基本問題，不在於選舉制度應如何操作——是否採行內閣責任制——，而是因為國民受到現行體制的壓抑和限定而不能主動選舉，所以希望一種有效且直接的方法來保證自由選擇。韓國國民的意願是否的確如此？

第二點：如果這樣的直接選舉終於重現，反對黨候選人——金泳三或金大中——會獲勝嗎？會以「巨大差鉅」獲大勝嗎？如果美國當局擔心會這樣，美國大使館也預料會這樣，那麼數個月來的美國的態度，實際上是很偽善的。

自從去年十月六日李潔明大使上任以來——順便一提，這個人事案本身表示美國正認真注視著韓國情勢——李潔明和他的幕僚都已積極地介入韓國的政治情勢中。這些人經常表明他們的不介入原則，但

他們和韓國的政治領導分子不止一次地會合見面，這就是他們的介入方式。依我看，他們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為了安撫抗議的聲音，而適當修改現行政治體制，使它存續下去。第二個目的是，決定可以支持的韓國政治家的人選。首先選入李敏雨這樣的人物，金泳三也許可以加入，但金大中必須「除外」。如衆所周知，反對黨爲了「李敏雨構想」而發生嚴重的分裂。李敏雨所提的基本上是非直選制的改善論，想找出一種能符合全斗煥政權和美國大使館雙方意思的方式。

美國當局，向著這目標每天都有所行動，而這一類的活動正表示那所謂不干涉韓國政治情勢的虛偽性。不過有一點比這更重要的是，只要觀察美國的參與方式，便能明確把握在韓國政情中，美國態度的一定「規則」。

美國的馬前卒——李敏雨

沙：剛才你用「偽善」來形容數個月來的美國的態度。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它的意思？

康：首先，美國明明知道，以現在的制度，韓國國民無法直接表現出他們的政治願望，這就是偽善了。其次，美國也預料到，在直接選舉中，金大中或金泳三會獲得「大勝」，却一方面強調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要說什麼金泳三「勉強可以」信賴，金大中「絕對不行」這也是偽善。美國一貫地誹謗金大中。舉例說，從好多年以前，我們就常常聽到像：金大中是時代落伍者了、時代錯誤症了，沒有國民的支持了，等等的論調。但八五年他回到韓國後，事實證明，那些說法都是謊言。

我身爲美國人，對本國的政府竟然一再「侮辱」這樣一位人物——自七一年以來在苦難中僥倖活下來的受難者——，覺得不勝驚訝。當然，現在李潔明大使找上了他。何那是看到了今年六月事態的結果

，顯然並不是很情願的。

「李敏雨構想」自其提案到推動，都有美國參與其中。四十年來，韓國都有一種領取美國中央情報局津貼的所謂「中道」政治家。

沙：我完全同意。也許有人會從這裡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說，美國已經不僅是偽善，而是完全背離了正道。前面已經說過，「李敏雨構想是，不改變體制本身，只順著美國所期待的路線改革。在漢城，十二月間李敏雨首次提出這個案，一開始就有很多人認爲美國即使沒有直接下手作成本案，也一定頗多參與。

因爲大家都想，這個案很符合對韓國政局抱有「大妥協」立場的美國的需要。而美國當局對這個構想的反應，更有力地證明美國的介入。今年一月，新民黨向李敏雨施壓力，強迫他收回提案，而據說美國大使和其他幹員則到處表示他們的不解和不安，說「李敏雨構想那裏不對呢？我們認爲是很好的提案」。

接著，這個構想被冷凍了七八個星期。然後在三月六日舒茲國務卿訪韓第一天，克拉克國務次卿助理先到漢城，再度提到李敏雨構想的問題，問甚麼地方不對。於是李敏雨再鼓起勇氣——也許受美國嗾使——，在舒茲來訪後數天，突然間又把他的構想提了出來。

因爲他的這一招舊話重提，反而促成了反對黨由分裂到重組，結果李敏雨只能掌握新民黨中的一個派閥。

這一連串的經過及韓國最大反對黨的終於分裂，使多數漢城市民得到了一個結論，說李敏雨構想自其提案到推動，都有美國參與其中。這個構想和李敏雨本身，都如你所說的「大妥協」的美國立場的最佳傳聲筒。



康：環繞李敏雨構想的一切經過非常重要。而其重要性，部分在於此構想在美國國內和漢城的美國大使館或外國特派員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解釋法。比方說：我對紐約時報報導反對黨分裂的內容非常生氣。那標題、明顯是非難「基本上拒絕妥協」的反對黨。在報導中更武斷地說，韓國政治是沒有妥協的，韓國人不知道妥協的方法。

這些文章令我生氣的原因有幾點，第一、這裡所提的「妥協」，是有如下的前提的：也就是，這個妥協要把現存的大統領和全斗煥、盧泰愚兩人當成當然的事實而接受，然後再看那一位反對黨領袖，能從悲慘虛弱的立場來和這些「當然存在」的實力者談判。一方是掌握國家和軍隊的兩位將領——不是政治家——，另一方是李敏雨這個「政治家」，且毫無理由的認為李敏雨具有妥協的才能或技巧。說得清

楚一些，李敏雨在他的政治經歷中，是一貫的機會主義者，現在也是這樣的「御用」政治家。他沒有大的選舉地盤，當然也沒有可能被選上大統領，也正因如此，他是喜歡妥協的政治家。

從那些報導中我們所能理解的第二點是，在漢城大使館的美國人，其實從八〇年代初，便對韓國政局一無所知。因為相信，像李敏雨這樣自動來和他們交涉的人物是知道妥協，具有妥協技巧的「好人」，因而一定是親美派，於是就對他產生了好感。

我不願意中傷李敏雨。但在韓國的確有一種從美國中央情報局（C I A）領取津貼的所謂的「中道」的政治家。我不知道李敏雨是不是這種人物，也不敢這樣斷定。但四十年來一直有這種事，我要說的是，美國人如果把這樣的人物當成重要人

物而和他打交道，那就暴露了美國的無知。而更要緊的是，美國人似乎不理解，這樣的人物愈想和美國或執政者妥協合作，在一般韓國人的心目中就愈像是墮落政客。

韓國國民並沒有把他們看成有德望的政治家，這一點只要看看反對黨分裂的結果李敏雨只剩下了一小撮支持者的事實，便能獲得證明。

美國與盧泰雨的「六·二九宣言」

沙：你說韓國的民衆對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懷有疑問，這一點在最近幾個禮拜表現得很清楚。自從迫使盧泰愚在韓國民衆的憤怒六月廿九日發表讓步聲明以來，漢城出現了兩種推測。

第一、盧泰愚或其顧問，應該無法獨立完成這樣總括性的讓步計劃。第二、對政府及執政黨來說，這樣急進的（全面的）改變政策——雖然只是文字上的諾言，但已算是實質上接受了反對黨的要求——如果沒有獲得美國的積極支持根本就不可能達成。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漢城的觀察家覺得疑問的是，美國有沒有直接參與過？因為如衆所周知，美國雖然不願意把政權交給反對黨，但根據它自己的政治分析，它也充分了解現政權在選戰中不能獲得多數民衆的支持。說得露骨一點，只要美國堅信它可以透過全面支持執政黨候選人和製造分裂以削弱反對黨的手段，來防止它所不喜歡的反對黨候選人當選大統領，它可能會同意大統領直接選舉制。

李敏雨被看成具有妥協意志和能力的好政治家，受到美國的歡迎——三月十三日李潔明大使和李敏雨的會談，有大篇幅的報導，會談中又見李敏雨構想的復活並受到稱讚——同樣地，現在美國把盧泰愚吹捧成真正的政治家，創造奇蹟的人物。

幾個月來，美國不提盧泰愚的軍人經

歷和參與一九七九～八〇年的政變的事實。只一味宣傳他曾任七年的政府閣員，經過政治家的歷練。

在這裡，美國再度爲了阻止反對黨勝利而提供了協助，於是漢城瀰漫著一種預感，認爲美國可能支持盧泰愚上台，從而永保現存的政治體制。

美國握有對韓國軍隊的指揮權，美國勢力浸透了韓國。美國大使館、軍方、中央情報局等機關，對韓國政局的立場並不一致。

康：我想在六·二九的那場交易中，美國大使館或其他方面的確透過某種層次的活動而有所參與。現在我要在更屬於一般性的問題上做些解釋。首先，就美國的影響所具



有的性格，和六·二九聲明的問題分析一下。

韓國是被外來勢力浸透的國家。美國握有對韓國軍隊的作戰指揮權，美國權力從側面浸透了韓國。直到現在，美國毫無道理的侵略了主權，有三十九年之久。

其次，大使館內有包括情報部或國務院系統的韓國專家，他們經常觀察監視韓國的政治，有時候和韓國政治家交談，有時候還會影響韓國政治。美國軍方有一批人和韓國軍隊的軍官或幕僚具有長年關係。幾乎所有的韓國軍人都在美國受過訓練一旦發生了情況就頻繁地和美國方面來往，互相影響。另外在情報作業上，雙方也合作有年。我要說的是，美國在韓國的角色是複雜的，即使大使館往往支持緩和軍事獨裁體制的政策——也就是，雖然緩慢，還是指向某種文人政府型式的民主化——

一，其他的美國機關，却不一定站在同一立場。

例如，因伊朗事件而出名的約翰·辛格勞其人，在韓戰期間，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駐韓要員。直到現在他還和不少韓國人保持聯繫，那裏面當然有冥頑固陋的反共右派。數個月來，他在菲律賓。他說在尋寶，但不少人懷疑他是在幫忙一些舊日戰友，策劃對阿奎諾政府的政變計劃。（編按：最近菲律賓的政變，或可從這一分析得到線索。）

談到韓國，像辛格勞這樣的人物所在多有，因此即使大使館相當致力於民主化，其他方面的努力却在搞背道而馳的活動。這種過程，必須慎重加以注視。換句話說，美國的政策決不是一元化的

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從六月中旬到月底，軍事政變的威脅一度非常迫切。個中情況，也有部分見報。結果是，有幾個人失掉了職位，大家都認為穩健的政策比軍事政變好。那時美國對軍事政變發出了警告，並且介入其中，這一點是明確的。同時，其動機也是善意的。不過為甚麼美國懼怕軍事政變？我對這一點覺得好奇。

沙：不必搞政變，也還有戒嚴令、衛戍令，這類的手段可用。

康：那時候最成話題的是衛戍令。一九八七年的美國，不像七二年或八〇年，採取了這樣的態度，令人覺得很有意思。美國也許先認為韓國軍隊並沒有團結到可以發動政變的地步，或者認為韓國國民對常常干政的軍隊已經很反感很憤怒，政變一出現，可能常來一場大屠殺。

另外，針對盧泰愚聲明，我想從別的觀點來看。這一點和美國方面沒有關係，只關係到韓國政治的一種可以稱為極端形式主義的型式。也就是說，到時候會出現非常動人的綱領，却毫無實質。

最好的例子是七二年七月四日的南北共同聲明。朝鮮半島上的兩國，誓言要為



和平統一和民族的大團結而努力。聲明公佈的一天，我在漢城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吃一驚，心想「不得了，新時代終要來臨了」。不到幾個月，南北雙方都表現出他們其實並沒有打算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以造成和平統一。那時候我做了如下的自問自答。「在韓戰中打過戰的將軍們會怎麼樣呢？國家警察或K C I A會有怎樣的看法呢？他們會接受這個聲明嗎？」當我看到六月底盧泰愚聲明和幾天後的全斗煥聲明的時候，我的感想和上次是一樣的。四十年來一直打擊民主運動的韓國的「保衛秩序的勢力」——國家警察、軍隊、情報部——會拱手默認金大中或其他的甚麼人當選嗎？

還有一個我們一開始就提到的問題。也就是，美國——不單是雷根總統，凡所有和韓國有關的各種機構——會真正歡迎可能令金大中這類的人物上台的大統領直接選舉嗎？針對這個疑問，我不得不轉為悲觀。獨裁的權力構造比那動聽的宣言更重要。

沙：我完全贊同。這也是今天在漢城受到很多人關注的問題。自從盧聲明發表以來，韓國的輿論——不只反政府勢力——對該聲明的實施的信號很注意。到現在為止，一般人的感覺是，盧泰愚的八點計劃，沒有一點是按時實行的。沒有人相信鎮壓的機構會真正解散，大多數人極度懷疑民主化措施的實際可行性。

除非真正的實現民主的政權，否則根本不可能把鎮壓的機構解散，但即使做不到那個地步，還是應該讓盧泰愚或全斗煥這樣位居政權頂層的人瞭解那些機構的民主化是絕對必要的。

你多次提到金大中的名字。請你對他的角色和人們對他的瞭解或看法，稍微分析一下。

如何看待金大中？



康：美國以最偽善的態度對待金大中。一九八三年的滯美期間，金大中完全被美國政府所忽視。與此有關連的是，八二年到八五年美國當局的基本路線是肯定韓國政治的新時代，處處強調韓國的新人新黨，吹捧全斗煥是真正瞭解要確立韓國的民主必須和平轉移政權的人物，凡此等等。

後來金大中回國，證明那些論調都不確實。現在美國政府至少有和金氏對談的心意了。華克大使連一次都沒有和他見過面，這不是名譽的事情。八五年我和伴隨金大中回國的代表團一同赴韓，會見了大使，勸他和金大中見一次面，他還是不肯。總之，對金大中來說，現在才想見他，顯得太小氣，也太遲了。

儘管如此，還有人說，金大中的韓國的指導者之中是最親美的。這的確是一種



第二、他對民主的價值或對美國的瞭解之深，和美國的政策設計者對他的誤解成爲尖銳的對照。據說華克大使拒絕和他見面。就因爲不少人從不和他見面、討論，華克和當時的幾位館員都對他懷有反感。

他們爲了把他們對金大中的反感合理化或拒絕認真對待，想出了很多批評的理由。當然這些意見他們不敢留在正式的記錄中。這些批評都顯得苛薄。如、金氏對美國幫他脫險的感謝「不夠」之類。他們却不願意反省一下，他們毫無道理的懷疑金氏或拒絕批判全斗煥的態度，給金氏什麼感受？

美國認定韓國的總統必須是無條件的親美派，美國懷疑金大中左傾，爲恐金大中當選總統不惜中傷、攻擊金大中。

諷刺。雖然受盡了美國政府的冷落和侮辱，金大中還是相信爲了韓國的民主化，美國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他相信美國即使不介入，只要肯幫忙，就可以把韓國引到正確的方向。

關於這一點，我想金大中這位人物具有驚人的寬容、體諒，和善意。因而他一直到現在還是相信美國政策中的善意。我知道多少年來在所有的問題上，他被美國政策搞得焦慮不堪。但他還保留著多數學生領導者所沒有的某種東西，還堅信美國對韓國民主運動有所幫助。

沙：因爲幾點理由，所謂金大中共是親美派這種提法很重要。第一、他不是無批判的親美。他認爲美國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妥當，但美國的對韓政策沒有遵照這樣的原則，因而造成偏差。

有關金氏對美國的態度這個問題，最近我還跟李潔明大使及其他幾位交換意見，也徹底地領略到他們對金氏的誤解之深和偏見的強烈。你大概也知道，李潔明大使帶著幕僚，在七月初第一次和金大中見面，進行了有內容的討論。經過六月事件，美國才不得不開始和反對黨領袖們認真接觸。

我對這一次的會談的印象是，雙方的見解有相當的距離。這一點也表示美國對金氏所懷有的不信任感和反感。金大中這方面天真的相信這次的會談是有誠意且很有益的意見交換。而大使館這邊却認爲這是向金氏「嚴詞詰問」他對防衛、統一、經濟方面的綱領和政策的機會。

我是在七月十三日見過李潔明大使的。大使很明白地表示他對金大中共有相當強烈的疑慮和不信任感。他說金氏的意識型態的傾向依然不變，對美國來說是可疑的



● 李潔明

。他還提到一九四〇年代末期金氏的活動，在七三年的綁架事件以前和一些可疑人物有過交往等等。李潔明最後還意味深長地加了一句：「金大中不是無條件的親美派。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反抗我們（美國）」。

對這些談話的含義，我有強烈的關切。特別是，當美國的政策設計者——在這裡是大使本身——認定在韓國擔任總統的人物必須是無條件的親美派，那麼他為了防止他們認為不十分親美的人物當選，他會採取甚麼樣的手段呢？因為軍中各派閥都對金大中的意識型態的「清白」存有不信任感，且美國的政策設計者的意見又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我認為我的關切是相當現實而深刻的。

康：說實在，我不知道美國政策設計人是如何看現狀的。如果李潔明大使擔憂不是無條件親美的金大中可能當政，那麼對以軍事政變奪得政權，近來縱容部下的保安警察把學生的頭壓進水裡窒息而死的軍事獨裁者？為什麼不憂慮呢？

大使每天都獲得有關這個政權的性格的情報，他很瞭解。可是他對於向來不曾

幹過這種罪行，只不過想參加選舉的像金大中這樣的人物，却要發動各種各樣的毀謗。上面說的不過是最輕微的一項。現在，李潔明大使不得不和金大中面對面接觸了。就像你說的，在這以前，美國的政策設計者一方面毫不理會金氏，一方面又中傷、攻擊他。

關於非難金氏在一九四〇年代左傾過的事，你所提的意見非常重要。八〇年代金大中被誘捕的時候，政府方面的說辭是，他在一九四五年或四六年，曾參與和木浦的人民委員會有關係的左翼青年組織。我曾經寫過有關那個年代的書，所以對這件事很有興趣。在那個階段，很多不同政治立場的愛國人士，都和地方政治發生過實際關係。那些人的確是左派分子，但同時是反日的，也反對在日本軍隊控制下工作的韓國人警察。而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政策是支持同類的秩序維持勢力。

在韓國政治領袖中屬親美派的金大中，因為這段歷史，受盡美國大使或韓國現政權的攻擊，說他的意識型態背景可疑。事實上當年關心政治的韓國的愛國者，沒有一個不參與那個運動。而正當年輕的金大中也有過關係，我認為是當然的事情。

策劃軍事政變

沙：李潔明大使提到四〇年代金氏的活動以後，接著表示實際上他更關切七〇年代金氏在日本的情況。李潔明說，當時，金氏和一些「明知其為北韓的支持者」有所交往。一九八〇年金氏的起訴書中有一部分就是敘述他在日本期間的這類活動，這也成了判他死刑的實際理由。

康：金大中居留日本，是一九七二年南北共同聲明公佈後的事情。當時出身朝鮮半島的人經常開會。舉例說，我曾經出席過由朝鮮總連和民團兩團體合辦的群眾集會。那次有人演講讚揚四〇年代的民族主義政治家。

在國家分裂四十年的今天，即使有些政治家對統一表示熱心，美國人爲甚麼對他不放心呢？他的表現一方面證明了與美國之間的距離日漸擴大，另一方面也證實了韓國民衆的願望。如此而已。

美國四十年來，想永久分裂南北韓，一味煽動加深南北韓的對立，認爲冷戰中的朝鮮半島，高度的緊張才是常態。美國把不肯支持民主選舉的想法，暗示出去，讓有意搞政變的人去利用。

沙：和李潔明大使的交談中令我吃驚的還有一點。當金氏被問到防衛政策的時候他說，「南方要相信北方已經改變 支配全韓的企圖之後，才會改變防衛的態勢。」我覺得這種回答是可以接受的。但大使却十分在意這句「直到 until」，爭辯說這種用詞使大使館困惑。因爲它有「總有一天要減低南方對北方的防衛態勢」的含義云云。這樣一來，美國的企圖就暴露出來了，它認定目前的分裂是永久性的，毫無降低緊張的方法。

康：大使告訴過你的話裡面，表明了一種基本假說：美國四十年來並不想努力緩和朝鮮半島上的不合理的緊張，而只一味煽動加深南北對立，並且認爲浮在海上的冷戰中的半島，高度的緊張才是常態。這種想法太荒唐了。

沙：從美國對統一問題、防衛姿勢、朝鮮半島的緊張等問題到對特定人物的評論，例如對某些人堅決表示其可疑不足信賴，美國所表示的意圖是，暫時不再積極阻止金大中當選大總統，但對他的批評還要推廣。

康：這種（大使談話）評論的可怕的地方，還不在於對金大中的中傷效果。真正的殺傷力在於它對有意搞軍事政變的高級軍官能發生煽動作用。也就是說，送出一種信號，暗示美國不支持可能使不十分親美的，

在對北關係上不可靠的人物當選的選舉。美國不肯支持民主選舉，不接受其結果，却把這種意思暗示出去，讓有意搞政變的人去利用。

沙：這就是一種「舞台前舞台後」同時進行的政治權術了。表面上主張美國對韓國的政治情勢不施以影響，也無力影響，實際上則透過我們討論過的各種形式的活動或態度——利用美大使館、軍部或情報部，再加上政府高官訪韓時的談話——事無大小都在發揮非常重大的影響。其中還包括策動政變計劃的可能性。

論學生運動

康：你說得對，但華克、李潔明兩位大使都經常嚷嚷美國已經不對韓國政治施加任何壓力或影響力。

我想從六月事件中檢出幾點我認爲要緊的事情。首先是，從這一連串的事實，可證明向來對韓國情勢所宣揚的 流行說詞是一套謊言。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流行說詞是「學生是孤立的激進派，不擁有大眾的支持」。從反全斗煥示威中的車輛鳴笛，到中產階級湧出街頭，這些情況都證明了上面的說詞的虛偽性。不過現在，似乎有一種雖然有趣，但也令人擔心的事態在進行中。這個事態和四〇年代同樣，或者和一九六〇到六一年的時期很相近。也就是說，學生們是打開重門的破壞槌，其作用是掃除壓制韓國政治的勢力，清出國民能發表自己意聞的空間。

韓國勞工已在大規模的罷工中表現自己。韓國當權者和美國 都害怕工運，他們向來不關心勞工，從來 也沒支持過。

中產階級可以說在六月事件中已經表示出自己的想法。以整體來說，那些意見是，對全斗煥及其政府已經無法忍受。勞工也已經開始在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中表現

自己——最近有一些大工廠被勞工封閉了。這對現政權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它不僅影響整體的經濟，同時也對一個輸出國的國際形像發生影響。再加上，像六月的「華爾街新聞」上的警告，引用了漢城的企業家的談話說「學生們要運動是無可奈何的。民主運動也還可以。但勞工們一開始要求改善勞動條件或增加工資而進入爭議，那一切就大亂特亂了……」。可是，現在正是這樣的事態出現了，引導出非常廣大的反政府聯合。

這是韓國前途有望的徵兆，但對全斗煥或盧泰愚及其支持者，或美國來說，是極端可怕的情況。他們向來毫不關心韓國勞動者的自發的工會運動成改善待遇運動，從來也沒有支持過。對一九六一年以來推動韓國，領導高度經濟成長的人們來說，他們一定非常不安。他們生怕數個月後舉行選舉，像金大中這一類人物上台，所有的工廠都會開始大罷工，組織全國性工會等，可以說惶恐到極點。

面對著這樣的情況，金大中會怎樣呢？我想大概會以民主主義的立場，不至於和勞動者對立，而會和他們聯合。這個問題非常重大，已經超越我們先前所討論過的人物評論的範圍。那是觸及戰後韓國政治的核心的問題，也就是，可否容認這類活動的問題。

沙：同樣的質疑已經在漢城出現了。不論是對反體制運動共鳴的人，還是採取批判態度的人，都一致認為不管甚麼人上台，勞動問題是最大的課題。即使反對黨上台成為執政者，要想出一種不破壞整體經濟而能解決長年以來受抑壓的勞動者的要求的方法，是極為困難的吧。這個問題的確重大，我也想像到美國對此地勞工運動的趨勢會加以注意。

韓國青年認為美、蘇企圖支配朝鮮，才造成南北韓的分裂。美國對韓國人口中佔相



當份量的年輕一代認識不足，造成美國對韓政策的多次失敗。

康：今年夏天我不在韓國而在美國。令我吃驚的是，美國人可以說是破天荒第一次開始知道韓國學生或大眾運動的年輕指導者的主張。究竟美國人對學生領袖的主張會有甚麼樣的反應呢？我覺得這一點很有趣。舉例說，最近的「紐約時報」刊登了對延世大學學生組織委員長的訪問談話。美國記者問：「韓國的分裂不是因為一九四五年蘇聯駐軍和不承認統一政府的選舉所招來的嗎？」這個質問其實表示發問的美國人對韓國歷史的理解有多偏狹，但學生的回答是這樣：

「一直到高中，我們也被灌輸這種說法。不過後來我們知道了真相。分裂的理



由是：就像蘇聯企圖支配南方，美國本身也希望支配北方。這就是分裂所由來。如果當年美國承認韓國人自己組織政府，分裂是不會發生的。」

我相信，這個回答比「紐約時報」記者的質問，更接近四〇年代的歷史。同樣在最近的「時報」介紹的反體制詩裡面，韓國的狗問美國的狗：「你們國家的狗，為甚麼比韓國的勞動者享受更好的待遇呢？」。如果老一代的美國人聽到了，說不定會生氣。因為他們的瞭解是，美國犧牲了三萬五千人士兵，還花了多少金錢，才把韓國從共產主義拯救出來。

不過，韓國的年輕人已經不再那樣相信，而事實也不是那樣。因此，他們越學習本國的歷史，就對美國的政策和美國在韓國的所作所為越反感。實際上，像李潔明大使或他的幕僚，應該從頭檢討美國的

政策，努力去理解韓國民衆究竟主張甚麼？否則這距離是無法彌補的。

沙：美國喜歡把學生稱為急進派、過激派，說他們沒有中產階級的支持，他們的立場和北韓相近等等。這種說法正表示美國人毫不了解問題的嚴重性，也不知道韓國學生或青年對自己國家的基本問題已有深刻的了解。美國對韓國的年輕一代——現在經佔韓國人口中的相當部分——認識不足。這也是美國對韓國政策之所以多次失敗的原因之一。即使經過六月事件，美國仍然不會去測度民衆——不單是學生——對高壓政權的憤怒和不滿有多深。

康：美國再三再四——在伊朗、越南、希臘、阿根廷、菲律賓，及其他地方——支持獨裁體制或軍事政權，而一旦這些政權垮台，則不支持民衆而支持另一個高壓政權，因此而到處遭到民衆的憤怒反應，這種經驗已累積了不少。我們如要瞭解希臘當權階層的反美態度，不能回溯尼克森時代支持過該國的軍事政權。看到韓國的年輕一代愈來愈不滿美國，美國人為甚麼覺得驚奇？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政府當局及其他許多人，似乎對韓國年輕世代的離心只是感到驚奇，而不想深入瞭解。

對北韓的「笑臉外交」

沙：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在世運會以前會不會改變呢？

康：美國的北韓政策中，是否正在進行著某些令人好奇的事情？特別是，今年三月初舒茲訪問中國（共）以來。

詳細的內情我們還不知道，不過有打開局面的跡象。首先是，美國表示有意結束和北韓之間的對立。其次，這種用意可能經過中國（共）傳遞到北韓。這一點是有些證據的。它的重要性，是因為自從雷根上台以來，中國（共）一貫地扮演著緩和和北韓間的緊張情勢的仲介角色，至今為

止美國試過幾次訊息。這次似乎第一次有了反應了。

一連串的嘗試後，美國採取了所謂的「笑臉外交」。西格爾最近在紐約的演說中提到，美國歡迎北韓表示緩和緊張的任何意志或行動。西格爾且毫無理由地稱讚北韓在韓戰後所達成的工業發展。雖然那是事實，但美國的高官承認北韓的工業發展成績，是史無前例的。北韓方面也在今年的夏季，招待了不少美國團體。其中數位代表說，北韓當局表示今後將擴大這樣的交流。也許這和世運會有關——一般韓國人或美國人都希望世運會能順利舉行，想儘量減少混亂和北韓的參加機會。

因為伊朗事件的結果，雷根政府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在外交政策方面陷入麻痺狀態。國務院的角色愈來愈重要了，於是舒茲等人變得非常積極。舉例說，在美蘇裁軍會議方面，也提出了雷根政權向來無法提出的議案。

美國爲了突破本身的外交困境，並協助韓國執政黨順利完成權力的交替以繼續執政而對北韓略施小惠，推動「笑臉外交」。

在國務院的基層或中級幹部之間，這十年來逐漸產生出一種認識，認爲和北韓的某種交往，可能對美國有益。我們都知道卡特政權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雷根政權的下層人員也是如此。因此，趁上層，也就是白宮，陷入麻痺之際，國務院內部的某些人針對過時的北韓政策施以一定程度的修改，這種可能性是有的。我們期待現狀能有一些改變。

沙：如果在朝鮮半島的外交方面——包括緊張情勢的緩和——能獲取某種形式的顯著成功因伊朗事件而陷入困局的雷根政權即可藉此脫困。甚至可以替共和黨帶來八八年

選戰中的較佳機會。如果他們真往這方向去追求，可能打開的局面也許不小，是否會有相當重大的成果呢？

康：這種可能性是有的。我們也希望現實如此發展。不過有一點我想提醒一下，這樣的要因都是互相關連著的。北韓與美國之間緩和緊張情勢，和北韓方面認爲緩和緊張有好處有關，這當然會對南韓的民主化有利，那些將軍或上校們的政變機會也會減少。在我看來，人們認爲北韓能對南韓發生影響，或者說，金日成在南方獲有人民支持，這樣的認識階段應該是過去了。六個月以來北韓對美國的信號也有了一些回應，並且提出了方案。這些都是有利的發展。

沙：現在漢城也有人在推測，美國可能改變對北韓的政策。有些說法因爲舒茲訪問中（共）和日本而在韓國活潑起來。主要是，說整個對北韓的政策，要更有彈性。比方說，這半年來美國一直支持南韓提出的某種形式的南北高階層會議的方案——首先開總理級的會談，其次由兩位總統各帶下一任總統的繼承者參加總統會議。

現在盧泰愚的繼承地位有些動搖了，包裝效果方面也許要打折扣。但如果盧泰愚真的贏取了「勝利」，參加這樣的高階層會議是有利的。在北韓方面也等於是得到了對金正一的繼承地位的更確定的承認。

康：那個「package（包裝）」裡面，還裝著甚麼東西呢。

沙：爲了使跟北韓的交易「順利」起見，設計出來的方法是，由日本承認亞洲開發銀行對北韓的相當高額の融資。我們都知道北韓經濟需要海外援助。

其他的要素比較次要，不過至少也是整批交易的一個部分。像北韓多年來所反對的南北韓同時參加聯合國案、南北合組世運會代表隊等等。

這些方案，可以說都是爲了催促北韓



採取更和平更合作的態度，從而抑制意識上和現實的敵對狀態。如果在八八年初這些提案能初步實現，那就對盧泰愚的繼承政權大大有利，而美國的共和黨也將在選舉前提高聲勢。

韓國國民只有對美國及執政黨持續加強壓力，才能奪回主宰本國政治的自主權。

康：不管這些計劃的實際的詳細內容如何，人們談論這種政策變更的可能性總是好的現象，我們應該支持。因為這有助於提高南韓的民主。

沙：當然我們也要警惕，這些整批交易方案可能是為了幫助執政黨實現「和平轉移政權案」。韓國的市民——當然也包括反對黨——大概也看出了這一點。不僅如此，美國為了使韓國國民接受不必改換政權的想法，或為了使韓國人民承認執政黨內毫無實質意義的政權交替，而搞出這套策略來玩弄南北韓關係這樣重大的問題，也許會引發韓國人民的憤怒。

最後，對南北韓和朝鮮半島全體，美國應該有甚麼樣的政策？

康：我所希望的政策，却少有實現的可能。像：撤退駐韓美軍，不再介入韓國的政治，有關南韓的政治體制、誰來擔任大統領及對北韓應採取何種政策等，全部讓韓國國民來自行決定。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不過這幾年來，韓國國民對本國的政治問題和美國的對韓國政策已經爭回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了，這一點是令人鼓舞的。美國政府當局，突然間必須對為甚麼多數國民要湧到街頭？為甚麼韓國人民希望選出美國不支持的人物？這樣的疑問提出說明。這些都是好現象。

不過退一步講些現實中的情況吧。美國目前對南北韓的政策，可能今後還要延續一段時日。

換句話說，美國一方面加強不介入韓國政治的姿態——特別是不支持軍方，一方面更積極地和反對黨的金大中等人接觸，認真對待學生或青年領袖。美國不得不這樣做。對北韓的試探也會繼續。不過結論還是悲觀的。韓國的體制也好、美國對韓政策的基礎也好，我們還是看不出結構性的變化。為了使民主化真正實現，使美關係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展，必須有某種根本性的變革。

沙：你把我開頭提出來的問題——如何做才能改變美國的對韓政策——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出來了。如把問題拉回原點，我們大概只能說，這樣的變化，只有韓國國民本身，繼續這幾個月來的聲勢和態勢，奪回對本國政治的自主支配力量後才能發生。

從一九六〇年、七一年、七九~八〇年到今年六月，韓國人民每隔十年就力圖取回主宰本國政治的主權。然而，美國政策既不可能自行改變，也不會臣服於美國輿論的壓力。這意味著，韓國問題仍應歸韓國人解決。韓國如要得到根本的變革，就必須持續加強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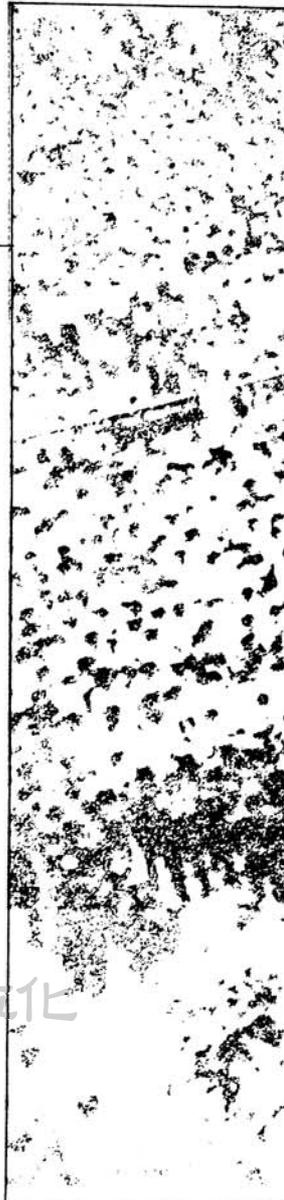
康：這是絕無問題的。韓國的內政應由韓國的國民來決定。

◎南韓六月革命特輯◎

「六月民衆革命」的軌跡與展望

■洪鯤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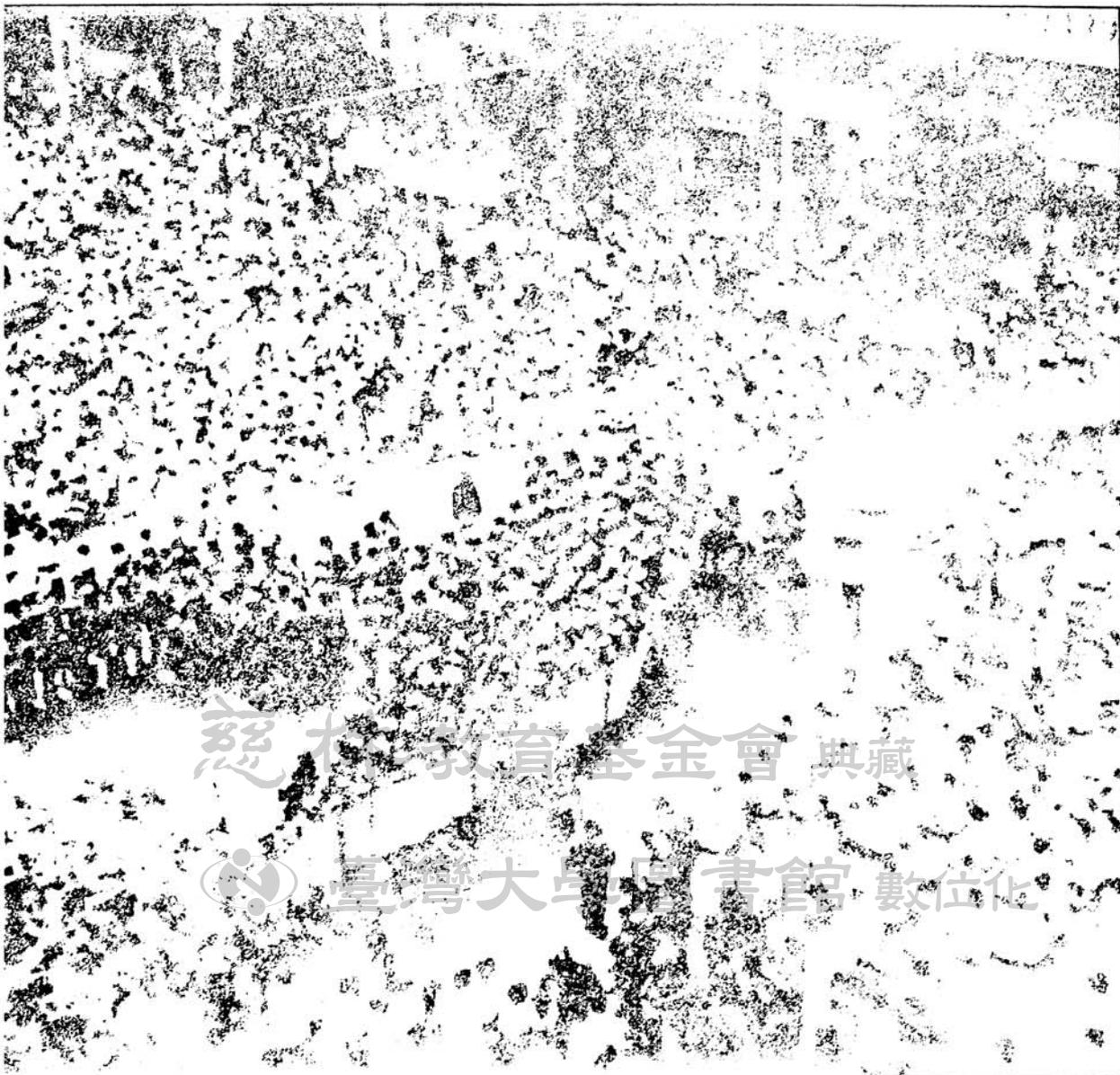
■對談 金淳一 (民法學者)
安江良介 (「世界」雜誌總編輯)



• 民主勢力在組織上、

美中(共)和解後， 亞洲冷戰結構的變化

安江：自從美中(共)和解(1971年)後，亞洲的冷戰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擔當美國冷戰政策前哨的菲律賓和韓國，自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在韓國，朴正熙政權於1972年7月發表南北韓共同聲明並進行紅十字代表團南北互訪的同時，在當年秋天宣佈了戒嚴令，進入自稱是「維新體制」的戒嚴時期。



、戰略戰術上趨於成熟；六月十八日，學生包圍鎮暴警察，靜坐示威

有鑑於七二年夏、秋之間韓國政治體制所發生的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七三年五月號本刊製作了「對韓國現狀的憂慮」特集。當時雖有人對這個特集的製作企圖表示懷疑和批評，但實際上，那時發生的那些令人矚目的事態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個特集刊出先生的談話，談到進入所謂「維新體制」的非常體制，朴正熙政權的特質與未來。四個月之後，我訪問金大中先生，金大中先生表示，先生的談話

給他「極大的鼓舞」。

刊載金大中訪問的『世界』九月號發行的那天，即1973年8月8日，金大中在東京被綁架。韓國情勢忽然緊張起來，日韓關係的種種矛盾，一下子全都暴露出來。

「六月革命」是民主·民衆·民族的結晶。預測韓國情勢必須有歷史的眼光，重新評估朝鮮的近·現代史及民族主義史一定可

以發現朝鮮問題的關鍵。•

1982年秋，本刊再度訪問您，當時是從朴正熙政權在民衆的反抗下瓦解，出現了所謂的「漢城之春」談起，最終討論到1980年5月因光州事件掌握政權的全斗煥政府實行民主化的可能。

今年六月以來韓國政治情勢的變化，我稱之為「六月民衆革命」。我想這個歷史的重大轉變，可說是革命的過程。不知道韓國怎樣稱呼它，總之是民衆的勝利。民衆徒手對抗軍方及大國的干涉，獲得勝利。這是一場漫長的鬥爭，是在各種運動力量的團結匯集之下——如民主運動人士所說的：「民主·民衆·民族的結晶」——所獲致的勝利。在民主·民衆·民族這三層意義下，我想它可以稱之為民衆革命，這是一個歷史的大轉變。

「六月民衆革命」對韓國的未來，以及南北韓之間的關係具有重大意義，現在已可看出某些端倪了。這使我想起您常說的：「韓國的民主化問題對整個東亞有重大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我以為重估這個事件，賦予歷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許多人認為日本新聞界及專家們對韓國情勢的報導和評論太膚淺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不是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事情的緣故。

我不是韓國問題專家，但由於長期關心韓國問題的體驗，我確信：預測韓國情勢必須有歷史的眼光。很多人說：「朝鮮問題是個複雜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這話不錯，可是我以為，問題固然複雜，但根本的癥結也不斷清楚地呈現出來。我想

，如果重新評估朝鮮近、現代史，以及朝鮮民族主義的歷史，一定可以發現在複雜的表相之中，決定朝鮮種種問題的是那些基本要素。因此，我想請您一面回顧歷史、一面評論韓國及南北韓的情勢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請您先就「六月民衆革命」談起。

六月革命是第三世界民主運動的一環

金：首先我要感謝『世界』雜誌和岩波書店在韓國漫長的民主化鬥爭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同時，我以為『世界』之所以能夠預測到韓國目前的情勢，而其他傳播媒體大都無法做到，這裏面隱藏了一個重大的問題。這跟日本人對整個國際政治的認識膚淺有關。

從歷史來看，任何既得利益的國家或階層，從來沒有自動放棄過特權。邊緣國家要求變革，因而引起了世界史的變化。

日本大多數人之所以缺乏政治智慧，可能是因為一開始就認定政治是無法改變的。既然認為政治是無法改變，自己無論怎麼做結果都是一樣，自然就會錯失政治行動的機會，最終對政治逐漸喪失興趣。他們甚至認為，其他國家的情況大概也沒有兩樣。這樣，他們把現存的權力當成絕對的，以此為中心來思考。

專門研究韓國或朝鮮問題的學者們，根本就不相信韓國人民對南北韓問題有什麼影響力，他們以為民衆怎麼說都沒用。由此，他們對朝鮮的現實自然越來越沒有見識。

相反的，有些人認為，儘管困難重重，但東亞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做法是必須改變。他們相信民衆具有改變的能力，也相信必須團結奉獻於民衆的戰鬥行列。這些人和那些自暴自棄的、悲觀主義的，因而對歷史變革毫不關心的專具有完全不



同的認識。我以為『世界』正是這些人的代表。

不把「六月革命」當成是必然的結果，而是把它當作突發事件，等事情過後才提出種種解釋，這並不是從實踐之中建構事物觀點的做法。『世界』一方面實際參與朝鮮南北問題、南韓的民主化問題，乃至日韓關係，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地努力建構理解、解釋這些問題的理論。對這一點，我們深表感謝。

事實上，我以為韓國正在進行著革命。誠如您所說的，通觀韓國近代史的整個流變，歷史必然會走到現在這個時點。可是，韓國軍方，以及日本、美國的一些反動人士，現在却繼續掙扎著，一再地否定偉大的民衆革命的光榮，一再地把人民的勝利解釋為權力當局的民主化，竭力地在守護這個專制政權。

「六月民衆革命」——在韓國內還沒有使用「革命」這個字眼，但是也許過一段時間，會稱之為「六月革命」吧。

日本人的國際認識

這樣的革命是怎樣達成的？怎樣來界定這個事件呢？關於這些問題，有許多解釋。現在我姑且舉出兩點來說明。

(一)、反對當權者的革命勢力急速成長，是完成六月革命的主因。這跟 1960 年 4·19 學生革命作個比較，就可更清楚地看出其變化的內容。

(二)、現在整個第三世界實行軍事獨裁的國家都在進行著民主革命，韓國的六月革命可以說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運動的一環。那是由希臘、葡萄牙、西班牙開始，經中南美、菲律賓，現在輪到韓國。在歐洲發起的民主革命，繞了地球一圈，抵達韓國。這是世界史現象，韓國之後，革命的浪潮一定會波及其他地區。

現在世界上具有支配力的中心國家——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在

這些中心國家邊緣的國家，都在發生民主革命。最大的中心國家——美國，對這一點也不能不妥協。從歷史來看，任何既得利益的國家或階層，是從來沒有過自動放棄特權的。邊緣國家要求變革，因而引起了世界史的變化。也許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歷史的架構，去掌握這次韓國的事件吧！

日本的新聞界畢竟沒有這種觀點，才會把六月的民衆抗爭看成一個孤立的特殊現象，甚至極端一點的，只是把它看作是一次麻煩而已。

要評論日本人，必得先檢討日本是否具備洞察世界史的變革眼光。大多數的日本國民滿足於日本今日的地位，他們不願看到歷史的變革，不願尋求更正當的歷史行動，因而自陷於一廂情願的認識論。

他們沒有把六月革命看成是民衆為追求社會正義與民主主義而戰的革命，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是一次值得歌頌的重大歷史變革。日本新聞界以及專搞韓國問題的專家，不少人持著偏頗、扭曲的觀點。他們不是抱持著反倫理的、非歷史的態度，就是摻雜了某些意識形態的要素。

安江：您說得沒錯，日本人很少有以世界史的觀點掌握韓國民主運動的眼光。

不僅沒有世界史的視野，大多數的日本人把朝鮮問題看作已經解決了的、結束了的問題。其實，連日韓關係都可以說還沒解決。1965 年訂立的日韓條約，在日本政府看來，是以為跟南韓的殖民地關係做了一次總結算。可是 20 年後（1985 年），全斗煥大總統訪問日本時，却高唱「日韓新時代」、「真正合作的時代」，說是從此要建設日韓真正的合作體制。這件事本身就已說明了日韓條約並未真正帶來日韓之間的和解。也許由韓國經濟本身具有的種種矛盾關係，加上日韓經濟關係存

在的摩擦與對立，如果兩國人民沒有真正意義的和解，我想，經濟問題恐怕會發展為經濟以上的問題。

日韓關係都如此，至於跟北韓的關係，經過42年了，一直還沒有就殖民地關係做一次清算。日本政府甚至沒有清算的打算。這是不正常的，而許多日本人却以為朝鮮問題已經解決了。這一點跟蘇聯、中國（中共）、甚至一直插手干涉朝鮮問題的美國等均認為朝鮮是一個極不安定、問題重重的地區，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

尋求解決朝鮮問題的行動已經出現，朝鮮問題已增加了新的重要性。例如蘇聯就已透露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的徵兆，戈巴契夫體制一方面對蘇聯的社會主義作根本的反省，同時在國際政治上尋求美蘇和解之道，並把重心由歐洲逐漸轉移到太平洋、亞洲地區。在美蘇首腦會談的地區性問題之中，朝鮮問題的比重逐漸提高。中國（中共）也在尋求其鄰接的朝鮮的安定。中國（中共）在韓戰時由於麥克阿瑟將軍擴大戰爭，曾派遣義勇軍參加這次戰爭。美中和解曾為了這個原因長期遭遇到困難。目前中國（中共）為了現代化，對朝鮮問題應該會寄予強烈的關心才對。美國方面，為了維持在此一地區的霸權，也正尋求朝鮮的安定和南北韓之間一定程度的和解，以實際解開美朝關係的結。

金：是的。當菲律賓發生「二月革命」的時候，日本豈不是也幾乎完全沒有預料到嗎？日本人——政府不用說，連新聞界對世界變革的認識一直都是十分落後的。這可能有許多原因。現在的日本人論，我不能不感到有點流於唯心論。我認為要展開日本人論，必得先檢討日本是否具備洞察世界史的變革的眼光。

日本曾經把朝鮮納入支配之下，甚至曾經企圖把亞洲納入支配而失敗，應該能夠體會以朝鮮為中心的東亞問題才對，但事實却不然。

大多數的日本國民滿足於日本今日地位，因而把世界現況看成是已經解決了的。他們不願看到歷史的變革，不願尋求更正當的歷史的行動，因而自陷於一種一廂情願的認識論。日本人的國際認識，基本上是非常唯心的，對於不符合日本人利益的事件就不去思考其意義。

許多人對社會主義提出嚴厲的批判，其實資本主義國家正缺乏自我淨化或自我變革的能力，美國和日本到處瀰漫著一股自暴自棄、得過且過的態度。

剛才您談到蘇聯和中共。確實，戈巴契夫的行動，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社會主義是否有能力自我調整的考驗。中共也是一樣。不知道他們是否具有從官僚主義化的社會主義脫胎換骨的能力。這跟北韓也有關係。北韓有沒有自我變革的能力，對我們是最切身的問題。

許多人對社會主義提出嚴厲的批判，那麼資本主義國家是否有自我淨化或自我變革的能力呢？事實正好相反，美國和日本到處瀰漫著一股自暴自棄、得過且過的態度。在這種意義下，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比社會主義社會具有更大的自我淨化和自我變革的能力，仍大有問題。

安江：您說日本人只憑直覺看事情，沒有歷史的眼光。確實，我們的傳播媒介無法正確地告訴大眾鄰近的韓國正在展開的民衆革命是怎麼可能發生的，是誰使其成為可能的。誠如您所說的，只是把它當作一種麻煩，一種騷擾。我想這是緣於日本人的朝鮮觀。這種朝鮮觀很難促成日本人和朝鮮人之間真正的理解與和解。

今年四月，新民黨之中的大部份人另組新黨——民主統一黨。日本的報紙說那是「分裂」。我想這是不正確的。但是全斗煥大統領以為這是好機會，發表特別聲



承晚政權依賴美國，終被美國所棄。圖為韓戰中的克阿瑟（左）與李承晚（右）

明。說，目前不宜修改憲法，等奧運過後再說。民主勢力激烈反對。日本報紙報導說，4·13事件使得過去一年來修憲的努力付諸流水，因為新民黨分裂了。也就是說新民黨的分裂反映了民主勢力的脆弱。其中有一篇社論說：「像修憲這類重大問題，需要有充份的時間，作細密的討論。如果非得在當前重新討論修憲問題，則只有採取執政黨所建議的議會內閣制改革案與修憲案」，這完全支持全斗煥大總統的想法。

我在4月19日的一個集會上說：「這則社論，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第一，修憲問題只是過去一年才發生的問題嗎？第二，4·13事件反映了韓國民主勢力的脆弱嗎？」

李承晚政權與4·19學生革命

第一個問題，按日本報紙所說的，修憲案是過去一年的問題。但根據我的了解，無論怎樣把時間縮短來看，至少應該從1969年算起。1969年朴大總統爲了想要永久掌權，乃極力壓制民主勢力強烈的

反對，自己修改採取美國式的四年兩任制的憲法，實現所謂的「三選改憲」。1971年春舉行了大總統選舉，那時在野共同推舉金大中爲候選人。

這次選舉的結果，金大中以極爲接近的票數，敗給了朴正熙。金大中說：「如果沒有選舉舞弊，我已勝利了。」事實是否如此，我們沒有證據，可是事後，朴大總統却爲我們證實了這件事。

大概是強烈畏懼深受民衆支持的金大中給予他的威脅，他做了兩件事：(一)、於1972年宣布了「維新體制」，在這個戒嚴體制之下，制訂新憲法，中止大總統直接選舉。(二)、翌年八月，在東京企圖謀殺金大中。朴氏政權之後，以光州慘案竄起的全斗煥，將任期改爲七年一任，仍維持間接選舉。

因此，韓國民主勢力要求恢復總統直選舉制，是從1969年開始，至今已近20年的老問題了，而且這20年是壓制性體制的強化，以及民主勢力的犧牲、抵抗的不斷重演。這也不是單純爭議到底是議會內閣制好？還是直接選舉制好？或者是間接選舉制好的制度問題，而是民主化還是軍政化的本質問題。

金：要了解今日朝鮮的狀況，是應該回溯到1969年，更進一步回溯到戰後解放以來的鬥爭，甚至回溯到日帝時代，從整個近代民族鬥爭史去了解今日的朝鮮問題。

譬如日本史上，中世以後權力的轉移多半只有運用武士的軍事力才有可能打倒政權，但朝鮮一直是儒教社會，支配者不是武士而是士大夫，因此以武力打倒政治權力的勢力並不存在。當進入革命狀態時，往往是知識份子和民衆結合起來，造成權力的交替。譬如1873年崔益鉉打倒了持續十年統治的大院君權力，是憑什麼力量打倒的呢？不過是一紙上疏文罷了！上疏文列舉當權者的罪狀，流傳全國，於是儒者和民衆都站出來，當權者便在頃刻間

垮台。

這種知識份子與民衆的聯合，在近代史上也發生過好幾次。知識份子具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使命感。1960年的4·19革命也正是那樣的革命。首先是知識份子與學生先戰鬥，然後民衆參與結合。後來雖爲軍部所鎮壓，但鎮壓又產生抵抗。在不斷的鎮壓之後，這次知識份子和民衆再度成立了聯合。

今年三月、四月、五月，韓國所有階層的知識份子爲了追求民主而挺身抵抗，發起簽名運動，造成大聯合。那時我就預想，時機已經到了，如果民衆響應的話，也許會發生革命事件。

4·19革命可說是平民革命，也是民族革命。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這三個政權的共同特徵是：①修改憲法上大統領任期與選舉方法②貪污③鎮壓民衆④背後不斷有美國的支持。

安江：是的，從先生那兒得到「勝利已經近在眼前了」的消息，是在今年六月中旬。

金：金大中先生於七月九日獲得赦免、復權，那一天『東亞日報』發表了他的一篇非常重要的訪問談話。他非常明白地談到我剛才提到的韓國歷史上的政治形態，尤其

是政治變革的形態。

他這麼說：

「1960年4·19革命時，國民站起來了，但被軍方的勢力壓抑下去，然後國民又站起來，又被壓制下去。但這次不同，軍部勢力動員了所有的暴力，而國民却毫不畏縮。……（因此）五千年來，國民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在歷史舞台上登場。國民表現了威武不能屈的勇氣。這種事情，只有在人民成爲歷史的主人翁時，才可能發生。」

安江：朝鮮自從1945年8月擺脫日本殖民地統治以來，在南韓，除了過渡期以外，統治者都是長期受到民衆的批判與抵抗，民衆的力量推翻當權者，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1960年4月，第二次是1979年秋，最後是這一次。您剛提到了金大中先生的談話，說這一次才是劃時代的一次。爲了展望將來，我想再請教，如何看待以前的兩次？

先談1960年4·19學生革命吧！學生革命顧名思義是以學生爲中心。以赤手空拳打倒貪污腐敗的李承晚政權的這一次革命，被認爲是日後民主化鬥爭的精神基礎。李承晚政權是受美國扶持和以白色（反共）恐怖起家的政權。軍事上不必說，即連經濟上、政治上、國民生活上，一切

4·19 學生革命

1960年3月15日，李承晚政權時代，馬山市民因大統領選舉舞弊，憤而起義，一位參加示威的中學生金朱烈慘死於警民衝突中，於是打倒李政權的鬥爭擴及全國。4月19日漢城各大學學生參加遊行，隊伍向景武台（大統領官邸）前進時，警官隊開槍，死傷甚多。同月26日，李承晚大統領宣布下野，携其夫人亡命夏威夷。

韓國的學生運動於獨立後便開始進行排斥親日派教師運動，李政權蠻橫鎮壓學生運動。4·19學生革命是以學生爲中心的運動。打倒李大統領之後，學生提出自由與民主、祖國自主的和平統一、經濟自主等改革口號，但因欠缺將民衆的希望理論化、組織化的能力，翌年，朴正熙搞軍事政變，學生的理想終未能實現。

——前田康博

一切都依存於美國。美國在二次戰後的冷戰政策下，的確非常需要這類政權，但是完全依賴於美國的政治體制，自然會滋生極度的貪污腐化。

1956年，李承晚進行大統領可以無限期連任的「三選改憲」。為了修憲，需要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議席而解散國會，進行了一次集貪污、舞弊之大成的選舉。可是選舉結果，執政的自由黨仍然達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包括強力收買無黨籍議員，總共得到135票，仍然差三分之二的136票1票。於是李承晚政權提出採取四捨五入以達到三分之二的謬論，修改了憲法，史稱「四捨五入改憲」。

四年後，舉行大統領選舉，進步黨的曹奉岩是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但1958年7月，曹奉岩突然以北韓間諜的罪名被捕。但是審判結果無罪，李承晚政權乃強烈干預法官，同年10月在高等法院判處死刑。翌年2月27日在大法院判處死刑確定，十幾個小時之後便執行處死。

在這種異常的政治氣候下，1960年3月1日舉行的選舉，在野黨並未再提名候選人。儘管如此，為了使執政黨提名的副大總統候選人李起鵬當選，做了極惡劣的舞弊。閔寬植（曾在朴氏政權擔任政府、議會要職）所寫的《韓國政治史》詳細記載了那次選舉舞弊的實情，令人驚訝而記憶深刻。這次舞弊選舉激怒了學生，怒火燒及全國，連中學生都參加，犧牲了不少人，終於使得李承晚政權垮台。

因此，4·19革命可以說是平民革命，也可以說是民族革命。環繞著大統領任期與選舉方法的修憲問題及貪污、鎮壓三者，是李承晚政權、朴正熙政權、全斗煥政權共同的特徵。另一個特徵是，在政權背後，不斷有美國的支持。

並不全部聽命美國，全斗煥政權却是唯美國之命是從，政權隨著歷史的前進而惡化，相反的，國民却快速的成熟。

金：關於4·19革命，安江先生說得不錯。不過我想指出的是，在李承晚政權下受到民衆抵抗、批判的內容，就拿選舉舞弊來說，當時的舞弊還不是最厲害的，其後的軍事政權，舞弊的情形更是直線升高。貪污問題也是一樣，由現在看來，當時的貪污簡直不算一回事，現在貪污的規模之大，不是當時所能想見的。

在政治權力上，對美的依存度也是直線升高。美國是把李承晚拋棄了。李承晚政權雖然誠如您所說的，結構上全面依賴美國，但李承晚本人却也有不聽話的時候。比較起來，現在的政權簡直是對美國唯命是從。李承晚這個人曾經是亡命的抗日份子、愛國者，所以有他的個人魅力與個性，而在他之後的朴正熙因為是日本的軍人、下級軍官，談不上有什麼魅力或個性。

到了全斗煥，真正是毫無魅力、毫無作為。朴正熙喊出「現代化」的口號，多少還有一些吸引人之處，全斗煥什麼也沒有。相反的，竟然在1980年5月光州事件時，屠殺了2000名市民，因此被批評為反民族、反人性的當權者。他是最墮落的人。

在政治權力方面，我們見到了：權力隨著歷史的前進而惡化。相反的，國民却快速地成熟，民主勢力更是扮演了前衛的角色。譬如這次六月抗爭，其做法不像4·19革命是一種情緒的爆發，而是非常有組織的偉大的鬥爭。我說成熟就是指這點。

經濟、教育、文化各自孤立地發展，結果造成了政治與社會之間極度的不平衡，進而產生了不平衡的國民，為了鎮壓不

李承晚政權雖在結構上全面依賴美國，但

平衡的國民，當權者不惜動員更多的暴力。

4·19學生革命以前，鎮壓國民的只有警察勢力。李承晚是從國外回國，得到美國的支持而登上權力寶座的，但他起初還頗獲民衆支持。可是，朝鮮半島被美蘇分割爲二。在南韓，當初的情勢是「白天是韓國，晚上則爲人民共和國」。反對分裂的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民衆結合起來，支持人民共和國。

在這種情況下，李承晚亟思確立自己的權力。他是權力傾向型的實用主義者，終於和實質的勢力，即掌握經濟勢力的地主階級結合起來。這些地主在日本統治時期原本是支持日本殖民統治體制的。另一個實際的勢力是警察。當時他本人的軍隊尚未建立，所以和警察結合。但是警察在日據時期也是反民族的親日勢力。結果，李承晚的政權基礎盡是親日派，這使得李承晚一開始便具有反民族的性格。然後，爲了反共，更加强化了鎮壓民衆的權力。

1960年4·19革命導致李氏政權的垮台，翌年（即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掌握政權，在此時出現的不再是警察勢力，而是軍方勢力，並且獨占資本取代了地主階層。這裏便出現了所謂「日韓條約體制」的問題。

朴氏政權強行引進了現代化與工業化，產生了新的布爾喬亞，於是獨佔資本便與權力形成新的結合。自1961年以後的軍事法西斯政權，軍方勢力與新興的獨佔資本（學生們稱之爲買辦資本）逐漸強化兩者之間的聯盟。朴正熙政權以後的政治權力便是建立在買辦資本和軍方勢力的基礎上。當警察力量無法鎮壓日益茁壯的民衆反抗力量時，便動員了強大的軍方勢力。

朴正熙政權的登場及其本質

安江：4·19學生革命將近死了200人。當時對學生使用暴力的是警察。重要的是，當時軍方並未站在鎮壓學生的警察那一邊。金：所以4·19革命時，軍方和民衆才能站在一起。

安江：這反而成爲顛覆4·19學生革命的因素。學生打倒了李氏政權時，主張南北協商，高喊「來來南方，去去北方」，呼籲「掃除國內舊秩序」。但韓戰的傷痕把整個社會捲入了李承晚政權的反共與腐敗之下，學生們呼籲「掃蕩舊秩序」和「南北協商」導致了韓國社會的混亂。加上，過渡政權的張勉內閣太過軟弱，社會上的反應是「不要惡意的獨裁，寧可善意的獨裁」。在這種氣氛下，軍方勢力得以抬頭。

金：是的。

朴正熙政權的本質是：外受美國、日本支持，內由買辦資本和軍方結合成的武裝反共主義，反共成了控制內部與贏得美國信任的手段。

安江：1961年6月16日，以朴正熙少將爲中心抬出了陸軍參謀總長張都暎中將發動軍事政變。他們揭櫫的口號是「掃除舊惡，發揚民族正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外表上擺出是學生革命的繼承者的姿態，以此建立其政權的正統性。

不過軍事政變的真正一面是他們所提出的六項公約中的其中兩項：「以反共爲國策」、「培養反共實力」。所以掌握政權之後最先抬出來的是中央情報部（KCIA）及反共法。誠如先生所說過的，其意義可說是：在社會結構上，獨佔資本和軍方形成了結合。但我想也可以說是：武裝的反共主義出而領導國家。

朴氏政權和日本的結合是1965年的

日韓條約體制。美國為其亞洲戰略，早就要求日韓締結條約，但要到 1965 年，美國擴大越戰時，日韓兩國才都不能不接受美國的要求，同時朴氏政權也接受要求派兵參加越戰。全斗煥就是當時派兵援越的將領之一。朴氏政權接受了日韓條約及派兵援越的要求之後，獲得美國政府的全力支援，並成為反共體制的發起人，表現十分活躍。

在這個意義下可以說，李承晚政權是被動地成為冷戰結構的一環，但到了朴正熙政權，則是非常主動地擔任冷戰結構中的一個要角。

金：是的。您剛才也說過，對美國的從屬加深了。反共意識也升高了。下一階段是韓國政治權力和日本政治權力的關係加深了。

4·19 革命時，軍部沒有站在李氏政權那一邊而是站在支援國民的一邊，給人很好的印象，但却是不幸的開始。革命時，因為戒嚴令，軍隊開到街上去，老百姓出來歡迎，軍人很高興地把小孩帶到坦克上，揮舞著國旗，軍民一家，其樂融融，老百姓做了一個美夢。

4·19 革命之後，混亂越甚，民主黨

一天到晚爭權奪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出現了一種希望更強有力的領導的心理，於是軍方乘機掌握政權。

不久軍事政權原形畢露，老百姓這才發覺看走了眼。支持朴氏政權的，如前所述是美國，接著又以對日關係維持政權，到了這個階段可說是歷史的轉換。剛才安江先生說：1965 年對朴氏政權來說是一個分水嶺，很有見地，對美、日關係，成為支持朴氏政權的二大支柱。與日本經濟合作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大步這個幻想，迷惑了老百姓。反共主義則是控制內部的一個手段，更是贏得美國信任的手段，因此必需加強。

4.19 革命並沒有在組織、思想上紮根，仍擁護美國的價值觀，依賴美國，因而許多當年推動革命的知識份子和學生背叛了革命，為全斗煥政權所用。70 年代後半的民主勢力則批判美國，企圖脫離美國的價值觀及美國的支援，尋求自立的發展。

我必須指出，在軍方長期的支配之下，許多當年推動 4·19 的知識份子和學生

5·16 軍事政變

1961 年 5 月 16 日，朴正熙少將趁「政局不安」所發起的奪權政變。

1960 年春，學生、市民於打倒李承晚政權之後，在張勉政權下，追求統一的運動活潑起來，61 年的 4·19 革命一週年紀念當天，學生預備在板門店進行南北學生會談。不再支持李大統領的美國，對統一運動和反帝鬥爭的勃起感到危機深重。

後來朴正熙鼓動有所謂「革命主體勢力」之稱的金鍾泌中校等陸軍士官學校八期生為中心的軍官，成功地完成了不流血的政變，朴正熙速補張都暎中將，自命為國家再建最高會議議長，翌年尹譜善大統領辭職，朴正熙乃代理大統領權限。

朴大統領再三修改憲法，不斷連任，長期實行獨裁體制，直至 79 年 10 月被射殺。在內政方面，朴政權實行不民主的統治方式，強調北韓的威脅，壓制人權，在南北問題上，提出「先建設、後統一」的口號，禁止任何要求統一的民衆運動。

——前田康博

偏離了革命路線、背叛了革命。現在的全斗煥政權周圍有許多人就是當年學生運動的領袖。因此我想，4·19勢力在軍事政權的現代化路線之中逐漸瓦解，這一事實和70年代後半期之後的民主運動勢力的性格是有很大不同的。70年代後半以來民主勢力是從社會各領域被驅逐出來，幾乎沒有人被捲入體制之中，所有人都是革命勢力的一份子，已經繼續奮鬥了十幾年了。

說起來，4·19勢力是尚未成熟的革命勢力。1960年的3·15選舉舞弊事件中，他們在社會情緒爆發的情況下起義，雖然收到很大的成果，但是並沒有在組織上、思想上紮根。美國歡迎4·19，現在却不然，因為六月抗爭是完成不斷地和美國對韓企圖及政策抗爭的革命。相形之下，在主體性方面，4·19是相當不夠好。

另外，依賴美國的傾向，並不只是當權者，一般國民也認為沒有美國的援助，韓國無法成長，即使4·19的領導者們，幾乎都絕對地擁護美國的價值觀。我以為，這就是4·19勢力後來背叛自己的根本原因。但現在的革命勢力却是企圖脫離美國的價值觀以及美國的支援，尋求自主的發展。基本上，他們是反美的，批判美國的。

安江：革命勢力之中出現了某一部份反叛者，這是革命的歷史上不斷重演的事。可是，像我們所熟知的金芝河、黃皙暎等文學家以及將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結合起來的張琪杓等4·19世代，他們在行動上則是一貫的，並且在思想上，也一直努力將4·19精神保持為民主革命的象徵。不過我只是做個補充，您所指出的，即4·19革命至六月革命的變化，確是值得重視的。

另一個問題是，1965年是分水嶺這一點。朴正熙以軍事政權掌握政權，如果真正能夠實現肅清貪污、恢復秩序，將政權轉移民政，實現軍部的諾言，不辜負當時韓國國民對軍事政變的期待，可惜他背

叛了。政變兩年之後的1963年4月舉行大統領選舉，在不久前的二月他還發表了2·18聲明，流著動人的眼淚，信誓旦旦地說他決不出來競選。可是誓言過後，馬上就組織新黨——共和黨，成為大統領。這樣的輕諾善變，在朴氏政權以及所有的政權都是常見的特徵。更有進者，也許是為了解決新黨需要經費吧，好幾件貪污舞弊爆發了，就是所謂的「四粉波動」。

看慣70年代維新體制強權的人也許難以想像，1960年代前半的軍事政權是相當脆弱的。當時有言論自由，新聞也好、雜誌也好，都嚴厲批判朴氏政權，在野黨的活動也很活潑，朴氏政權面對民衆的批判，也是無可奈何的。直到1965年訂定日韓條約和越戰發生，才有大的轉變。

1965年日韓訂約，朴正熙依賴日本日深，引起國民反感。美國也不願日韓結成堅強的聯盟，而希望朴正熙垮台。

1965年的兩項選擇使朴氏政權獲得了不少利益。第一是美國的全力支持。美國因為越戰使得美元貶值、國際上陷於孤立，當此之時，朴政權派了兩個師團參戰，美國很感謝；另外美國為了要把援韓的責任讓日本去負擔，要求訂立日韓條約，朴正熙宣布備戍令鎮壓韓國國民的反對，強行訂立，美國當然也很感動。因此這一年朴正熙訪問美國，受到詹森總統熱烈的歡迎。

第二，朴正熙宣稱：「就是被說成第二個李完用也不在乎」，毅然和日本訂立日韓條約，因而得到了日本給予的八億美元的戰費賠償。這些錢一方面用於建立工業化的基礎，一方面也給自己帶來龐大的政治資本。剛剛談到李政權以後獨佔資本和軍部的強大，也許可以說就是從1965



正熙企圖向日本靠攏，遭致美國不滿，終於死於非命。

年開始發軔的吧。

金：您說得不錯，不過我想當時的民主基礎比起全斗煥政權下的，要薄弱得多。現代化、工業化政策在經濟上表現出來的成果及變化是相當明顯的。不過，這並不能使國民滿意。每當選舉非得舞弊不可的政權是維持不了多久的。貪污也很厲害。根本問題出在國民對軍人掌握政權的反抗。於是為了維持政權，不能不使用暴力，然後又

引發更多反抗。1971年的大統領直接選舉如果沒有那麼厲害的選舉舞弊，不可能把金大中打敗。於是，1977年朴正熙宣布了廢除選舉以永久保有政權的維新憲法。

我以為，朴氏政權比現在的全斗煥政權更加依賴日本，這是引起國民反感的主要原因。必須指出的是，圍繞在朴正熙周圍的人，有許多是舊日本軍人，乃至日本殖民地時代的下層官吏，他們成為朴氏政權和日本溝通的管道。

1972年實行的革新叫「十月維新」，使用「維新」二字具有象徵意義。韓國人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印象是不好的，為什麼要用維新二字呢？我認為，1965年以後依賴日本的政治體制，大膽標榜「維新」或許是明顯地表現全面依賴日本的意圖。沒有人寫出這類的秘錄，我們不知道，朴正熙在背後和日本之間有什麼陰謀，可是……。

另一方面，美國對日韓之間的關係結合得這麼深，到底有什麼感想呢？我以為，1979年朴正熙被他的親信暗殺，原因

維新體制

1970年起，南北政權當局間秘密接觸，72年7月發表「南北共同聲明」。於是南北統一的展望顯得明朗起來。但同年10月，朴大總統突然發佈非常戒嚴令，停止憲法、解散國會，12月27日舉行國民投票，制定「維新憲法」。朴政權對這一連串政治變革自稱為「維新大業」，名之曰「維新體制」。

朴正熙出身於滿州軍官學校，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對於領導明治維新的志士心嚮往之。因此世人以為這是命名為「維新」體制的原因。

但該體制給予大總統緊急處分權等極大的權限，大總統選出方式改為由代議員選出的間接選舉制，因此設立統一主體國民會議，未經過選舉而由執政黨組成的「維新政支會」（維政會）等，使得南韓政權不可能以民主方式轉移。

勞工、學生、在野黨、在野勢力的活動也因而成為非法。現在的全斗煥政權，即是繼承大總統間接選舉制等維新體制。

——前田康博

之一是國民對這個政權的反抗非常強烈，同時，美國也一定非常希望朴正熙垮台。

美國應該不會希望在經濟上日益重要的韓國和日本結成堅強的聯盟，使得日本得以在經濟及政治方面不斷地提高其在東亞的影響力。在韓、日、美之間的三角關係之中，美國到底有什麼樣的戰略判斷？這的確是必須研究的問題。

1972年朴正熙成立「維新體制」，明顯表現依賴日本的意圖，予美國過河拆橋之感，自此美、韓時生齟齬，朴正熙之被暗殺與此有關。

安江：我想起來兩件和現在的話題有關的事。當70年代民主勢力與軍事政權之間的對立激化時，華盛頓和漢城之間開始發生齟齬。當然，這跟美國輿論界批判韓國迫害人權也有關係，不過60年代美國政府却全力支持同樣的朴氏政權。

金：是的。這可以說是和韓國軍事政權與日本之間關係日益親密很有關係。

安江：比如朴東宣事件，向美國購買稻米發生了貪污，美國國會決定追究——我關心的是，是誰透露的。在那個時代，每當日美高階層會議，日本歷任首相總會要求美國更支持韓國。

另一件事是，全斗煥以光州事件的殘忍舞台奪取政權，他第一次訪問華盛頓時，美韓政府未照會日本便作了決定，並受到雷根總統的歡迎。當時日本政府受到美韓這樣的冷落，感到十分震驚，難以容忍。我想這是和我們剛談的日韓關係結構有關。

金：是的。1972年的維新體制，大概會讓美國覺得朴氏政權過河拆橋。我想這裡面一定潛藏著許多內幕。

安江：朴政權的心腹，當時的第二號人物金載圭，為什麼會以KCIA長官的身份暗殺

朴大統領？金載圭暗殺朴大統領之後有什麼好處？誰給他的保證？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金：您說的不錯。拿這些事跟今日的六月革命比較，民主化勢力必須從這些內幕得到種種教訓。在日本，許多人認為4·19，朴正熙政變與掌權，朴正熙死亡，漢城之春，乃至這次的六月革命都是各別的孤立的事件，其實都是一貫發展的。

因此我們必須思考，4·19革命後國民的絕望、民主黨政府的無能，這些問題應當如何評估，均可以作為今後民主運動的參考。4·19革命以後國民本身為什麼會分裂？這是一個教訓。

打倒李承晚政權當時，國民是一心一德的，但後來分裂為回歸北韓的極端激進主義；另一極端則是歡迎軍方統治的極端反共心態。此外還有並不反共、只寄望軍部是政治上的有能者的新興民族主義勢力。反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左派同時對軍事政變抱懷希望，這種往事現在看來不免令人苦笑。但是他們馬上就發覺到，那樣的政治判斷——啊不！應該說是政治濫情犯了決定性的錯誤。但是，像這種事，今後一定還會再發生，我想。

全斗煥政權的產生背景

安江：現在讓我們談談如何看待繼承了朴氏政權的全斗煥政權。先回憶一下全斗煥掌權的事實原委。

1969年朴正熙為了永久執政，取消了大統領任期的限制。1971年舉行大總統選舉時，整個亞洲的情勢正急速地轉變。

越戰因為美國敗北而結束。隨著在1971年夏發生了兩次尼克森震撼——一為美元本位制的解體，二為發表了美中和解政策。接著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那位因美國冷戰政策而崛起的朴正熙，在這當口力排異議謀求永久掌權

，當然會使得朴氏政權的矛盾急速激化。

1972年10月，韓國宣布維新體制，更早一個月前，馬可仕政權宣佈戒嚴令。擔當美國反共前哨基地的兩個政權相繼宣佈戒嚴，使得美國國會大為震驚，因而在1972年11月派遣調查團前往韓國及菲律賓。在提出的調查報告書中提到朴氏政權下的人權狀況：「對市民自由的壓制比起李承晚時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嚴重。」又說：「朴大統領已經掌握他所希求的大權。如果要求大統領下台，除非他本人同意，否則只有死或革命。」

即使大國已想改變冷戰政策、尋求和解，但絕不希望在其支配下的衛星國家有所改變。由於朴正熙逐漸轉向和解，引起美國不滿，因而支持比朴氏採取更強硬的冷戰政策，也更為殘暴地鎮壓民衆的全斗煥。

在尼克森震撼引起的亞洲局勢的轉變數月前所舉行的大統領選舉中，在野黨共同推出的候選人金大中提議儘早緩和南北緊張和裁減軍備，主張修改反共法。這真是具有先見之明的主張，金大中氏之所以贏得國民的支持，我以為不僅只在於他的雄辯。整個過程顯示：在美國冷戰政策下受到挾持的政權，一旦政策及情勢轉變、政治控制逐漸鬆動、國民逐漸能夠自主地判斷，那麼韓國的民主發展將可得到最大的可能性。

但是相反地，軍事政權製造了維新體制，和日本勾結，更加緊地控制。因此，在整個七〇年代，軍事政權和民主勢力之間的緊張不斷地直線上升，這是可以想見的。我以為，七〇年代是經濟上矛盾百出、問題重重而政治上又極為不幸的時代。

金：我的看法是，即使冷戰政策改變、緊張緩和，大國也不希望衛星國家也跟著有所改變。我是說，即使大國已想尋求解凍，他

們也絕對不希望，在其軍事支配下的衛星國家有什麼改變。

1979年，朴正熙被殺時，由於美國對朴正熙乃至朴正熙周圍逐漸轉向和解的路線採取批判的態度，因而支持朴正熙死亡所引起的政治變化。全斗煥上台時，由於他比朴氏採取更強硬的冷戰政策，也以更加殘忍的方式鎮壓民衆，因而獲得美國的支持。

安江：布魯斯·坎明斯教授（Bruce Cumings）（韓國史研究者）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美國對韓政策的經過與構造，列舉了美國對韓政策的四個決策標準，其中第一點：「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人權與民主化的問題，而是韓國的戰略位置，因為朝鮮半島是防衛日本的前哨。」（『世界』1987年3月號）。

金：是的。我也認為不管是民主黨當政或共和黨掌權，美國的對韓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極端地說，越是腐敗的政權，越是對美國致命是從。

從朴正熙政權的後半期開始，韓國已經逐漸成為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如前所述，韓國和日本的結合關係如果繼續發展，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可能有所不利。全斗煥體制的一項轉變，就是美國在韓國的市場佔有率，逐漸超越了日本在韓國的市場佔有率。這是值得注意的事實。而面對了國民日益高漲的批判聲浪，全斗煥又不能不採取更殘酷的手段。

在韓國人民看來，全斗煥所謂的「反共」或者美國宣稱的「自由陣營」已不具意識形態的意義，「反共」就是暴力，美國就是獨裁政權的支持者。韓國社會內部的階級差異正在急速擴大，中產階級也在抵抗少數的剝削階級。

以全斗煥體制跟過去的朴正熙體制相比較，對全斗煥體制不能用什麼意識形態

來解釋，那是意識形態的暴力化，意識形態已經不是概念或思想形態，它變成只是暴力。我們的論據是，全斗煥掌權時，高喊「消滅貧窮」、「從戰爭的恐怖中解放」、「沒有鎮壓的社會」，還有「自由世界的理論」，但是六年統治實際證明，那些意識形態的口號都只是空口說白話。在老百姓看來，全斗煥所謂的「反共」或者美國宣稱的「自由陣營」，已不具意識形態的意義，「反共」就是暴力，美國就是獨裁政權的支持者。

因此，全斗煥掌權之初，民主勢力這一邊看到那些口號，便指出那是反民主主義，是反民族主義，是受日本支配的買辦經濟，這多少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但最近從民主勢力提出的一些聲明看來，意識形態的東西已經消失了，尤其是在4月13日的中止修憲討論宣言之後，喊出了「修正憲法！打倒獨裁！」把意識形態縮為兩個口號。6月10日，喊出的口號變成「撤廢護憲！打倒獨裁！」6月26日的國民和平大遊行，甚至變成「爭取直選制」一句話了。他們對戰鬥警察喊出「別發催淚彈！」。到最後，口號濃縮為「發射催淚彈」對「爭取直選制」，到了這個地步，美國也不得不插手了。

和4·19及朴正熙暗殺事件時期非常不同的是，美國對全斗煥政權始終相當地支持。4·19時，美國最後不再支持李承晚；對朴正熙政權，美國從1972年左右開始不太支持。但是美國始終支持全斗煥政權，現在一樣還是支持。但，對民主勢力的活動，美國也不能不讓步。這是過去和今日情況十分不同的地方。

安江：很有意思，真是一針見血。全斗煥雖有美國支持，却是最不具正統性、最脆弱的政權。

金：是的。他是殘殺光州市民而掌握政權，對國民來說，問題最大的就是欠缺正統性。加上像張玲子事件之類的大貪污事件不斷

發生，却仍然繼續掌握政權，就更加欠缺正統性了。再說軍方的支配勢力，不單是幾個軍人掌握權力而已，三軍士官學校出身的或是預備役轉任的將軍調派到社會每一個領域，人數之多前所未見。他們在公營企業位居要津，既無能又腐敗。他們之間，像全斗煥把權力轉移給盧泰愚一樣地，把權力私相授受。軍人出身的人控制整個社會，軍政、政治、行政可以說是一元化了。

韓國民主勢力一直在對抗這樣的權力結構。我到日本，看到一些搞朝鮮研究的日本學者的論文，他們大多認為韓國中產階級抬頭，因而要求民主化，而盧泰愚所代表的權力階層也相當成熟了，所以這次的權力轉移可以順利進行。我不以為然。我不認為中產階級抬頭或成為大眾社會怎麼樣。我的看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不能不根本地作階級分析的思考。應該用沒有權力和財富而無力的被支配者抵抗擁有權力和財富的支配者這樣的架構來思考。

為什麼呢？我雖沒有經濟學的專門知識，但我是運用了「第一次剝削」、「第二次剝削」這樣的觀念來思考。所謂「第一次剝削」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者的剝削，在韓國已經發展到極點了。而「第二次剝削」，這種再生產過程的剝削也正激烈地發展。在日本，富者炒地皮，把土地價格不斷抬高，實際上是對國民的剝削。像日本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以往的問題方面已經發生嚴重的危機。今後，階級分析的思考應該更加重要才對。

在韓國，第一次剝削已經進入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第二次剝奪正逐漸惡化。所以，並非中產階級的擴大，而是一些看似中產階級，實際上是在被剝削的人，提出了他們對自由的要求。如果中產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陷於自我滿足，並且第一次剝削已經不存在，我想他們一定不會參加革命。實際上，現在連中產階級也都以悲

壯的決心參加戰鬥，這意味著，中產階級並不滿足，他們正在對少數的剝削階級作階級的抵抗。全斗煥時代，經濟上多少得到實惠，可是社會內部的階級差異正在急速擴大。

剛才您提到「民主·民衆·民族」，我認為在韓國，所謂「民衆」一詞具有階級的涵義。就「民主」一詞而言，是指對抗法西斯及軍方的暴力統治，而「民族」一詞，則為1970年代後半以來明白提出的民族主義的要求。

目前民主勢力，正以「民主、民衆、民族」這三者來否定全斗煥政權。全斗煥政權一有機會是會反撲的，在這種情形下民主勢力只要不放棄這三個標準，這場戰鬥決不會中斷。

八〇年代的日韓關係

安江：從具有這種特質的全斗煥政權與日本之間的結合這一點看來，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它的一些特徵來。1965年訂立日韓條約，日韓結盟，這是很大的錯誤。條約明訂：「大韓民國政府是朝鮮半島唯一合法的政權」，這是胡說八道，明顯地違反事實。把這種主張明訂於條約之上，遭致批評說日本人的道義何在，我想是有其不得已之處。從七〇年代金大中綁架事件以來，1965年的這個決定受到了各種形式的動搖，這是必然的事。

日韓關係從60年代就是以經濟上的關係開始的，但自七〇年代之後，逐漸以所謂的日韓和解，結合成緊密的政治關係。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綁架金大中事件

1971年4月，舉行直接選舉制下最後一次大統領選舉。在野的新民黨候選人金大中以些微票數敗給朴正熙之後，因政治上加緊壓制，頗有被暗殺的危險，金大中乃出國，來往於美日之間，展開政治活動。

73年8月8日，金大中以在寄寓的東京大巴勒蘇大飯店被綁架，差一點在海上被暗殺。因美國有關人士的壓力，暗殺未遂。5日之後的8月13日，金大中以在漢城自宅前被釋放，此之謂綁架金大中事件。

在大飯店的房間內，留有韓國駐日大使一等書記官金東雲的指紋，日本司法當局乃判定是韓國公權力之犯行。日韓關係一度惡化。後來根據與金大中以有關人士的告白、前中央情報部(KCIA)部長金炯旭在美國國會的證言，證明是朴大總統為打擊異己命KCIA組織要員所為。

同年11月朴大總統派遣金鍾泌總理帶親筆書赴日說明，日本政府因此未再要求引渡犯人，強行「政治解決」，此事件遂不了了之。

其後，74年8月發生狙擊大總統事件(文世光事件)，日本接受韓國當局的搜查要求，與之有關的綁架事件乃作「第二次政治解決」。日本的主權又再受他國侵犯，並放棄索回金大中以的恢復原狀問題及說明事件原委的要求，因而備受國內外批評。此項政治解決由許多保守的政界人士、企業人士穿針引線，暴露了日韓和解的內幕。

——前田康博



●金大中回到睽別十八年的光州，受到熱烈歡迎。

象徵了這個轉變的就是金大中綁架事件。當時，已故的鄭一亨在韓國國會說：「別想一手遮天，誰幹的好事誰都知道」。雖然那是韓國運用公權力所犯的罪行，但日本政府則一味包庇韓國政府，到現在這個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日韓關係由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循著經濟、政治、軍事關係的深入而全面結合在一起。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日、韓、美更結成緊密的軍事關係，成為全斗煥時代的特徵。

進入八〇年代，日韓在軍事方面的關係加強了。全斗煥就曾主張，從軍事的眼光來看，日本和韓國的土地是接連在一起的，南韓是在替日本防衛來自38度線以北的蘇聯及北韓可能的侵略，因此日本應給予韓國相當於二個師團經費的60億美元援助。結果，日本提供韓國40億美元的援助經費。

像這樣，由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循著經濟、政治、軍事的關係模式逐漸深入地發展，到了全斗煥政權這個階段，

日韓的關係可說已是全面在結合在一起了。尤其是80年代，由於蘇聯侵略阿富汗，雷根政府上台，有人說是冷戰又復活了，第二次冷戰開始了。在亞洲也重新結成了東西對立的構造。一進入八〇年代，日本就被雷根和全斗煥所安置的反共軍事磁場緊緊地吸著。八〇年代初期，鈴木善幸因為不能適應日美同盟體制的垮台，中曾根一上台便訪問韓國，進行全斗煥所謂的「卡拉OK會談」，承諾給予韓國40億美元的援助。緊接著又訪問美國，建立日美新關係。所以，日、韓、美重新結成緊密的軍事關係，是全斗煥時代的一個特徵。

不過，全斗煥時代的日韓關係比起朴正熙時代，必然存在著一些比較不順利的因素，尤其是全斗煥政權在日本方面沒有管道。一開始，全斗煥體制就是以高姿態對待日本的親韓份子集團，這件事雖沒有表面化，但是是值得注意的。

如衆所皆知的，光州事件前夕，即1980年5月18日的晚上，金大中等民主勢力的領導者突然被捕，當時不只是民主人士，朴氏政權時代的第二號人物前總理金鐘泌以及綽號日本擔當大臣，一個月在日本住半個月的李秉禧等也被逮捕。日本方面對金鐘泌的評價，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很高的。逮捕金鐘泌和李秉禧，並長期加以拘禁，到底有什麼用意，實在值得探索。也許有關日韓和解關係的真相以及政治獻金的來源都被調查了吧？我想全斗煥有可能以這些資料作為武器向日本勒索了什麼吧？

全斗煥政權的日韓管道雖然不順暢，但是一因日、韓、美軍事關係的羈絆，一因全斗煥掌握了朴氏政權時代日韓政權之間的齟齬事實，抓住了日本的把柄，因此可以說，全斗煥政權製造了對日優勢。

金：從金鐘泌身上著手調查，固然可以得到朴正熙時代日韓關係和解的一些內幕，其實，我想美國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那些資料

，美國隨時都可以運用。美國就是掌握了這些資料，所以可以探縱日韓美之間的關係冷戰面。

畢竟全斗煥政權基本上是傾向美國的，正因如此，日本不能不重視和全斗煥政權之間的關係。似乎可以說，由於和美國的關係，全斗煥政權才有對日的影響力。既然如此，美國爲什麼要替韓國開關民主化的道路呢？這是因爲韓國國民的反抗非常劇烈的緣故，除此之外別無理由。對美國而言，它面臨的主要課題是，怎樣對日韓美現行體制作若干修正而仍能維持現狀。這豈不是將政治與操縱結合起來運用嗎？

美國不支持金大中，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美國認爲，爲了應付民衆的反抗，不得不做一些讓步或修正是可以的，但不能讓想要改變現狀的主要變革勢力參預政局。金大中的問題便是出在這裏。問題是，以部分的、形式上的修正，即以民主化的美名而想謀求延續軍方統治之實，能夠收拾目前韓國

的政局嗎？這是今後面臨的重大問題。

光州事件是六月革命的原點

安江：現在，再來回顧一下光州慘劇。因爲這個事件顯現了全斗煥政權的本質，光州是六月革命的原點。

金：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安江：韓國的民主運動一直不斷地在回顧解放之後的歷史，甚或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歷史。這段歷史雖可以用「民主、民衆、民族」這一句話來表達，但在整個漫長的、充滿苦難和挫折的韓國現代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之一，同時也是民衆勝利的原點之一的事件，可以說就是光州事件。

剛才先生提到全斗煥政權之下一的韓國民主運動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十五年前，我和先生第一次對話時，您在最後說，韓國民衆從朴氏政權的歷史中得到了許多教訓，您對未來不感悲觀。您又說，朝鮮民族對異民族統治反抗非常激烈，但對自己民族的壓迫則極爲馴服，這些話都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光州民衆起義

射殺朴大統領事件（1979年10月）之後，以全斗煥將軍爲首的陸軍士校11期生發動軍事政變。80年初起韓國民衆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提高，代理大總統崔圭夏恢復金大中公民權，民主化運動勃然興起。

同年5月17日，全斗煥將軍搞軍事政變，以全羅南道光州市爲主的民衆、學生高喊「誓死反對軍事統治」，一齊起義。崔圭夏受政變軍部強迫將戒嚴令擴及全國。學生運動領袖多人，金大中、金鍾泌、金泳三等在野黨領導者逐個被戒嚴司令部逮捕、拘禁。

18日，光州市發生大規模學生示威，全斗煥的軍部出動當年越戰時反遊擊旅特戰團爲戒嚴軍，進行武力鎮壓。因軍方暴行太過殘酷，引來更多市民參加抗議示威，反軍政鬥爭遂由光州擴及木浦等全羅南道一帶，部份學生、市民以手槍、來福槍對抗戒嚴軍，展開街巷戰。市民代表和軍方也有過談判，但沒有結果，5月27日被武力鎮壓。

隨後，戒嚴司令部發表死者數174人，85年6月發表說191人，後來全斗煥發表說198人，但民間估計，包括行蹤不明者在內，共犧牲2000人以上，重輕傷人數達數倍以上。

——前田康博



充滿了反省力。現在，一如先生所期待的，韓國的民衆已經創造了新的力量。其根源，我以為就在光州。

金：是的。我一直認為民主運動一定會有勝利的一天。最近，我更認為勝利就在眼前。從韓國的歷史來看，許多理由讓我不做這樣的預測。尤其是，全斗煥掌權以來，變革的勢力從內部充實起來，變得更有組織起來。

岩波文庫出了一本『動搖世界的十日』（詹·李德著）。當蘇聯革命的時候，新聞界有的說紅軍會勝利，有的說白軍會勝利，隨著時局變動，判斷經常在動搖，只有詹·李德確信紅軍一定會勝利。李德憑什麼下那樣的判斷呢？李德認為，當時唯一具有變革的思想和組織的勢力只有布爾雪維克。由此可見，完成革命所需的東西是很明顯的。革命的思想怎樣形成，怎樣展開？革命的勢力怎樣組織起來？向政權提出了什麼樣的道德要求？是否鼓舞了人民的勇氣與愛國心？這些是不能不重視的。

光州事件讓韓國人民相信，軍方的權力是美國支配韓國的勢力的一部分，是美國的爪牙，使人民的意識產生激烈的轉變，對歷史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六月抗爭的思想與組織化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呢？道德的姿態是怎樣被強化的呢？由自焚抗議開始的無數死傷，逐步發展到最近一次動員了五、六萬戰鬥警察、催淚彈像雨點般的投下，而民衆仍視死如歸，勇往直前。我認為，所有的原點均在於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讓我們相信，軍方的權力是美國支配韓國的勢力的一部分，是美國的爪牙；讓我們看得一清二楚，幾十年來宣傳的「反共」也者、「自由陣營」者，其實都只是在欺騙老百姓。因為光州事件，戰鬥者的意識產生了激烈的轉變，對於歷史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這決不是在肯定光州事件的殘酷或慘烈。但我以為，光州事件是韓國歷史的革

命性變化，是新的時代出現的條件。

革命過程中必然會有悲慘的事情發生，必然有促成歷史變革的重大悲劇。那就是光州事件，朴鍾哲被刑求致死、李韓烈被催淚彈打死。這樣的死，結果是促使全體國民的意識形態有所變化。人們因此清楚地了解到全斗煥政權的本質是什麼，在背後支持的美、日的本質是什麼。誠如您所說的，今日的六月革命乃發軔於光州事件。

和光州事件、朴鍾哲之死、李韓烈之死有關的，還有許許多多的犧牲和死亡，這些都是革命的決定性條件，對今後的歷史都將有重大的影響。當我們想到國家、想到民族、想到這些無法忘懷的事件的瞬間，或者我們以虔誠的心情自我反省，面對不能不有所決定的契機，或者當我們重拾記憶，對自己的行動必須有所決定時，這些客觀的事實都會浮現在眼前。在這種意義下，這些客觀的事實或許是朝鮮民族史上的拯救力量吧。

這在近代史上沒有經驗過民衆革命的國家如日本，是無法想像的吧！1919年的3·1獨立運動，一直都在鼓舞我們、影響著我們歷史的每一片刻。1960年的4·19、1980年的光州抗暴、這次的六月抗暴都是這樣的。這些是我們民族，只要有血性的人都必須背負的歷史，也是今後不斷地提醒我們記憶的原點。借用普拉頓的話，這是我們必經常以虔敬的心不斷想起的回憶。

安江：思考光州事件，可以從兩個角度。為什麼會有執行光州慘劇的體制？第二個是民主勢力方面的問題。先談體制方面的問題。

一、光州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呢？六月民衆革命之後，日本新聞界，如所預料的，專只強調金大中、金泳三兩金之間的對立。同樣的，一般新聞界均側重報導光州事件是兩金的對立和學生的過激行動

所引發的。可是看1979年10月26日至1980年5月17日晚上的事實經過，學生的行動其實是很守秩序的。現在重讀當時的剪報，我想誰都不會否認的。還有，即使兩金對立，那也不是原因。原因出在全斗煥和盧泰愚的意圖。

當時有所謂「三金競賽」，一般預料，下任的大統領不是兩金便是金鍾泌，大家都衆目睽睽地注視著三金。可是有「金」，沒有「全」，爲了使局勢逆轉，唯一的辦法，就是製造暴亂。這是第一點。

第二、為什麼會發生那樣難以預料的殘暴行爲？當時的日本報紙，刊載了許多目擊者的證言。士兵襲擊抱著小孩的婦人，軍隊攻擊正在住院的病人。當時『東亞日報』特別採訪組寫了一篇報導——這篇報導文稿當然不被刊登——說那次慘劇，是由於軍隊的先發制人。我認爲，爲了操縱政治舞台，必須由軍隊先出面挑釁，然後封殺可以預料的民主勢力的反擊，因此，必須以恐怖的手法製造，那樣的慘劇。

第三、先發制人，殘酷屠殺再配合對左派的誣蔑和攻擊。軍方一直散佈謠言中傷事後以顛覆國家罪名被判處死刑的金大中，說他不斷在傳播共產主義毒素，是北韓的爪牙。光州市民搗毀廣播電台，是不聽漢城的廣播，想要聽平壤的廣播，接受平壤的指揮採取行動。可笑的是，竟然也有一些日本報紙，替這些謠言若有其事地傳播。其實，這些都是攻擊左派最古老的手法。

第四，美國軍方對全斗煥的暴行完全支持。光州事件之後，學生及基督教徒的反擊就是從到美國文化中心靜坐示威開始的。這一點值得注意。

第五、日本迫不急待地承認因光州事件而成立的軍事政權。經過十天的鬥爭，光州市民被壓制之後的5月28日，最先會晤全斗煥的是日本特命全權大使前田利一。即使美國，在表面上也作出不高興的姿

態，西德等其他政府則嚴厲批評韓國軍方，而日本竟迫不急待派代表去晉見全斗煥將軍，聽取其說明。

事實上，這件事沒有好奇怪的。在光州事件發生之前的所謂「漢城之春」時，在韓平素很少活動的日本外務省當局突然活躍起來，我們經常得到消息說，外務省當局正策劃避免讓「三金」之一的金大中取得政權。因此，5月28日日本政府代表最先會晤全斗煥，這絕對不是奇怪的事。

當民族的自覺、對歷史的自覺、或是對世界狀況的自覺開始萌芽時，過去被忘却的事就會被虔敬的回憶過來並賦予新的解釋，在認識上引起革命，從內心激發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的心情，產生自我的蛻變。



●六月九日，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被催淚彈擊中後腦，成腦死

至於日本，表面上說不能干涉韓國內政，對軍方的鎮壓三銜其口，實際上却干涉得最厲害。對日本來說，所謂「睦鄰外交」無非是支持韓國當權者的意思，不管這種政權怎樣迫害人民。他們說，要是對此表示關切，那就是干涉內政。

尤其是日本的新聞界，經常令人感到是以陰險的手段在干涉。我想問他們，強調兩金對立，說什麼民主勢力不得民心，全斗煥政權穩如泰山，這類報導到底憑什麼證據？美國不斷表示，韓國是「一個無法實行民主主義的國家」，但是一當自己中意的政權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加以祝福，擺出一付肯定現狀的態勢。

面對這樣的韓、日、美體制，難怪民衆要把那個悲痛的光州事件當成是變革運動的原點。在最近被瓦斯彈片擊中腦部死亡的李韓烈就是一個最佳的註腳。當他唸中學二年級時，發生了光州事件。他在日記上說：「回憶年輕的時候，我是沒有什麼意識的，我陶醉於自然，醉心於古董，〔儘管發生了光州事件〕我在社會的「郊外」、「無風地帶」忘却了自我。過去的這些日子使我羞恥。」當他進入大學之後，他有所自覺了，他羞愧得無地自容，他斷然說：「我要覺醒」。

金：您所指出的五點，我也有同感。不過我要強調，美國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從前美國想在韓國製造狀況總是暗中地進行，到後來就越公開化了。至於光州事件，則簡直已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光州事件之後，駐韓美軍司令幾次發表談話說：韓國人像老鼠一樣，總是乖乖地跟在後面，全斗煥上台的話，一切都沒問題。剛才您提到全斗煥當大統領之後，雷根搶先接見他，這樣露骨的表现，顯示暗中操作已經緩不濟急，民主勢力增強的太快了。不久前，美國駐韓大使李潔明就曾對盧泰愚說：「你是英雄」。

但是，就像光州事件一樣，美國的算計往往是錯的。比如去年一、二月間運用新民主黨總裁李敏雨提出「議會內閣制」的建議。這是美國的意思，但兩金合組統一民主黨以對抗，美國這個提案終歸失敗。現在，美國想透過直接選舉的正統性來支持盧泰愚，但這恐怕也將會成爲一種失算。如果他們想要一意孤行的話，必將引起第二次革命。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當民族的自覺，對歷史的自覺、或是對世界狀況的自覺開始萌發時，過去被忘却的事情就會被虔敬的心回憶過來。過去的事會被給予新的解釋，在認識上引起一種革命。與其說那是政治革命，勿寧說那是在內心裡頭所激發的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的心情，那是一種自我的蛻變。

只有人的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一旦被觸發，馬上就會覺醒。光州事件之類的革命遺產，一定會被年輕的世代繼承下去的吧。

盧泰愚「6·29宣言」的評估

安江：光州事件的意義，集中表現在6月10日至6月29日的政治狀況。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次六月抗爭，不止是自70年代、80年代以來一直參與民主鬥爭的學生、基督徒、知識份子、勞動者參加，可以說除了特權階層之外，韓國社會所有階層都參加了。許多僧侶走上街頭，甚至戰鬥警察之中也有一些年輕人要求

修憲而絕食抗議。就因為這個原因，有些人就說，因為中產階級參加，這次民衆鬥爭才能成功。剛才已經說過，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強調中產階級參加的人，我認爲是有意否定過去漫長的民主鬥爭的歷史。我們應該有一種看法，就是今天有這麼多國民敢出來把長期壓抑在心的想法訴諸於行動，這是長期民主鬥爭的成果。

6月10日，盧泰愚在執政黨大會中正式決定爲下任大總統候選人。從那天開始，民衆的行動高漲起來，全斗煥、盧泰愚陷於孤立。6月29日早上，盧泰愚不得已發表聲明，大體上接受了民主勢力的基本要求。請問您認爲應該怎樣看待這段事情發展的經過。

金：本來，民衆認爲政府必須修憲，往修憲的方向走，或者至少給人一個期待。但是到了4月13日大總統特別談話下令中止修憲爭議，國民才認爲應該來的來了。到6月10日盧泰愚被選爲候選人，見到那個慶祝會場的氣氛，國民的憤怒可以說達於頂點。那是對國民的侮辱，國民忍耐到這個地步，已經無法再容忍下去了。

● 六年十日，全斗煥不顧民意，選盧泰愚為繼承人，激起民憤，成了「六月革命」的導火線



佛教徒的行動也值得注意。長時間以來佛教青年就有所組織，由於朴鍾哲的家人正好是佛教徒，因此由於他的被刑求致死而暴發了行動。

另一件重要變數是4·13前後知識份子的行動。我一直以為，現代知識份子和民衆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是革命的時機。而那時候可以說已經展開了。這使得民主勢力在思想上、組織上趨於非常成熟，尤其我認為4·13以後優越的戰略、戰術是勝利的原因。

比如，6月26日國民和平遊行示威時，提出了以下的國民行動要領：呼籲所有國民手揮太極旗或手帕到集合地點集合；在韓國，下午六點降旗時，所有人都要停止通行，這時全國所有教會、寺廟同時撞鐘、所有車輛同時鳴喇叭；晚上九時所有電視關機、關燈十分鐘。把行動移到夜間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夜間，如果戰鬥警察對遊行隊伍採取行動的話，幾乎無可避免地要發生暴行、衝突。這就把警察引到一個兩難的困境：到底是謹慎行動，還是無差別地對市民採取鎮暴行動，兩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街頭行動也不只集合到某一個地點，而是分散各地，做遊擊戰鬥。

參加示威遊行是要有相當勇氣的，但是如果是拍手、揮手帕、關燈、鳴喇叭之類，誰都可以參加。這就把戰線擴大到全國人民。長期的民主鬥爭已經成熟，戰略、戰術的優越，使革命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盧泰愚的「6·29宣言」是由美國寫下劇本，說服盧泰愚接受，然後封住整個全斗煥政權的反對。

安江：另外，我們談一談政權方面的問題。剛才您說，民衆的成熟和對政權批判的凝聚，使得政權發生挫折。但是關於6·29聲

明，日本的報章也有人評論說當權者表現了成熟的姿勢。6·29盧泰愚發表聲明時，我就預測日本新聞界會發表兩項報導，即盧泰愚聲望提高，金泳三、金大中所謂「兩金鬥爭」轉趨激烈。結果，被我說中。

關於6·29的轉變，有人說盧泰愚曾和全斗煥事先討論過，也有人說全斗煥一無所知而被孤立。有人說從4·13到6·29的轉變完全由盧泰愚一手導演。8月12日，盧泰愚會見日本特派員訪問團時說：「憲法問題不是全斗煥大總統決定的，而是我決定的。」這點我很懷疑。

至少這決不是盧泰愚導演的，而是美國在背後導演。這有許多證據。剛才說過的李敏雨的建議案，也是美國一手導演。這個劇本在去年12月和今年3月舒茲訪韓時試驗過兩次，但都失敗了。

金：是的。

安江：不過，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我想美國政府是不希望全斗煥政權對市民進行決戰的。開頭我就提過，近年來中國（中共）對朝鮮問題轉趨積極，柯巴契夫對亞太地區也日趨積極，漢城奧運緊鑼密鼓，這些情勢，使得美國不願意看到韓國人民以激烈的手段推翻韓國軍事政權，也不願意見到軍事政權以暴力鎮壓民衆。因此只好採取比李敏雨計劃作更多讓步的6·29聲明。美國寫下這樣的劇本，說服盧泰愚接受，然後封住整個全斗煥政權的反對。這是我的看法。

5月，華盛頓召回駐韓大使李潔明，而且美國駐韓大使館的政治幹部大調動，國務院的韓國科長換人。接著便發生了六月抗爭。6月23日副國務卿錫格訪韓，當時國際奧委會、國務院的達文斯基、安全局副局長均屬同行。有趣的是，達文斯基不斷交待韓國政府官員說：「漢城奧運的安全問題如何？不要讓最近的騷亂事件妨礙了奧運開鑼。」另外，國際奧委會也不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國天主教神父揭發政府當局為刑求朴鍾哲致死的警官脫罪，並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圖為父與鎮暴警察對峙。

斷發言說：「漢城奧運開鑼以前，這場紛爭可以解決，我對此十分樂觀。」這表示美國是以漢城奧運為餌，誘使韓國軍事將領們自制。還有，雷根總統於6月19日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親筆信給全大總統，說美國參院全體一致決議要求韓國民主化，而這是參院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要求所做的決議。

6月26日錫格返美後向雷根報告說：「事態可望好轉。」最後是6月29日盧泰愚發表聲明。從這些經過看來，不是很明顯的證明美國是幕後的導演嗎？

美國面對民衆的反抗，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改變意圖，犧牲最聽話的政權。今後韓國國民應該自外來勢力中獨立

起來，繼續奮鬥。

金：我想不管怎樣，美國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我想美國是有幾個腹案，因此4·13時美國的態度十分微妙，關於這個問題，「促進民主化全國教授協議會」發表了「促成社會與校園民主化」的聲明書，說：「對4·13的反應，美國政府暫時表示默認、遺憾，其中是隱含全面鼓勵當權者的意思，我們對美國的意圖深感疑惑與憂慮。」

換句話說，4·13的問題如果解決得了，美國就此默認；如果不行，國民的反抗高漲起來了，美國就必須另採措施。那就是第三個選擇：6·29。

確實，雷根的信函等等，美國表現得很努力，因此軍方才得以自制。新聞沒有報導，聽說六月中，美國軍用吉普車天天在韓國部隊周圍巡邏，監視韓軍行動，以防止軍方搞政變。結果，盧泰愚除了6·29聲明之外，別無選擇。盧泰愚聲明的內容，到底事先知會全斗煥多少，這是有趣的問題。不過我想，美國必然已先向雙方說服說，除此之外別無辦法，然後讓下任的當權者盧泰愚去發表。

全、盧不能不同意。軍隊被監視控制，沒有用武之地。同時菲律賓事件殷鑑不遠，他們應該了解：壓制太過火，國民的反抗會被激得更強烈，搞不好有被驅逐出境的危險。爲了生存，這是惟一的選擇。不過接受了這個條件，盧泰愚或許可以撐一段時間，全斗煥今後是不是可以生存下來呢？我認爲過了明年2月，他一定要走上亡命之途。

就美國來說，第一案的李敏雨失敗了，4·13也受到國民的反擊，這第三案成功了，也就是說，部份的修正可以使現存的結構繼續維持下去，美國的利益可以保持下去，但是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呢？第三案的成功與否，是仍然有待考驗的。

至於日本的態度，日本應該會協助提昇盧泰愚的聲望，今後會更加露骨的吧。理由後面再說，現在先談的是日本的新聞界，因爲日本沒有發生過民衆革命的緣故，不會去注意到民衆，只注意到當權者的動向，所以他們只會注意盧泰愚的動向。

再談美國的介入。「促進民主全國教授協議會」的聲明正確地指出，我們決不歡迎本國的問題在國外被議論、被決定，如果他們的建議對本國的民主發展有幫助的話，我們不拒絕，但最近美國的努力却非如此。光州抗爭中，美國所採取的行動，雖然美方作了種種辯解，但我們要說，我們不同意。

值得重視的是，美國面對民衆的反抗



●韓國勞工奮起反對獨裁政權

，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改變本來的意圖，做那樣的決定。而即使對於最聽話的政權，美國也不能不壯士斷腕地讓它結束。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今後韓國國民應該自外來勢力之中獨立起來，繼續奮鬥。

安江：在這個意義下，6月29日聲明的內容從九月份起又開始引起爭論。

金：是的。

勞工運動的展望與課題

安江：現在，想向您請教幾點今後的展望。



·動者全面參加民主鬥爭，可更有力地促進民主



首先，韓國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已經在六月抗爭的基礎上就修憲的內容進行了談判。您對今秋至明年二月的展望有何高見？

金：金大中復權了，在東京被綁架十四週年紀念的那一天，加入了民主統一黨。但他對盧泰愚提出的民主化聲明的八個項目能夠執行到什麼程度，表示疑慮。就釋放政治犯一項來說，全國約 2000 名的政治犯，只釋放了 500 名。這件事明白顯示了當權者對民主化仍然非常遲疑。

當然，就整個方向看來，只要不發生非常事故，全斗煥一派應該會採取自己親自公開聲明的方式，雖猶疑而又不得不逐步開放。但是在反抗勢力的立場來看，民主化並不是被賜予的，而是從戰鬥中爭取來的，是各階層團結戰鬥的結果。我想為了使 6 月 29 日的決定全面實現，戰鬥應該繼續擴大。

譬如 7 月 18 日民主勢力對 K B S 國營廣播電台提出「真正公益廣播宣言」的聲明，措辭內容就極為強烈：「長期以來，K B S 帶著公共廣播的假面具，做權力的附庸，為我們播送可恥的節目，我們對此提出嚴重抗議。」我想這樣的戰鬥應該在各方面提出。勞動問題也是一樣。這樣一來，縱使當權者想要保留其官僚體制、暴力結構，但因下層結構逐漸民主化，權力結構就會被架空。當然，即使到了最後，權力被架空，獨裁者也必定會死抱著政權不放吧！

今天韓國勞工運動的特徵就是挺身反抗剝奪其團結權的軍事政權，主張工人有權組織工會，並要求大幅提高薪資。

安江：勞工運動已經激烈展開。民主化自然不錯，可是許多人擔憂，民主化正要實現，勞工運動接著就風起雲湧，韓國經濟恐怕

會崩潰，那不得了。尤其是日本的報紙，以巨大篇幅，批評勞工運動是韓國動亂的主因。

金：是的。

安江：但是今天的韓國的勞工運動有一個特徵，就是主張團結權，主張團結權是工人的基本權利，工人有權組織工會。

當然，韓國過去不是沒有工會。隨著70年代韓國經濟的活躍，工會成立了，也有所謂韓國勞總的全國總工會。但全是御用工會。因而，誠如「韓國通信」所報導的，和民主運動呼應的勞工運動是少數派，他們的戰鬥，就像李小仙、全泰壹母子的鬥爭一樣，是和企業、政府、警察，以及御用工會的鬥爭。日本的勞工運動和韓國的工會運動經常有交流的活動，可惜他們聯合的對象幾乎都是御用工會。在韓國工運高漲的今天，日本的勞工運動應該如何重新反省呢？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像這樣，對團結權長期被軍事政權剝奪挺身反抗，這是它的第一項特徵。

其次，韓國經濟發展的非常快速，所以其優秀幹部可以獲得極高的薪水，但一般人的薪水却非常低，以日圓兌換，大約只有2萬圓左右（約5000元台幣）的工人很多。再者，韓國經濟的「前近代性」，身份的支配很強。身份關係和薪資差異，引起了許多紛爭，勞資間的對立一直受到軍事政權控制，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薪資，這種情況，自然是60年代以來的軍事政權應該負責的。

這樣的勞工運動，企業和政府到底要不要鎮壓呢？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我認為，工會的團結權和薪資提高才能使韓國經濟真正地加強實力。這可以說是韓國經濟的重要過渡期。換言之，在韓國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如果早一點把勞動問題克服了，以韓國國民的力量，韓國的經濟一定可

以比現在更強有力。

金：對勞動問題，國內也相當擔心，我的朋友裏頭有許多人認為勞動問題應當等修改憲法及大統領選舉完後再說。但我不這麼想。在整個民主鬥爭進行之中，只讓勞動者保持沈默是辦不到的。這是第一點。在現在的時點上，這不是好不不好的問題，我們除了現實地對待，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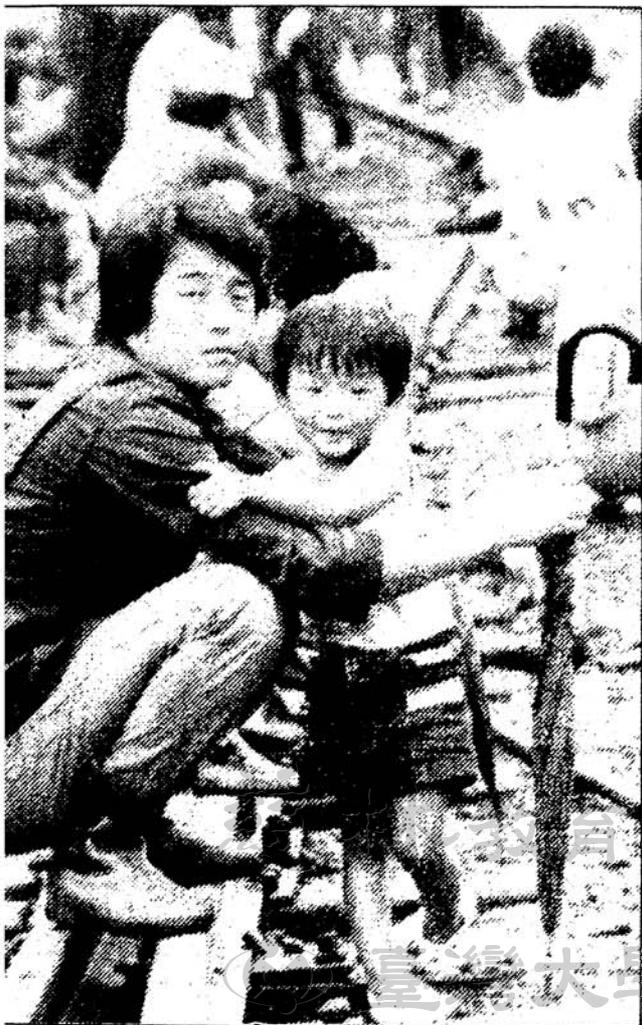
勞動者若全面參加民主鬥爭，絕不會妨害民主化，一定可以更有力地促進民主。如果當權者對民主化有所遲疑，勞工可以總罷工呼應學生。

再說，從「經濟人聯合會」和「商工會識所」等聯合刊登的新聞廣告看來，他們也正在努力克服勞資間的問題，這種作法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他們認為，資方要對勞方惡劣的待遇負責，而且必須率先改變這種狀況，希望勞工不要全面破壞經濟狀況，不要使用暴力，政府也不要介入，要建設性地協助他們。

舉一個例子，某煤礦正在鬧工潮時，董事長坐著輪椅出現了，對於工人要求百分之五百的紅利，答覆說：「我誠心要和各位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工人於是全場歡呼。工人說：「與其說我們贏得經濟目的，不如說贏得董事長親自出面解決。」

大眾媒體都只報導事件的表面，對於背後數百件勞資爭議不斷在解決的事情，以及工人一面繼續鬥爭，而又極力自制的事實，還有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很可惜沒有全面的報導。新聞特派員之中難道都沒有有思想、有同情心、有敏銳感覺的人嗎？

再舉學生的例子。兩萬名學生集中在延世大學，進行示威。「民統」的激進



礦工人們在鐵軌上進行罷工

份子帶頭大聲叫喊「召集制憲國會！」「完成民衆革命！」，在場的學生全體一齊大聲拍手。喊了幾遍之後，大家紛紛和他們握手，以溫和的聲音說：「夠了！夠了」（笑），秩序井然。九月學校開學之後，學生和勞動者結合搞勞學共鬥，也是秩序井然。勞動者也如學生鬥爭一般的成熟。雖然他們強烈地要求得到應有的權利，強烈地要求民主，但也盡量不採取破壞的行動，而採取非暴力的姿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問題的，但在韓國則秩序井然。

有些朋友主張勞工問題要慢慢來。但

我反對，那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的！另外，現在學生展開全面鬥爭，市民也參加了，如果勞動者也全面參加，一定可以更有用地促進民主。如果當權者對民主化有所遲疑，勞工可以總罷工呼應學生，他們有這個實力。也許我太樂觀了，但這絕不會妨害民主化，反而會更加促進民主化。

軍方還不致於以此為藉口出面鎮壓勞工運動的。在民主化過程中，世界各個國家那一個沒有經歷混亂的階段？但也沒有軍方干涉。這是現代的趨勢。

大統領選舉與民主勢力

安江：民主勢力這一邊將會推出誰來當下任大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是目前衆所矚目的問題。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兩金身上。兩金都是優秀的領導者，都有過很大的犧牲。

韓國民主勢力內部也有人擔心不知會變成怎樣。有人幸災樂禍地認為兩金爭執會使民主運動遭到挫折。我本人樂觀的認為，這是韓國民主勢力自己要決定的事情，而且一定會有好的選擇。

金：現在的革命過程是非常成熟的。有人認為在革命過程中，暴力是必然的。但是，特別是在現代的中進國，以及因產業、經濟成長之後社會產生了複雜變化的國家，政治體制的改變方法也不同了。在這種意義下，今日韓國的變革雖然有很大的實驗性，但韓國的民主革命却是日趨成熟的。兩金的問題也是一樣，最初大家都很擔心，但在國民輿論的壓力下，相信兩金無論如何，都不會破壞民主化。當然，大家都認為兩金捐棄成見，推出單一候選人，一定較有成果。

金大中在七月九日東亞日報的訪問中反問道：「縱觀韓國在野黨30年的歷史，從來沒有一次不是推出單一候選人的，為什麼這次就不會？」他說，是不是在長期

的軍事政權製造恐怖的氣氛下，民衆懷著恐懼的心理，結果才產生了那樣的憂慮？獨裁者不能一直靠不斷地製造民衆的恐怖心理而生存下去。

根據美國蓋洛普未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兩金和盧泰愚的聲望比例是金大中 7、盧泰愚 5、金泳三 2。盧泰愚充分利用操縱國民心理的技巧，使國民誤以為是他在實際推動民主化。

金泳三意外的低，但和金大中聯合起來，就成壓倒性多數。金大中的敏銳判斷力，對軍方及美國採取了既實際又堅決的態度。為人民要求改革……等等，使民衆的期待集中在他身上。目前即使政府已動員了所有力量，也只能得到這麼有限的支持，因此，當總統選舉時，兩金聯合起來在全國展開競選活動時，情形一定會有大變化。

民衆文學、民衆歷史、民衆美術、民衆音樂……等等，形成了推動新時代來臨的新思想，當然也發展出因應新時代的社會科學。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另一件事是，七月八日李韓烈的葬禮，這可以說是韓國有史以來最隆重的一次。光是漢城就有百萬以上的人參加。30%是由在野的統一民主黨動員的，其餘是由「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等在野的民主勢力所動員。我以為，這70%，在革命過程中一直是能夠被動員起來的力量，對於兩金的選擇必定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量。這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

革命運動的中心勢力——「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本部」，在以後的民主主義建設過程中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兩金的心情變化並不能決定未來狀況的發展及變化，換句話說，以盧泰愚為中心的政府採取的反應與策略、以「



●兩金聯合起來，就成壓倒性多數，所以兩金就成中傷的目標。圖為金泳三（左）、金大中（右）





爭取民主憲法國民運動」為中心的社會輿論，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等這些因素的綜合，決定了兩金的命運。

當然，把政權打倒之後，國民的力量有可能變成積極的力量，但往往也會變成負面破壞的力量。但現在我們國民之間已形成了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平衡，今後是不會輕易破壞的，社會本身整體的成熟可以作為保證。在這樣的社會裡頭形成的領導者是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是現實主義者，不可能輕易後退。

七月卅一日，紐約時報在刊登的「民衆詩在韓國民主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篇文章中，翻譯了梁性佑的「冬共和國」

等五首詩，介紹這些民衆詩在喚醒、提昇「抵抗意識」上所具有的巨大的影響力。在韓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民衆的思考和思想為何發生變化呢？在美國都有人在研究這樣的問題，真令人感動。民衆文學、民衆歷史、民衆美術、民衆音樂……等等，這些領域中形成了推動新時代來臨的新思想，當然也發展出因應新時代的社會科學。

民衆詩以豐富的感情描繪出民族的「未來面貌」，社會科學則努力探索具體呈現這一「未來面貌」的實際方向，兩者可說是相互呼應、連手併進的。

韓國人雖然具有相當浪漫的、倫理的完美主義與理想主義，但長久的政治挫折、政治經驗，使他們培養出政治的現實主義。對於這一點，我是相當樂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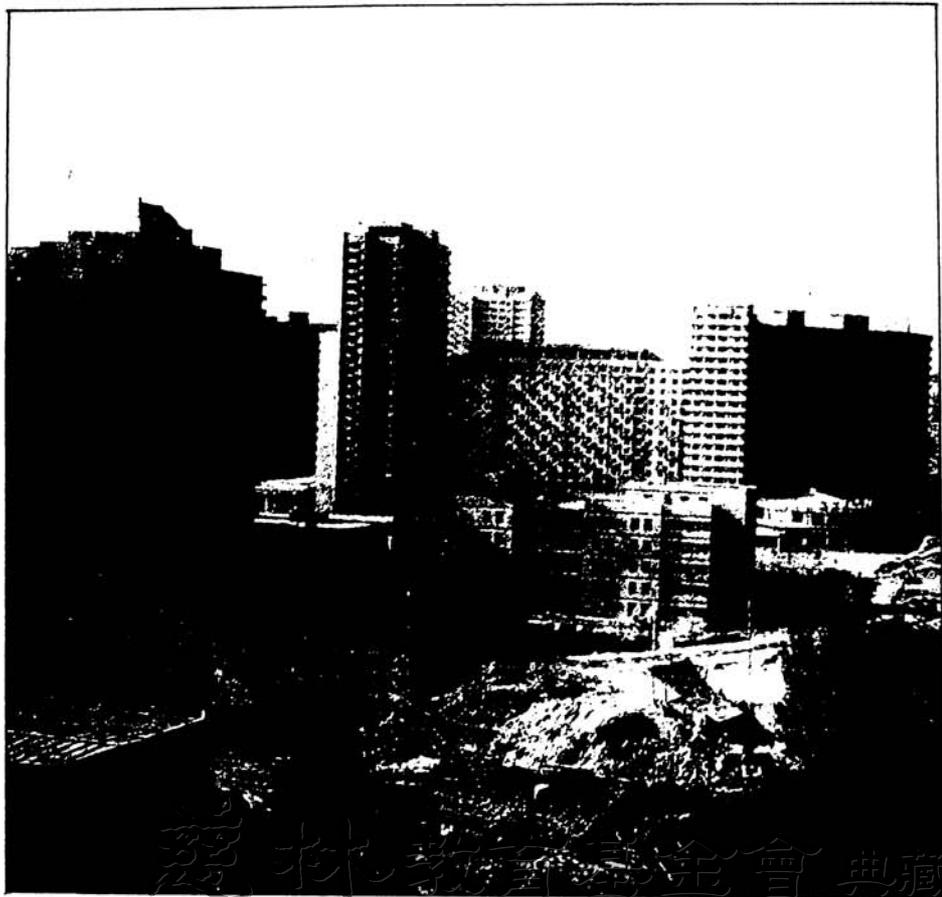
南北對話與朝鮮半島的統一

安江：對將來的展望，我們必須面對有關明年漢城奧運合辦、南北對話，乃至南北韓統一的問題。一百二十年來朝鮮民族現代化的道路上，最重大、也是最難解決的，就是南北分裂的問題。

北韓一貫主張統一；南韓自4·19以來，統一已非禁忌，甚至成為最重大的課題，連軍事政權都在標榜南北對話。目前民主勢力專心致力民主革命，但我期待能一面追求民主，一面追求對話。

金：妨礙韓國政治、社會改革的，往往是外來勢力。但朝鮮民族在漫長的外來壓力下，依然保持著民族的認同與國土完整的信念。排除外來勢力、凝聚內部力量實為民族發展的希望寄託所在。

今天主張統一，應該打破當權者狹隘權力鬥爭的對立，我們要破除民衆因長期受當權者傳播灌輸而產生的心態，打破當權者設下的各種禁忌，不斷地對統一問題，進行自由的討論。



● 為了合辦明年的奧運，平壤正大興土木

教授的聲明書中說：「統一是我們應當努力的問題，我們必須全盤地解決目前社會所有的矛盾，以達成民族的大團圓。」、「因此，我們要求民族再團結的號召，不能再被利用為意識形態鬥爭和政治策略鬥爭的工具。」，可說是簡潔有力地表現了有關統一問題的主張。

民主勢力提出反對反共、高唱統一，



並不必然就是和北韓有同樣的主張。今天主張統一，應該打破當權者狹隘權力鬥爭的對立，以及許多民衆因長期受當權者傳播的意識形態的同化而產生心態與反應，我們要打破當權者設下的各種禁忌，不斷地對統一問題，進行自由的討論。北韓政權或許會宣傳說，這是附和他們的統一的主張，南韓政權也會說這是共產黨、是北韓的爪牙，但我們却什麼都不是，我們有非常成熟的構想。

整個民族的問題本就應該如此去面對，單就解決南韓的問題而言，也不能不觸及統一的問題。

現在的南韓政權，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民衆的、更不是民族的。在這一點上，北韓更具有正當性，等到南韓獨裁政權被打倒，走向民主化了，對外關係也越走向自主化了，在民主、民衆、民族的水平

與北韓日趨一致，我想情況會有所改變。再說，南韓的經濟順利發展下去的話，北韓的冒進革命主義恐怕就行不通了。北韓應該正視這種狀況，改變他們的統一戰略，這雖然不是容易的事，但總是要改變。但願北韓更向開放的社會主義邁進。

北韓大概也決不會倡導冒進的革命吧！如果是這樣，那就應該衷心地朝民族交流以及克服意識形態的方向而努力。南韓如果民主化，也應該會朝這個方向邁進，在統一問題上努力爭取國民的共識。對這個問題，北韓如何回應呢？這是今後的課題之一。

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南韓的民主化，必須朝著民主的、民衆的、民族的方向努力。外來勢力、軍方、資本家等反動勢力的壓力是很強烈的，如果南韓的民主運動被壓力所扭曲，南北對立的問題依然克服不了。那樣一來，北韓解放南韓的政治策略，就師出有名了。隨著目前南韓對北韓的政治態度以及對統一問題想法上的變化，南韓贏取政治民主化，可說有其深遠的意義。

儘管有美國、日本的反動陰謀及阻礙，南韓民主運動還是邁向成功之途。朝鮮民族只有不靠外力才能自主地決定朝鮮問題，並且反過來影響外來勢力。

安江：南北韓的緊張局勢是東亞冷戰結構的延長，冷戰結構內化為南韓國內的鎮壓體制。當國內的鎮壓體制崩潰，或者為克服南北長期的對立，而在思想層面上發生變革，這種緊張局勢將會發生極大的變化。當然，那將使得日本的對韓政策乃至日本的生存方式發生根本的動搖。我深切感到現在正是日本修正對韓政策的時機，如果不改變，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一定會走向道德衰退與頹廢的末路。

金：我想就南北問題及對日關係，各抒己見。民主政權和國民之間取得共識之後，與北韓的緊張關係可能會緩和下來。以往，南韓政府對日本施加壓力，不讓它和北韓交涉、談判，但一旦建立了真正的民主政權之後，就不可能會再那樣做了。日本和北韓之間關係的正常化，會有助於整個朝鮮半島的和平，朝鮮半島和平又有助於整個東亞的和平。也許爭亂不休的東亞近代史的悲劇就可從此結束吧！

美國及日本的當權者當然不喜歡看到這種新情勢的發展。所以，政治及經濟上沒有平等的關係，也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不過，盟國之間成熟的伙伴關係應該是歷史的潮流吧？！以往南韓對北韓的許多提案都只是虛假的宣傳戰，是為確保對北韓優勢的一種政治戰略。我們應該捨棄這種做法，誠心誠意地為民族統一而努力才是我們今後的課題。至於應該要結束宣傳戰，好好對談，以向全世界顯示南北韓雙方走向和解和統一的步伐。奧運會的事也應該在這個基礎上來思考、處理。

儘管有美日的反動陰謀及阻礙，南韓民主運動畢竟還是邁向了成功之途了。朝鮮民族解決朝鮮問題時，只有不靠外力才能自主地決定，並且反過來影響外來勢力。

民衆對南韓的政治與社會、南北關係及和平問題的看法及感覺都在轉變，有心人應該思考如何激勵這種轉變，至少不能去妨害它的發展，如此才能給東亞帶來我們長久盼望的安定與和平。我想是先有態度、想法以至思想上的變化，然後才會有政治上的變化。在這一點上，大眾傳播媒體是必須加以強烈批判的，我希望他們以進步性、前瞻性的眼光來看待朝鮮問題。

安江：是的，只有日本走上正途，而東亞趨於安定之時，日本人和朝鮮人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解。

◎大學改革◎

大學教育改革 意見書

■ 美國加洲大學留學生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 90 多位台灣留學生聯合署名致書教育部長毛高文，對台灣的大學教育提出興革的意見，顯現了海外遊子心繫家國的關懷之情。

親愛的毛部長：

我們是一群族居加州柏克萊的台灣留學生，我們雖然身在海外，但對國內各方面的發展仍舊非常關心，對一年多來大學校園內各項停刊及學生抗議、請願事件，尤抱十二萬分的關切。這一連串的學生事件顯示：台灣在各方面均邁向進步開放當中，大學教育的政策也有應時加以檢討修改的必要。趁此國內正進行大學法修正之時，我們發出此信，表達我們對當前大學教育政策的看法。

根據台大於今年初，針對大新事件所引發之學生聯名抗議刊物先審制運動，召集師生成立了審稿規定修改委員會，並召開五次會議，討論變更現行審稿制的問題。誰料最後竟以「上級單位」及「無法透露姓名之人士」的反對而作罷，至今未再有進一步的發展。類似的事件尚有政青停刊、輔新社的封社及改組、立法院前學生請願等。凡此種種，一再顯示：一旦學生思維觸及對現行制度的批判時，便立時受到壓抑，這種限制學生獨立思維、阻礙學生關心參與周遭環境的作法，我們深以為不妥，而學校主權不能獨立，不能為學生爭取權益的現象，我們尤以為憾。在學生情緒無適當管道宣洩的情形下，許多校園內的刊物乃紛紛轉入地下，我們可以體念到，這必然是學生循正常管道訴求不可得而做的一種轉向。刊物地下化的

做法固然值得商榷，但校園內現行刊物審稿制的合理性却更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另如台大教師聯誼會成立的幾經波折與其合法地位的取得等問題，也一再暴露了教授們的動機受到懷疑及其意見不受尊重等弊病。面對如此種種，我們不禁憂慮：一個以教授和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單位，如何能在這樣的制度及風氣下，成為一個優良的學府，從而為社會培育負責、守法、獨立、自由的好公民。

基於以上的理念，我們深切盼望：您能於大學法的修訂過程中，將下述幾點建議融入其中。

- 一、取消統一規劃全國各大學教育方式的政策，賦予學校完全的自主權，並提升教授的地位及權責，使教授得更進一步參與學校的決策。
- 二、確立公立大學法人制，使學校不淪為官僚制度中的一環。
- 三、實施教授終身職制，以保障其職務，從而鼓勵其學術研究。
- 四、視大學生同一般公民，他們得享有憲法所保障的一切自由，學校不另設規條加以限制（如廢除刊物先審制、教官退出生活及訓導系統、建立學生的申訴

管道等)。

長久生活在大學校園內，我們逐漸發現此處的大學生確實比台灣的大學生享有較多的自由，並且有許多管道可以向校方表達意見。就以加州柏克萊大學為例，學校設有學生申述中心，學生案件得由學生代表和律師等共同審理；學生的社團活動及刊物言論也無國內的種種限制。在去年年初柏克萊學生支持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運動中，學生可於書信抗議後，再以靜坐、遊行及演講的方式，更進一步表達他們的意見，終而迫使加大董事會撤回其在南非的鉅額投資。這種言論及行動自由的作法

，不僅讓學生走出象牙塔，藉資訊的交流，得更進一步的認識社會、關心社會，而且也間接促成柏克萊大學的特有風格及其今日在學術上的地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們這種自由開明的作風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而大學教育尤為培養學術人才及領導人才的最重要的一環，故我們殷切的期盼，您能以一國的教育首長，為大學法賦予新的生命，為吾國教育開創新的契機。

祝

順 遂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高崇倫	傅立華	丘士正	林盛豐	顧春慶	吳子方	世德成	劉樹賢	木子楓	翁志遠	胡衍生	林育才	顏家如	揚繼履	黃世建	何泰東	何志珠	吳春發	白啟光	彭錦壽	林燕欣
黃淑慎	許志輝	林玉英	許志輝	馬昱	何智霞	侯君莉	王婉兒	蔣瑞煌	姚維信	鄭萍鈴	朱敏聰	曾信天	陳文西	孫淑真	張憶里	林美於	林昌佑	許秀鈺	何漢晨	
徐登賢	何齊美	吳永毅	郭文亮	傅立華	孫泰在	戴文鵬	王維仁	呂國鈞	吳田祐	林若岩	王卓辰	柯志斌	鄭經州	劉世芳	李欣純	劉世芳	陳恒芬	張瑞玲	李伯晃	劉碧芬
葉	林國泰	周淑美	林真味	黃文宗	陳光	王	劉德德	劉竹秀	李雅莉	劉佩玲	曾大仁	邢幼田	曾增春	曾麗芬	王和恩	陳涵清	李宗海			
李心蔭	歐維堯	柯志首	卓雲琳	楊積元	曾平賢			陳	龍											

◎海峽論壇◎

對批評「新批評」的批評

——一個歷史主義的觀點

■樓亮

新批評今天在台灣可說是臭名昭彰了。

有那一個自命思想跟得上時代的學者或文學批評家不批評「新批評」兩句，以表示進步及新潮呢？有那一個經銷新文學理論進口的教授不在「引介」文章中和「新批評」劃清界限呢？又有那一個文學批評家敢打著純粹「新批評」方法及觀點的招牌批評作品呢？（除了對學術市場行情表不太清楚的龍應台。）

的確，「新批評」就是「反動」、「保守」、「落伍」、「過時」的代名詞。不僅如此，「新批評」在學術權力鬥爭中也成了被攻擊的把柄，新近從歐美取經回來的教授們祭起了結構、解構、讀者反應……各種「新式武器」向那些只受過新批評洗禮的老教授奪權，一時間，台灣的學術界和美國一樣，掀起了批評「新批評」的熱潮及文學理論熱。

正是，一切都始於美國——這是台灣文化現象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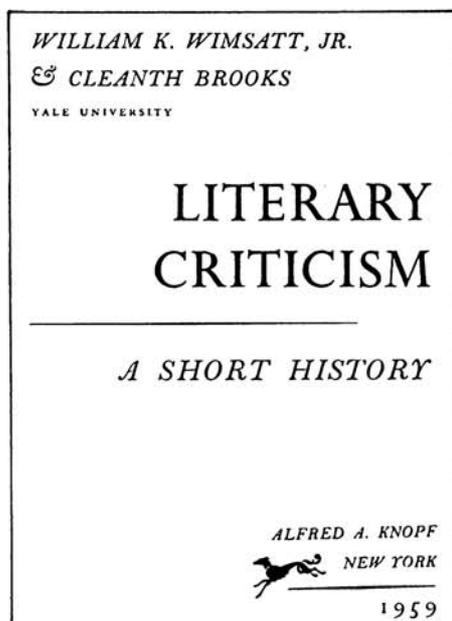
新批評的批判：形式主義及意理功能

目前在美國最流行、最熱門的文學研究領域便是文學理論，從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詮釋批評、解構批評到女性主義批評、意識型態批評、文化批評等等，這些文學理論流派的預設不一，方法學各有巧妙，如果要說有什麼共同點的話，最明顯的就是他

們都以獨霸文學研究界三十年的美國新批評學派為打擊對象，以顯示自身超越了新批評的範疇，解決了新批評的理論盲點。

美國學界群起圍剿新批評，在美國後面亦亦趨的台灣學界自然不肯後人，於是大量引進新文學理論，以擁有「最新的真理」之姿態對新批評大加筆伐。

各方人士及學者對新批評的批判不外以下兩個要點：絕大多數人攻擊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指出新批評漠視作者與讀者的角色，排



●六十年代也曾在台灣風行一時的
 「新批評」

海峽 76年 10月號

斥歷史、文化或思想的因素，只在作品本身及其文字意象上大作文章；另一些人則分析新批評隱涵的意識型態，揭露其菁英主義、浪漫主義、及保守主義成分，指陳新批評理論對維護建制及製造民主假相所提供的意理功能。

這兩個批評的角度在某一程度上是有效的。前者指出新批評視野之有限及偏頗，後者則揭露新批評視野的意理蘊含及深意，對幫助我們了解並評價新批評頗有助益。可惜的是，這兩個批評角度同時也有其侷限：前者在批判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時，往往流於自命走在時代的前端，以為理論的發展是由錯誤到正確，因此新文學理論一定比新批評有道理，而沒有看到文學理論與新批評在它們各自的時空環境中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後者在揭露新批評的意理蘊含時，則一方面沒有對新批評在「具體」歷史時空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加以分析，只做抽象的控訴，在另一方面也因此缺乏對文學理

論本身意理功能的反省，更別提對文學批評（理論）整個建制的反思了。

兩種解釋：天才論及客觀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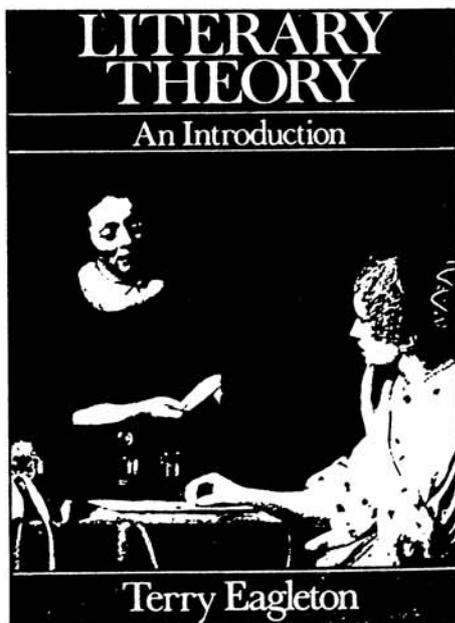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詢問這兩種批評新批評的人：為什麼新批評能獨步文學界三十年？為什麼過去對新批評的批評似乎沒產生什麼作用而現在却招招致命？為什麼文學理論看起來那麼有道理，一出便取代了新批評？我們可能得到的答案有兩種，而它們都沒有真正解答以上的問題。

一種看法認為新批評的理論及方法有毛病，只是當時沒人看出來，直到近年才被一些頭腦特別敏銳的天才指出來，因此我們要學文學理論就要學最新的，因為最新的理論才是正確，最接近真理。

這種看法假設了真理的發現不依賴空間時間與歷史的發展，而只依賴天才，既然天才的出現是偶然的，因此真理的發現也純屬偶然，如果天才早三十年出現，我們就可以少走三十年彎路，早就「糾正」新批評了。這種說法無法解釋為什麼過去三十年中批判新批評的「天才」們沒能「糾正」新批評，而現在的「天才」們一批判，新批評就倒了。顯然個中另有原因。

還有一種然行的看法則認為理論之更替，正如事物之盛極而衰，風水輪流轉，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是也。新批評是一種客觀主義，故而它的起落和文學史上主觀、客觀研究傾向的更替相吻合，近年來客觀主義衰落。主觀主義抬頭，因此新批評就不行了。

這種思想史的觀點顯然把文學批評當成孤立的現象來看，認為它和人類生活的其他層面毫無關聯，歷史也不過是時間的鐘擺左右晃動的痕跡；而且這種看法把文學或批評或人類其



●八十年代伊戈頓從歷史—社會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文學理論的流變

他思想活動當成自足的主體，可以自行發展變化。本文則要從現實的、歷史的、有生命的人群本身出發，把思想僅僅看做是這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動之一。

以歷史—社會的角度探討發展過程

總的來說，本文想做的，就是由一個「歷史—社會—政治」的角度來具體探討新批評在美國興起、得勢、衰落的過程及它在其歷史時刻及位置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樣的考察不但可以顯示新批評與其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關聯，從而暴露學術理論之「其來有自」，更可以顯示衆理論學派圍剿新批評之真正原因及意義，從而對批評了新批評的人加以批評。

新批評的早期主要經典作品，如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與華倫（Robert Penn Warren）合寫的《研究文學》（Approach to Literature）及泰德（Alan Tate）的《反動文集》（Reactionary Essays）皆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兩年後，藍森（John Crowe Ransom）出版《世界之體》（World's Body），布魯克斯與華倫再度合作寫成了《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一九四〇年藍森更以《新批評》（New Criticism）一書有系統地闡述了新批評的一般理論及運用。這些著作集中在短短五年內出版，促成了新批評理論的成型，但是新批評到了四〇年代末期及五〇年代才正式成爲文學研究的主流，而又在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開始沒落，這個歷史的過程是有其因緣的。下面我就要提出幾個重要的因素，由這幾方面來探討新批評的歷史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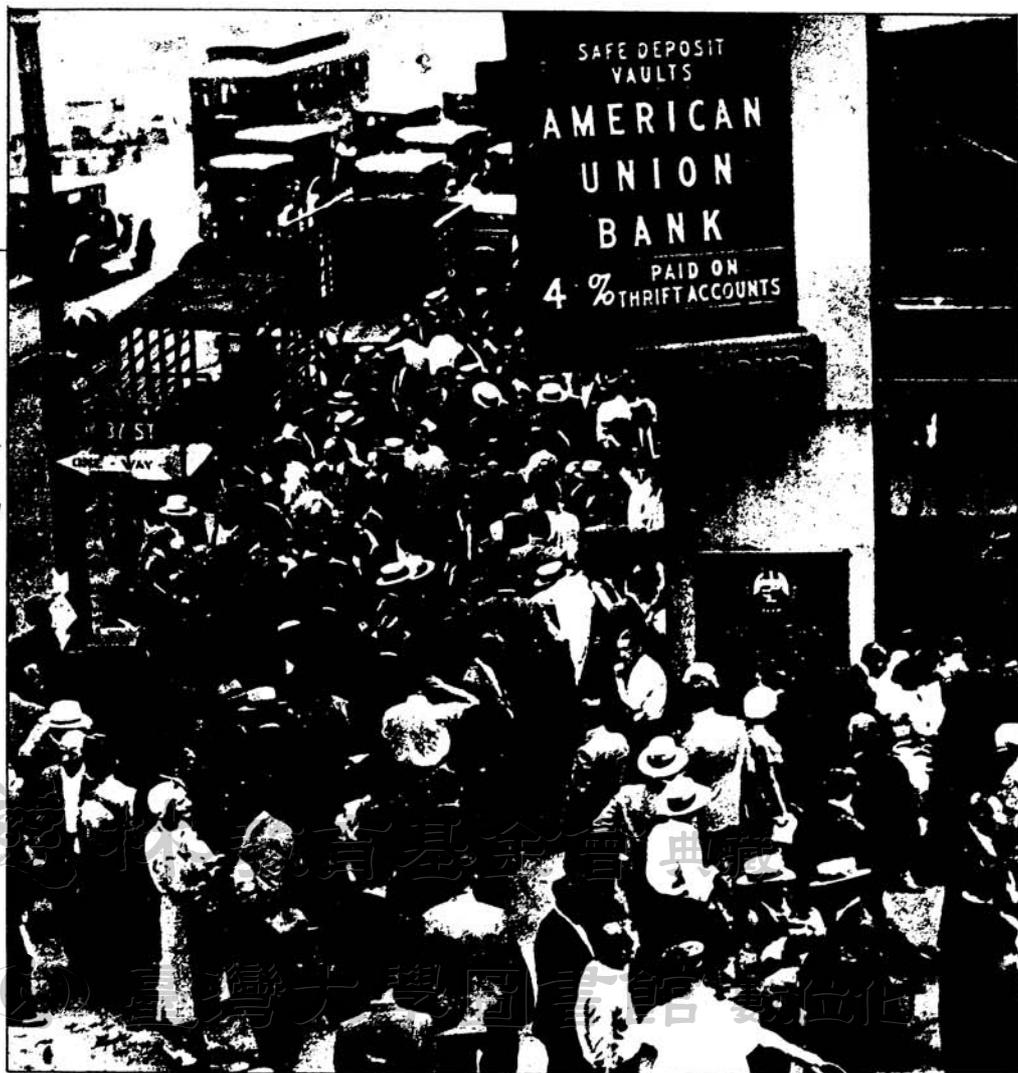
英國文學研究的淵源

新批評並不是前述學者在保守的美國南方范德貝特大學中之獨創，而是他們由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取經帶回來的。這個移植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因爲英國的文學研究能夠提供某一社會功能，是美國需要的。在這裡我們就必須先簡略地談一下英國的文學研究的特色及其社會功能。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教育制度仍是爲貴族而設的，以拉丁文爲主要文學課目，十九世紀後半，英文研究由於三個因素逐步進入大雅之堂：一方面爲日漸增多的識字群衆提供文化氣質的培養，以消彌階級對立，二方面也被道德之士用來對抗風行各地的「低俗新聞及煽情謔物」，三方面則爲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提供曾受英國文化及文字訓練的駐外官員以教化殖民地人民。由這些史實來看，英國的英文研究打一開始進入學院便有其特定的社會使命，爲建制提供服務。

英文研究雖然進入學院，但由於尚未建立自身的方法學，只得臣服於古典研究及歷史語言學之下，直到一次世界大戰英德交兵時才因緣際會地配合國家主義的需要，獨樹一幟起來，脫離了外國語言研究的框架。這個時候建立的英文研究典範當然受到當紅的艾略特（T. S. Eliot）、李却滋（I. A. Richards）及李維斯（F. R. Leavis）之影響，也同時反映其歷史時刻及需要，他們以爲大戰是由情感衝動未能冷靜思量而起，又眼見當時大衆通俗文化「腐蝕」人心，危及菁英之社會地位，故而鼓吹冷靜析解作品，科學地重建作品中

- 1929 年經濟大蕭條宣告了自由經濟政策的破產



和諧的秩序與架構，以便透過教育，藉著詩的調和力來保衛文化秩序不被群眾的盲動威脅。這個大的原則基本上和十九世紀英文研究的最初目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在我們明白了，英文研究在英國的社會架構中有其特定的歷史功能。新批評的領頭人物多半在當時還是優勢文化的英國進修過，也由美國的英文研究中吸取了當時的研究及教學傾向，後來搬回美國後由於歷史環境的需要，得以生根發展。因此，新批評可以說是英國十九世紀以來，直到本世紀初，文學研究之主流方向在美國的進一步系統化與制度化。當然，這個文化移植不是硬生生的插枝，而是有它更重要的歷史因緣的。

意理功能與美國的經濟社會現實

（簡單地來說，新批評在美國的興起有其現實的近因：它有力地對抗了三〇年代文學的入世及社會批評傾向，間接壓制了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崩潰危機而來的社會不滿情緒，更在學術領域中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遙相呼應，鼓吹一個由中央統一控制的嚴密階層架構以渡過資本主義的危機。

新批評的這些意理功能在一個大環境中進行，那便是美國當時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在此我們又得轉向歷史了。十九世紀後半，反對計劃、反對干預、反對管制的自由經濟政策主宰美國經濟，以配合當時美國競爭資本主義擴張之需，在這個經濟政策之下，國力固然大幅度

成長，但是這個成長建立在嚴重的剝削及壓迫上。一次大戰期間美國藉機大發軍火及物資財，對工人的剝削加倍嚴厲，對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則加以無情的壓制，屢次立法來限制言論及集會自由；一九一七年俄國人民革命成功，給全球被壓迫人民帶來無限激勵，美國工人也組織「國際工業工人聯盟」(IWW)，以罷工抗議來對抗剝削。為保護大企業的利益，美國政府發動一九二〇年的「恐共」(Red Scare)，逮捕大批工人領袖下獄，並趁機掃除反政府的一切組織及個人。

這次掃蕩並未解決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二九年開始的大蕭條宣告了自由經濟政策破產，連續幾年的高失業率打碎了自由經濟主義學者的樂觀理論，也點燃了工人及其他受苦人民的反抗之火，許多人開始重新評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甚至可行性，這種左傾的風氣當然也在文人的作品中渲洩出來，成為三〇年代文學創作之主流。

三〇年代文人以人道主義、社會批評、反物質主義的觀點來寫作，不但揭露社會上的黑暗及剝削，也向廣大群眾提供建議尋求出路，這種入世之風和它可能產生的影響當然不會一無阻力，新批評的重要著作便是此時出現的保守對抗勢力。

從抗爭的實際運作來看，新批評者基本上反對把作品和其現實環境連在一起來看，也就是反對文學參預社會批評的方法學認定文學的自主性，不同意作品反映了作者的動機或現實，主張人不應該因為寫了或讀了文學作品而在社會現實中創造出路或謀求改變，而應在文學作品中構築一個完美形式的天地。因此，新批評也承繼英國英文研究的一貫傳統，視激動情緒的作品為不夠格作文學，要求作品冷靜自足



• 羅斯福(中)推行新政以拯救資本主義

。在新批評者手中，文學被隔離在歷史與社會之外，文學經驗與實際行動分開，批評者用這樣的文學觀來評估作品正好對抗了入世文人要求文學與行動合一的主張，由此可以顯見新批評所提供的意識型態功能。

新批評提供的這種警察「鎮暴」功能當然受到建制的賞識，立刻受到支持。此外，新批評在四〇年代的走紅也有一部分拜當時新經濟政策之賜。

剛才我們已經談過三〇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面對的嚴重危機，一九三二年羅斯福臨危授命，憑其改革救急的口號選上總統，主張由政府投資，加大公共開銷及建設以提供就業機會，抒減失業率，消彌社會不安，同時也可促進工商業的復甦，拯救資本主義。



下全盤的一元經濟政策，由就業、財政、貨幣三方面各司其責，三管齊下來促進就業、促進消費、促進投資，但是由政府的干預及統籌來調節平衡，由上至下形成一個嚴整的階層架構。

一個主導領域內的權勢變化，往往導至相似理論在其他領域內昇至主導地位，凱恩斯的一統經濟理論一旦得勢，在精神及方法上與它相仿的文學形式主義——新批評，甚至科學的形式主義——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哲學，就都如虎添翼，在各自的領域中發達了起來。這裡需要更詳細的說明。

文學作品爲一嚴密架構的有機體

前面我們說過，凱恩斯的經濟計劃是把國家建立成一個緊密的階層架構，以政府爲中心來統籌控制各部門的運作，在這個政策之下，社會是一個以政府爲中心的有機體，各個部門則在政府的領導之下和諧地組成一個運作整體。這個政策的必然結論不但鞏固政府的中心地位，肯定現存體制與架構，也間接否定了各部門之間利益衝突惡化的可能性。（由於這個緣故，當時的保守資本家才會恐懼政府會因爲干預經濟而權力擴大，阻礙資本家的「自由」，故而對新經濟政策裹足不前，後來還是二次世界大戰的軍火市場解決了資本主義的困境。）

新批評的基本精神與方法學「恰好」與凱恩斯經濟論遙相呼應，也以文學作品爲一嚴密架構的有機體，作品中的意象、語言、象徵、對比，都由主題來控制運作，作品中即使有對立張立或不和諧之處，在新批評的分析中都變成有機體原來的本質，不但於整體無損，還因爲更深一層的協調折衝，更加強整體的威力。

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新批評的理

新政只是政策上的構想與救急措施，若要真正全面實施成功，那就需要一批學者專家出面，用理論及學術權威來做意識型態上的工作，以領導輿論，左右民心，製造「新政有正確理論根基而且是時勢及民意所趨」的假相，在這時披掛上陣的就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了。一九三六年（恰好與新批評的重要著作同年出現）凱恩斯發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A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批評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派的經由市場調節而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理論，並爲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一套政府干預經濟的具體政策和實施方法。但套理論不但爲「新政」的正確性提出辯解，壓倒擁護自由經濟的辯士們，同時也爲羅斯福擺

論基本上支持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精神。既然新批評左右逢源——一方面可對抗國內反對勢力的社會批評傾向，另一方面又和時代的氣氛合拍——也難怪新批評自三〇年代興起後，很快地在四〇年代成爲主流。

以上我們討論的是新批評得以自英國進口文學研究之客觀歷史因緣，了解了它在三〇年代文壇上扮演的警察角色，更分析了它在四〇年代隨新的經濟政策成爲學術主流，現在就要再看看爲什麼新批評能在五〇年代全面推廣。

五〇年代新教育政策的權威危機

簡單地來說，新批評在五〇年代的推廣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它解決了新教育政策的權威危機，第二，它的出世性成了保守文人在麥卡錫恐共時代中的護身符。我們分兩方面來看。

五〇年代美國的高等教育政策有大幅度的轉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由一九五〇年的九十億增長到一九六三年的兩百九十億，更於六六～六七年度達到四百九十億，這些補助大部分投入擴充及新建高等學府，在這段期間內獲得學士學位的人數也大幅度的增加，顯示更多的人進入大學，這樣的一個大轉變當然有其歷史原因，也直接影響到教育的質變。

剛才提到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暫時逃出經濟蕭條的危機，軍事及國防工業的開展解除了失業的壓力，美國參戰之後大量男性入伍，甚至形成工人荒，爲持續生產的巨輪不至停頓，政府發動宣傳，鼓勵婦女走出家庭，擔負起生產線上的重任，一向被壓迫的黑人也在此時應時代所需和白人一樣投入戰場與工場。可惜，這樣蓬勃的美景隨著戰爭的結束也告一段落。

戰後歸來的戰士，加上各國湧入的移民，

再度亮起美國失業率的紅燈。五〇年代韓戰及美蘇之間的冷戰刺激國防及相關工業極度擴張，雖然稍稍減緩失業人口的壓力，但也造成通貨膨脹，更加重政府的經濟負擔與日漸嚴重的赤字。當時逐步發展的工業升級使生產高度機械化、複雜化及精密化，需要的工人數量大減，素質却大幅增高，以配合發展，好與其他工業先進國競爭市場，擴大利潤。工業上的這種質變一方面加深失業危機，另一方面形成對教育改革的需求。

在此人口及社會結構劇變，失業率日增的狀況中，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使美國決心大舉投入教育事業，那便是蘇聯在一九五七年發射成功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波尼克。史波尼克的升空對冷戰中的雙方皆有重大影響，也開啓了太空爭霸戰的序幕，美國有鑒於蘇聯已棋高一著，再不迎頭趕上便永無翻身之日，痛定思痛之餘，決心發展高等教育，培育各方面的研究人才，並發動一批經濟學者推波助瀾地提出「教育也是高回收率的投資」的理論，於是國家主義與利潤主義兩種情操結成奇妙的神聖聯盟，一時之間，教育變成首要的工作。

美國的高等學府在此微妙的時刻擴大招生，實在扮演了吸收失業人口、儲備技術人才、甚至支持武器競賽的重要功能。聯邦政府依循福利社會的基本政策，大量投資高等學府，提供各種學生貸款，改善師資與設備；但是這個決策既非源自無私的百年樹人情操，亦非爲了提高全體國民的生活素質，而是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工業需求造成的。

學生人數的暴增對教育有深遠的影響。首先，學生人數增加，學校如果想維持賺錢，就必須實施大班制，過去菁英式高等教育的教課方式不再適用。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學生多半

來自上層社會，在自由討論的大學課程中，雖然各從本身主觀意見出發，但至少存著某一程度的共識；可是學生貸款的方便之門既開，其他社會階層、種族、性別的學生也進入高等學府，這樣一來，由於成員的背景不同，若是任憑教室中百花齊放，勢必有意見衝突，可能加深社會階層之間的裂痕，恰好違反了教育要使人不具階層意識的目的，所以必須有一種代表客觀的權威意見，以領導並統一教室中的多樣性。這時候新批評就派上用場了。

新批評隱含了政治理想與社會規範

現在我們來看看新批評在實際教學上的運用。新批評的分析方法主要針對詩歌而發，新批評者拿起一首詩來，首先貫注於正文，歸納出此詩的主題後，便挑出詩中最主要的意象、色彩、對比、隱喻、象徵等等，接著就顯示整首作品的各個層次如何環環相扣地繞著主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這種分析過程基本上以聯想為基礎，分析者各憑對詩中主題的詮釋角度來展示詩中完美工整的階層架構，在現實社會中混亂不安的一切，到了詩中，便都被新批評者藉著詩的形式架構，歸入各自的位置，呈現出一片和諧之氣了。即使有時詩中呈現緊張或不平整的局面，新批評者也會將此張力收歸詩的架構，於是這些衝突不但無損詩的完整與統一，反而顯得更增加詩的威力。

前面我們談過新批評把作品與現實世界隔開，現在我們更看到新批評的方法學事實上隱含了一個政治的理想，也暗示了一個社會規範；面對日益複雜的學生成員及多樣的思想價值系統，新批評的教學暗示現有體系及建制是最合理完美的安排，各個社會階層及集團應各守其位，以菁英為領導中心，即使有利益的衝突

，也可以在建制的體系內調和解決；無論如何，現在的既存架構是絕不可動搖的。這個政治與社會的含意若是不放在五〇、六〇的現實環境中去看，就無法完全揭露，新批評的具體作用也就無從說起了。

新批評教學方法最大的長處是統一。它所分析的不是作者或讀者混亂不一的主觀感受，而是「客觀」「統一」的作品本文，老師可以指著白紙上的黑字告訴學生們為什麼他的詮釋有根有據，同時也可藉年長及經驗鍛鍊出來的聯想能力及典故分析來攝取學生，鞏固權威，在教室中也建立起一個有根有據、絕對「客觀」、由菁英領導的階層權力架構。在這個權力架構中除了老師外，比較得利的當然是那些來自優勢階層的學生，他們因生長的环境提供了類似的語言訓練及思考方式，一到了分析作品時，往往「自然」表現得比其他社會背景的學生更具「敏銳的感受」與「清晰的條理」，成績比較好也就自然是「公平」的了。

新批評的教案既是統一的、客觀的，它的實行也就比其他談主觀反應的教學法易於控制，不但適合大班教行，也比較容易用集體考試的方式來鑑定學生的「優劣」，不但老師有自信有權威，學生也因為「客觀證據」不得不服氣。說得露骨一些，五〇年代高等教育的大門雖然開大了些，但是同時却也以分級分等的「客觀事實」維持了優勢階層學生的繼續優勢，在表面的客觀之下是赤裸裸的菁英主義。

總之，由於新批評的教學運用配合了五〇年代美國教育政策的實際運作需要，被採用為文學教育的標準也就沒有什麼稀奇的了。

麥卡錫恐共主義下的「純文學」

五〇年代美國學術界普遍以形式主義（如

新批評與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哲學等等)的理論為主流還有另外一層重要的原因——自保。

當時美蘇冷戰正在展開序幕，南北韓對峙，東西德分裂，中國大陸赤化，這些情勢的急劇變化普遍造成緊張氣氛，也給予美國政府一個很好的藉口，用「恐共」宣傳來轉移當時人民對高失業率、種族糾紛、貧富不均等情況的密切注意。在政府苦心經營的宣傳之下，凡對政府政策不滿或不同意的人士都成了罪魁禍首：「就是他們的不合作（如罷工、抗議等等）才導至美國的困境，他們還與全世界的共產黨互通聲息，這種人非得清除不可。」這場大整肅的領頭人物便是麥卡錫。

在麥卡錫犀厲激烈的嚴詞逼供中，不少無辜人士被列上黑名單，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前進人士更被整肅下獄，倍受折磨，一時之間，全國顛驚，人人自危，這種氣氛對學術發展當然不利。智識份子為求自保，有不少轉向形式主義方面的研究，新批評出世的、與政治及現實世界隔絕的立場正合需要，文人可以高舉「純藝術」、「純文學」的旗幟繼續工作，不受麥卡錫的騷擾。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風氣也可以藉「崇高理想」、「不受政治污染」等口號來切斷文學與社會現實之密切關聯，削弱前進文人的影響。

由此可見，新批評領頭人士能在風聲鶴唳的五〇年代中自保，並大展鴻圖，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同樣的，對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詮釋也「潔身自保」地避過了鋒頭，繼續其主導地位。這種出世的傾向到了動盪不安、關切入世的六〇年代當然備受挑戰，這是後語。

總而言之，新批評之所以能夠橫掃學界，普及推廣，實在是因為它為五〇年代的歷史時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務，既然配合建制所需

，新批評自然會受到當權者的支持，在補助、預算、僱用上都獲得方便，它的推廣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六〇年代社會運動的蜂起與挑戰

五〇年代是新批評的高峰期，若是客觀的現實不變，恐怕現在大家還在玩新批評的分析遊戲，但是六〇年代被壓迫者的奮起反抗粉碎了新批評者及各種形式主義的好夢。民權運動、婦解運動、反戰運動等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不斷地向躲在象牙塔中的文學研究提出挑戰：為什麼我們要讀（教）這些東西？它們和人類的歷史及現實中的問題有什麼關聯？在此時覺醒的人不但包括註冊入學以避免被徵兵去越南的年青學子，及大學校園中已有的、被壓迫的各級學生，並且也吸收了不少原本是新批評信徒的學者，他們親眼看到美國的不義作為，又親身感受到軍方及大企業與教育機構之間的勾搭，決心摒棄象牙塔中的文字遊戲，要求教育生活化、現實化。

單單校園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抗議恐怕還不足以搖撼新批評的根基，但是客觀大環境的轉變却不容新批評不退讓。越戰拖延多年，美軍吃盡苦頭，美國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區的國際警察角色也同時節節敗退，這些國際上的因素在國內的經濟上自然有影響，政府龐大的軍費支出使赤字日增，美國在全球各地的駐軍及艦隊巡戈更增負擔。除了這些壓力外，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一個瓶頸，福利社會的保護性反壟斷經濟政策也不能再配合大企業吞食世界市場的迫切需要，替企業界代言的經濟學者們於是開始高呼「自由放任經濟」的口號，鼓吹政府不再干預、保護、及一統經濟層面，而讓各企業彼此各憑本事自由競爭。這種「自由放任主義



• 象牙塔內的形式主義受到了六、七〇年代社會運動的挑戰

」的要求一旦在經濟學領域形成主流，講求嚴謹結構與秩序的新批評便在文學研究界顯為「過時」了。

不看事物發展過程，只圖重建內在邏輯

六〇、七〇年代的各種社會運動及美國自身在國內及國際現實中遭遇的困境在學術界普遍引起震動，當時受到挑戰的不只是文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即新批評），而且還有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即邏輯實證論的科學哲學）。形式主義的特色就是不看事物發展的過程，只看發展的結果，然後在那結果中試圖重建內在的邏輯。文學的形式主義因此輕忽從事文學活動及受文學影響的人，也不看文學活動的歷史背景及社會使命，只想在文學作品中建立一個階層的架構。科學的形式主義則不注意科學史及知識社會學，認為理解科學就是把科學整理成一個嚴謹的系統，把科學命題依公理、定理的邏輯階層關連起來，至於科學怎樣受到社會上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者科學研究的方向如何受到軍方及大企業的左右，都和理解科學理論無關。

形式主義這種象牙塔式的研究在五〇年代是很好的護身符，建制也可以利用它來削減反對勢力，但是在六〇年代，現實的問題已逼到了眼前，學術研究與掌權階層之間的勾搭已經暴露無疑，而且被壓迫的人群已經覺醒，起來以行動抗爭，在這樣的情況下，形式主義就和它所支持的建制一樣站不住腳了。

理論的興起、衰落是多重決定的

文學理論的形式主義與科學理論的形式主義在美國幾乎同時興起，都成為主宰的理論，也都同時衰落，這種現象若非放在歷史及社會的角度內，是無法合理解釋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個巧合不過是理論界典範更替的現象而已，沒有什麼更深的含意，也和周圍的現實世界無關。擁護這種說法的人顯然對「典範」一詞的創始人湯瑪斯·庫恩（Thomas Kuhn）的學說只有片面的了解，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做的主要是駁斥過去的科學史觀，這種史觀視科學為累積、進步的結果，庫恩的論證便是在顯示這個史觀與事實不符，科學理論的更替根本不是

個在知識論領域內可能找到解釋的問題，而必須研究「科學社群的社會學」。但是，庫恩自己坦白承認他的理論並未觸及為什麼會有典範更替的現象發生，也沒有討論那「科學社群的社會學」，或是什麼「政治—社會—經濟」的原因影響了科學理論的內涵，庫恩也承認這方面的分析對了解科學革命有頭等的重要性，可是由於他本人當時能力及篇幅有限，只得放棄對科學革命結構的「全面」分析。這個放棄也許使庫恩的分析工作容易些，但也成為庫恩理論中的一片大空白。那些捧著「典範」的上方寶劍到處亂揮的人應該審視一下寶劍本身的限度了。

經過這一連串的分析，我們看見新批評——或其他學術理論——的興起和走紅並不單純是學術的、理性的因素造成的，它的衰落及被揚棄也不是因為後人發現了它的「錯誤」或局限造成的；相反的，它的歷史是由好幾個複雜的因素「多重決定」的（套用弗洛伊德的術語）。單單批評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傾向而自以為新文學理論才最有道理的人恐怕連庫恩的理論也沒摸著邊。理論不是愈來愈正確、愈來愈靠近真理的，在這一點上，庫恩早已說明，若要了解新批評的歷史或文學理論的現在與未來，恐怕還得先由那些多重決定的因素開始。同樣的，單單批評新批評的意識型態內涵便以為揭露了它的正身本相的人，也須要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具體的歷史現實上，這樣才算真正了解了新批評的歷史意義，間接地也可以對己身的歷史意義加深認識。

當然，新批評的擁護者作為逐漸失勢的利益及權力集團是不會甘心罷休的，新起的勢力集團必須用論文、學術會議、專書等方式打垮新批評的理論基礎，同時在人事上用排擠、解

雇、退休等方式排除舊勢力的權力結構。這個過程自從七〇年代開始便在美國各大學的刊物及系務會議上進行，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新批評已完全信譽掃地，但是繼起的文學理論熱還有一些教學上的問題有待解決，文學研究改弦易張之後能提供什麼意理功能也還不太明顯，因此目前這兩股力量還會並存一陣子。

現實基礎與建制的批判才是首要工作

由以上的敘述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這個結論：對新批評的批評必須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環境中來看才能了解個中含意。新批評因客觀形勢的需要而興起推廣，也由於客觀形勢的轉變而衰頹，目前走紅的理論熱可想而知也有它興起的客觀條件及功能。因此，批評新批評的文學理論擁護者必須先反省自身的意理功能及在學術潮流變遷中的角色，才不致於只見他人眼中有刺却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有不少搞理論的學者很興奮地自認要革新文學研究，批評文學研究的意理功能，但是這種革新——甚至革命——都只是表面的激進而已；如前所述，文學理論者批評新批評者，在廣大的背景中來看，是新興勢力集團代言人向舊勢力集團的代言人奪權而已，也還是在建制分配的崗位上搶雞骨頭。若沒有動搖到建制本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對文學研究作為教育建制的一部分、社會建制的一員的事實加以反省及分析，再激烈的言論也只不過更鞏固建制，更深化建制的統治基礎而已。

因此，真正要批評新批評就必須批評新批評所服務的建制，真正要做有反省的文學理論工作便必須先反省文學理論賴以發展的那個現實基礎與建制。對批評新批評的人來說，這兩件工作都是首要的。

海峽需要您的意見

1. 請您將本期最喜歡的二篇文章列出並說明原因。

2. 請您將本期最不喜歡的二篇文章列出說明原因。

3. 就本期的內容而言，您關心的層次是：

- 政治 . 思想 . 社會文化 .
經濟 . 文學藝術 . 其他 . (請註明)

4. 您認為本刊還有那些地方需要加強改進？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5. 您的性別是：男 . 女，今年 歲，姓名：

6. 您的教育程度是：小學 . 國中(初中) . 高中 . 專科 . 大學 . 研究所以上 .

7. 您的職業是：工人 . 農民 . 軍警 . 教師 . 公務員 . 小生意業者 . 學生 .
企業主 . 職員 . 主管 . 自由業 . 其他(請註明)

8. 您如何讀到本刊：訂戶 . 零買 . 圖書館 . 向朋友借閱 . 其他(請註明)

9. 您的聯絡電話是：

10. 您的地址是：

11.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2. 請您介紹一個親友的姓名、地址，我們將寄贈本刊請其試閱。

姓名：

地址：



帝國主義是 我們的最大敵人

——奧提佳由戰到和

■黃怡

今年（一九八七年）七月，尼加拉瓜舉行了一個萬人的盛大儀式，慶祝桑定政權革命成功屆滿八週年。南非的奧利佛檀波受邀為典禮中的上賓，尼國總統奧提佳頒發給他最高勳章，並且說：「我們如今面對著共同的敵人，那就是帝國主義。」

在一九七九年，以尼國民族英雄桑定（Augusto César Sandino, 1895~1934）為名的桑定游擊隊，打垮了美國支持的蘇慕沙政權，這個政權，有許多人認為是拉丁美洲歷時最久也最腐敗的政權。當時，勝利的政權領導人之一丹尼爾奧提佳（Daniel Ortega）備受矚目，他是個愛國的實用主義者，頗得老百姓愛戴支持；若沒有他，這支信守左派理

論的革命隊伍能否成功，還大成問題。

經過蘇慕沙政權多年來的巧取豪奪，加上一場慘酷內戰，尼加拉瓜可說是滿目瘡痍，一貧如洗。重建國家的工程浩大非常，奧提佳組成一個「國家重建政府」，這是個多元代表制的政府，也是個社會主義制的政府。正當大家使盡全力，讓這個政府包容多方意見，在國內主張混合式經濟，對國外主張政治不結盟的當兒，却橫裡殺出一隊名為「反革命軍」（Counter-revolutionary）的右翼軍人，他們是美國政府支持的所謂「自由鬥士」，有槍有炮，擾攘得尼國上下雞犬不寧。

從一九八四年六月開始，在中美洲一些國家的協助下，奧提佳一直想勸服雷根政府，尼加拉瓜並不是輸出共產主義的中心，不是中美洲的亂源。奧提佳就是拒絕和尼國的叛軍談判，因為他知道，要和要戰，關鍵在於美國。

蘇慕沙王朝的惡劣

奧提佳的全名是 Daniel Ortega Saavedra，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於尼國的黎伯塔（La Libertad）鎮，他的家庭屬於中下階層。奧提佳下面有兩個弟弟 Humberto 和 Camilo，後來都成為尼國革命軍的領袖，其中 Humberto 還做了桑定政權的國防部長。

奧提佳三兄弟的效仿對象，是他們的爸爸，此人曾跟隨著桑定將軍，隸屬於農民軍而南



● 奧提佳與卡斯楚進行會談

奧提佳個子並不高，總是戴著一付淺粉紅鏡片的眼鏡，臉上充滿誠摯的微笑，他是所有尼加拉瓜政治領袖中態度最嚴謹的一個。

很顯然，奧提佳並不是具有煽惑力的演說家，也不是什麼傑出的理論家，但他是個很機靈也很有耐心的仲裁者，同時是個很精明的戰略家，這些特質，頗受到尼加拉瓜不論保守或激進人士的一致尊敬。

在坐監的時候，奧提佳閒來也寫詩，詩中常冒出三字經，內容十分直接，譬如：「流行迷你裙時的馬拉瓜 / 我永遠看不到了」。然而被迫害的經驗却未造成他偏激的性格，他始終相信多元的社會和混合式經濟。

儘管事業有成，奧提佳「八字還未一撇」，仍是個光棍兒。

征北討。而誰是桑定將軍呢？

在一九二六年美國海軍進佔尼加拉瓜的時候（這是七年中的第三次了），桑定將軍和他的部屬對美軍展開游擊戰，戰線頗長，戰況激烈，雙方僵持不下之際，美國軍隊在一九三三年抽腿撤退了。美國留下所謂「國家警衛隊」

（Guardia Nacional）當他的代言人，這是一支由當地人組合的傭兵，美國人補給和訓練他們，指揮官叫蘇慕沙（Anastasio Somoza Garcia），是從西點陸軍官校畢業的。

美國軍隊撤走後，桑定將軍終於放下武器，接受蘇慕沙的邀請，舉行面對面和談。談了沒幾回，桑定將軍就被對方抓走，不久後，被刺身亡。蘇慕沙的「王朝」於焉展開，他們統

治尼加拉瓜逾四十年，好像尼加拉瓜是他們家族的私人產業一樣。尼國的可耕耘土地，蘇慕沙家族就佔了三〇%的擁有率；尼國企業，多被官方壟斷經營；蘇慕沙政權百般保護美國人在尼加拉瓜的利益，却極盡全力壓制民間的反對力量。

這樣的一個獨裁君主，在一九五六年被暗殺。老蘇慕沙死後，長子路易斯繼位總統，他的施政確實比過去寬大許多，可是一九六七年他的弟弟Dedayle繼位後，尼加拉瓜又陷於水深火熱當中。

桑定陣線與第三黨

高中畢業後，奧提佳進入耶穌教經營的中美洲大學（Universidad Centro- Amer-

豐收 (The Fruists That Would Be)

■奧提佳 ■曾珠喜譯

播種者決心開墾

這塊土地之前

已經知道

石塊必須搬開

荊棘和莠草必須拔掉

雙手不免流血

腳趾不免砸傷

也知道

蝗蟲和田鼠須防備

拔除莠草多辛勞

然而

不管火災或柵欄

最後必定豐收

icana) 攻讀法律。在馬拉瓜沒讀上幾個月書，奧提佳就休學加入了「桑定國家解放陣線」(The Frente Sandinistade Liberacion Nacional)，當時是一九六三年。

桑定陣線是一九六一年由亞美多 (Carlos Fonseca Amador)、馬猶加 (Silrio Mayorga) 和瑪蒂尼茲 (Tómas Borge Martinez) 三人組成的，這支游擊軍隊的組合份子包括學生、農民和勞工。他們的近期目標是什麼呢？套句亞美多的話來說，就是要「推翻蘇慕沙政閥，因為它使尼加拉瓜淪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受到美國壟斷企業及政府寡佔團體的百般剝削」。

至於下一步，「桑定國家解放陣線」是想建立起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政權，將所有愛國、反帝、反托拉斯的人都結合起來，最終的目標，是使尼加拉瓜成為一個免於剝削和貧窮的社會國度。

儘管資歷比桑定陣線的其他領袖短了十年以上，奧提佳在組織中却迅速竄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已經接管整個陣線的都市抵抗戰略。隨後，他被蘇慕沙政府逮捕，幽禁長達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才因為交換蘇慕沙高幹人質，和其他十來個囚犯一齊獲得釋放。他們立即給放逐到古巴，在那兒，他接受卡斯楚游擊軍的訓練，幾個月後，又潛回尼加拉瓜，加入桑定陣線繼續奮鬥。

在亞美多強而有力的領導下，桑定陣線中至少有三個派系。兩個比較小的派系中，一個是信仰馬列主義，由瑪蒂尼茲領導，另一個叫做「第三黨」(The Terceristas)，則由奧提佳三兄弟領導，他們的主張最不激烈，也是沒有意識型態掛帥，逐漸贏得從農民以至上階層知識份子的支持。



●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宏都拉斯邊界秘密訓練尼國右



● 尼國政府積極推動全國性醫療計劃



軍

亞美多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強硬派和溫和派開始失和，失和的主要原因是奧提佳兄弟的「第三黨」在「十二人團體」(The Movimiento de los Doce)的掩護下，加入「反對者聯合陣線」(the Frente Amplio de Oposicion)。「十二人團體」的組成份子為工商業人士、學術界人士、教士，領導者是一個天主教教士卡丹諾(Ernesto Cardenal，日後成為桑定政府的文化部長)。而「反對者聯合陣線」，則是一個以中產階層為主導力量的反蘇慕沙組織。

一九七二年的馬拿瓜大地震，由於蘇慕沙政府不但無力賑災，尚且盜用國家重建基金，使災民流離失所，餓殍遍地。這點，觸怒了原

本較冷漠的中上階級，他們的「反對者聯合陣線」在一群中產階級開明派的領導下，走的不是激進路線，他們祇要求稍稍修改體制，「蘇慕沙主義照行，蘇慕沙下台」(Somozism Without Somoza)，却遭到當權者血腥的鎮壓。不錯，「反對者聯合陣線」的領導階層是因此而解體了，但他們號召而來的群眾運動却日甚一日，動向無常。

這時，奧提佳兄弟的「第三黨」剛好填補上領導階層的真空。亨伯多奧提佳曾在一篇訪問中說：「群眾運動波瀾洶湧，勢不可擋，我們祇能站在浪頭上，多少指引些方向……如果不這麼做，祇好聽任它變成無政府狀態。」

「反對者聯合陣線」瓦解，中產階級束手

無策，桑定陣線中派系的不合也雲消霧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們成立了一個聯合指揮中心，然後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廿六日，歸併成一個組織。

焦土政策與強盜作風

桑定陣線游擊隊祇有數百人，如何對付擁有一萬五千名大軍的蘇慕沙政權呢？桑定陣線從越戰經驗中吸取到的教訓，告訴他們要把游擊戰線拉長，以分散蘇慕沙軍隊的武力技術配備；不但如此，軍事行動還要和社會、經濟、政治各層次的整體動員相互配合。一九七九年春天，桑定陣線展開他們最後攻擊時，全國性的罷工和動亂，果然順利支援，使軍事行動可以有繁密的群眾組織網路予以撐持。

蘇慕沙政權現在面臨考驗：美洲組織會員國無異議地反對美國介入這場內戰，安地列斯聯盟（The Andean Pact）國一致譴責蘇慕沙的獨裁政權，有的甚至公開支援桑定陣線；美國政府固然一向支持蘇慕沙政權，但這政權顯然達不到卡特總統要求的人權標準。

見到大勢已去，小蘇慕沙（Debayle）在他最後的幾個月，下令實施「焦土政策」，以報復站起來反對他的中產階級。他們計劃性地炮轟工業區，摧毀了工廠、醫院、學校、住宅……四萬多平民在戰火中死亡，無數人受傷、成了孤兒或無家可歸。蘇慕沙自有的牧場裡，兩百五十萬頭牛隻被宰殺，運到美國佛州邁阿密冷藏，準備日後出售。為了使利上加利，蘇慕沙政權大量向國外私人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舉債，且不斷向多國企業開發信用債券；他們知道，新的政權上台後，一定會被國際債務逼得抬不起頭來。

在美國政府的同意下，國際貨幣基金會借

給這個獨裁政權三千三百二十萬美元，一九七九年五月匯入馬加瓜的中央銀行，可是在六月馬加瓜進入戰爭狀況後，銀行關閉，這筆款項也神秘地失踪了。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小蘇慕沙帶著黨羽逃往邁阿密，走前將國庫洗劫一空；他後來又轉居巴拉圭，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七日，終於躲不過命運安排，被刺殺了。

桑定陣線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九日凱旋地進入馬拉瓜。為了避免拉丁美洲國家強人專政的不穩定局勢，他們採取集體、多元的領導結構，答應在一九八五年進行大選。新政府的行政權，抓在以奧提佳兄弟「第三黨」為主的五人小組裡，由丹尼爾奧提佳主司協調，而他的上面，還有一個九人政團，是桑定陣線各派系共組而成的，至於反蘇慕沙的各個團體，有的進入內閣，有的進入國家會議（一個有立法權的機構）。

新政府提倡混合式經濟，除了蘇慕沙有關的家族企業外，新政府強調它絕對避免沒收私人企業或財產，它管制了對外貿易，使地方性的銀行和保險業國家化，廢除死刑，善待蘇慕沙叛軍俘虜，對於國外，它宣揚不結盟政策。

在一片廢墟中重建

「蘇慕沙簡直留給我們一座廢墟」，瑪蒂尼茲在一次訪問（「花花公子」雜誌，一九八三年九月）中說，「數萬人死了、社會落後、文盲遍佈、國家赤貧。那個政權留給我們一個在市場上毫無競爭能力的工廠，國庫裡沒有一個銅板兒……除了債，還是債，千千萬萬的債，借來的錢隨他跑了。這些尚不打緊，重要的是蘇慕沙政權留給尼國人民一種很低的品味，想把尼加拉瓜變成邁阿密……。」

幾乎尼加拉瓜的每個經濟部門都在危機中



志願工作者投入文盲的教育工作

，兩百五十萬的人口，馬上有一大半要瀕臨飢餓線，奧提佳立即向國際求援，但另一方面，又因頓地想守住尼加拉瓜的中立色彩。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帶頭響應，在一九八〇年，這兩國以七〇%現金、三〇%貸款的方式，給尼加拉瓜運去石油；義大利提供了大把鈔票，幫助尼國成立地熱電子工廠；蘇俄幫助尼國發展水力電子和其他計劃；古巴提供了教師、技術人才、醫療人員、軍事專家；法國則提供了經濟援助及武器配備。後來，右翼反革命軍在北方宏都拉斯邊界侵襲時，利比亞也提供了桑定政府軍事援助。

自從內戰以降，尼加拉瓜人們所得到的援助，半數以上來自拉丁美洲國家和西歐國家（包括荷蘭、比利時），二〇%來自共產國家。

爲了得到美國援助，奧提佳在一九七九年九月拜訪了卡特總統，獲取七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和價值四千萬美元的其他援助。可是一九八一年雷根總統當權後，政策上一百八十度逆轉。雷根指稱，尼加拉瓜是古巴給左派薩爾瓦多游擊隊軍火的傳遞管道，又說尼加拉瓜在西半球散佈共產主義毒素，所以，在桑定政權不甚鞏固之前，要使它「更不穩定」。

雷根是說到做到。卡特政府批准的最後一筆一千五百萬美元貸款，被雷根政府取消了；尼國向美國賒債買九百六十萬美元的小麥，被

迫停止進行；尼國向美國賣糖，有九〇%被刪除。

一九八一年九月，尼加拉瓜的經濟已經惡劣到政府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了，但更嚴重的事情還在後頭，美國情報局支援和訓練尼國右翼反革命軍的事實，終於公開了。叛軍就在宏都拉斯的邊界躍躍欲試，於是桑定政府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況。

到了一九八三年二月，已有數千名美國支持的尼國右翼軍人，在宏、尼邊界集結、巡邏，宏都拉斯的火箭部隊全面待命，美國軍方也從海、陸、空三方面，加緊監視尼加拉瓜動向。三月，這些右翼軍人已零零星星地侵入尼國境內。

前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懷特（Robert E. White），曾發表他對這種局勢的細密觀察（紐約時報，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尼國右翼軍人的侵襲，真正的目的並不在推翻桑定政權，也不是雷根所言，想阻斷尼加拉瓜運軍火到薩爾瓦多，而是想激怒桑定政權，使他們跨過宏國邊界來追趕右翼軍人，因為這麼一來就成了國與國間的區域戰事，希望打到最後，由美國掌握國際和諧局勢，一舉解決所有問題。

…儘管桑定政權的確怒火中燒，而且也毫無經驗，却仍命令所屬軍隊不得逾越國界，且三番兩次向美國與宏都拉斯表示願意和談。」

我們不願再戰爭

北方有尼國右翼軍人在滋擾，南部的哥斯大黎加邊界，桑定陣線的叛離份子葛梅茲（Edén Pastora gomez）也搗亂頻頻。這一南一北，雖未攻下一鄉一鎮，也沒獲得老百姓普遍支持，却毀壞了許多經濟建設，兩年內殺死約五千人。據奧提佳估計，光是一九八三年一



● 桑定政府駐美大使、反對派領袖之一：庫魯茲（右）

年的戰事，就使尼國損失一億兩千八百萬美元。戰事升高，迫使軍事支出達到總預算的廿五%，而且開始實施徵兵制。尼國境內，這時物價飛揚，食品、藥物短缺，連肥皂、糖、煮菜油和汽油，都必須採用配給制。

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國入侵格拉娜達的事件發生後，奧提佳很小心地試圖轉變美國人對尼加拉瓜的印象，十一月，他宣布不再向國外購買軍火，並要求古巴及其他國家的軍事專家撤離，他並答應一些拉丁美洲的盟邦（如墨西哥、委內委拉、哥倫比亞與巴拿馬），桑定政權對國內反對份子的壓制會放鬆；十二月，奧提佳宣布大赦，並發還土地給部份小的地主。

再下來就是選舉總統、副總統和九十人的國會，日期定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奧提佳被提選為桑定政團的總統候選人。除了傳統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之外，最強的反對勢力，是由兩個勞工聯盟和工商業團體組成的，他們默認的總統候選人是庫魯茲（Arturo José Cruz），他曾是桑定政府派駐美國的大使。

反對派為了使「參不參加總統大選」變成

強迫桑定政府做政治改革（如釋放更多政治犯、開放言論尺寸）的籌碼，一再拖延候選人登記日期，終至無法登記而棄權。

一九八四年三月，尼國右翼軍人發動攻勢，四月，尼國港口發現有水雷，因為在附近海面的美國艦隊涉嫌，引起軒然大波，五月，海牙國際法庭調查結果，公開譴責美國干預內政。同年年底，奧提佳贏得六三%的選票，當選總統。

因為「伊朗門事件」美國在尼國內戰中的奇怪角色，再次受到世人注意。一九八七年七月，在革命成功八週年的慶典上，奧提佳的演講論及伊朗門事件，他慨然的說：

「伊朗門事件的聽證會，祇是再一次暴露了所謂美國式民主的不道德、偽善和腐敗。」

一九八七年八月中旬，奧提佳與十一個國內反對黨領袖會談，這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的頭一回。尼加拉瓜沒有條件再打任何形式的戰爭了，奧提佳眉頭鎖緊，在他腦中，充滿了無數有待落實的和平計劃。

◎世界思潮◎

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

——馬克思(上)

■陳宗文譯

■Anthony Brewer著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原則上能夠在其自身基礎上生存，不需要向周圍的非資本主義社會擴張。他並沒有見到一個必然由少數中心所統治著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而是把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相對落後及其對歐洲主人的依附，看作完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世界經濟形成過程中的過渡現象。

馬克思沒有用帝國主義這個術語，在他的著作中，也沒有任何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作家提出的帝國主義的概念相應的提法。當然，馬克思確實闡述了資本主義及其發展的理論，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論述了歐洲帝國主義對歐洲地區以外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雖然他的論述是零散的，但是遍及他的著作。馬克思沒有像後來的許多作家那樣，預見到會形成一個必然由少數中心所統治著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而是把歐洲地區以外的世界的相對落後及其對歐洲主人的依附，看作完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世界經濟形成過程中基本上過渡性的現象（儘管可能持續的時間很長）。

遵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後來的作家，一般地說，沒有把他們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建立在馬克思論殖民地的著作的基礎上。他們既從馬克思的理論核心中吸取營養，又從其理論中乍看起來與帝國主義無關的特定論述中吸取營養（比如，雷是從馬克思對地租問題的探討開始論述的，艾曼紐爾是從生產價格開始論述的）。

在這一章中，我想從簡單論述馬克思關於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入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原則上能夠在其自身的基礎上生存，它的發展不需要向周圍的非資本主義社會擴張。然而，資本主義必然起源於一個更為廣闊



• 馬克斯像

海峽(76年10月號)

的前資本主義世界，所以下一步驟是考察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理論，看一看為什麼資本主義的擴張事實上是犧牲其它生產方式為代價的。最後，我將考察馬克思關於殖民地的著作，尤其是關於印度的著名論文。前兩節抽象地闡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其它幾節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進入非純粹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中去的。

對術語的用法作一個預先的說明：馬克思沒有提出一個一般性的術語來描述比較先進的國家對比較落後的國家的統治。我採用了**殖民主義**這個後來被廣泛採用的術語。馬克思本人用這個術語時，常常指人們在那些無人居住的地區或者那些土著居民被驅逐了的地區的定居（例如在澳大利亞和美國）。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 《資本論》分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馬克思思想的核心

馬克思畢生事業的核心是分析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種分析包括在《資本論》三卷中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勞動力具有由勞動力價值所決定的單一的價格；當生產價格被引入（在第三卷中）的時候，當作一種增量歸於所有資本的利潤，具有一個單一的一般利潤率。當然，這是一種抽象，馬克思在整整三卷中提供了把抽象理論與極其複雜的實際聯繫在一起的許多例證。但是，在這一理論的範圍內，並沒有篇幅來論述不同國家的不同經濟狀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恰恰與法蘭克和華勒斯坦提出的概念相對立，他們二人認為，中心區與衛星區間或者中心與外圍間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特徵。

在本節中，我想非常扼要地談一談基本理論，把重點放在介紹後來的作家所應用的主要概念上。這並不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唯一教本，對那些想更多了解這一理論的人來說，存在著論述這個課題的大量文獻（例如：霍華德和金：《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1975年）。

資本主義生產是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商品生產，資本家把剩餘價值歸為己有，其泉源在於把工資勞動者與資本家雇主聯繫在一起的特定的社會關係。

資本主義是商品生產的特殊形式。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就是市場銷售的產品的生產。這種經濟形式存在於這樣一些地方，在那裡有許多獨立的生產者，他們生產自己不使用、而用來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產品的產品。馬克思區別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的用途）和交換價值（通過交換該商品可以得到的東西）。使用價值的生產對任何社會的生存（再生產）都是絕對必要的，而在商品生產的社會中，這一點被生產者只關心產品的交換價值這一事實掩蓋起來。

海峽(76年10月號)

馬克思提出，交換價值是由（勞動）價值說明和決定的，在這裡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直接或間接地為再生產這一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小時為尺度）。勞動價值論是爭論甚多的主題。應用勞動價值論的困難在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實際上不是按價值交換，而是按照圍繞生產價格上下波動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換。在聯合生產的場合，或者包括固定資本在內的任何場合（最簡單的情況除外），價值是難以滿意地確定的，而且易於成為負數，或不能正確地相加。

事實上，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主要以勞動價值論為依據的，所以我們可以撇開這場爭論不談。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可以把價值看作馬克思引入的並用來闡述他的主要理論觀點的一種便利的分析工具，但是，他的主要命題可以用其它的價格理論來複述。我認為，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他對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所作的規定，我們在描繪這些關係時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勞動價值論。在這一章中，我將採用勞動價值論來論述，因為這是馬克思應用的方法。

接著馬克思開始說明資本主義生產，即商品生產的一種特殊情況。他問道：作為一種增量歸於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粗略地說是利潤）的源泉在那裡呢？

他發現其源泉在於把工資勞動者與資本家雇主聯繫在一起的特定的社會關係。他說，勞動者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即勞動能力，而不是他的勞動。勞動力與勞動之間的區別，是勞動價值論的關鍵（勞動的勞動價值是無稽之談），而且也表明了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實際的勞動過程，即勞動力（勞動能力）向實際勞動本身的轉化過程，是在勞動力的新的所有者，即它的買者（資本家）的控制下進行的。資本家同時也購買生產資料（物資、設備等等）。

勞動創造的價值是一天內的勞動小時數（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但資本家支付的工資只相當於勞動力的價值，即再生產一天的勞動

力所需要的勞動，這也就是工人及其家庭（因為工人必須再生產）維持一天的生存所需商品的價值。如果在一天內創造的價值超過了一天內勞動力價值，那麼就產生了剩餘價值，這是資本家在出售產品後可以把它裝進自己腰包的。

從全體工人與全部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來說，這就意味著，如果總產品超過了工人所得到的商品加上補償消耗掉的生活資料所需的商品之和，就會產生利潤（或剩餘價值）。換句話說，剩餘價值相當於剩餘產品。就單個資本家來說，利潤（或剩餘價值）依賴於價格（或價值），因為每個工人得到的商品與他生產的那些商品是不同的，而且在被消費的商品不是在同一個生產單位內生產的地方，除非我們能把它們還原為一個共同的單位，我們就不能把它們相減。對開放經濟來說，當工人生產出口商品，而消費一部分進口商品時，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馬克思的工資（或勞動力價值）理論是有些難懂的。他說，工人需要的商品並不取決於純粹生理的需要（儘管純粹生理的需要是一個最低限），而且還包括“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在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在《工資、價格和利潤》這本小冊子中，闡述了關於工資由交易能力決定的理論基礎。很清楚，如果工資提得很高，以致使利潤降低到某種最低水平以下，就會導致生產的停頓和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為工資提供了一個上限，這個上限要確保利潤的存在。

在這種社會裡，資本是“處於過程中的價值”，這就是說，資本是以我們已往描繪過的方式來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價值的貨幣或商品。一個資本家的財富最初採取貨幣的形式，其次採取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形式，再次採取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形式，最後通過商品的出售，又採取貨幣的形式，準備重新開始這一循環。（事實上，所有階段都相互重疊。）資本是由整個循環來規定的。在衡量資本家的資本（比如“一個一百萬鎊的資本”）時，要計算貨幣



● 1909年英國曼契斯特一家製帽工廠的工人狀況

價值、正在進行著的勞動、生產資料和最終商品。這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關於資本的定義相比，是不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關於資本的定義一方面比較窄，因為它僅僅包括生產資料，另一方面又比較寬，因為它包括所有的生產資料，而不管其社會內容如何。馬克思認為，財富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資本家用來生產剩餘價值時才是資本。這就是我將貫徹始終使用的定義。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生產的技術需要，而馬克思則把它看作制約著特殊的生產方式的社會關係。

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包括了許多獨立的生產過程，以及把它們連接在一起的交換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產品必須通過市場，通過商品交換來實現。這兩者都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不可分割的、必要的

組成部分。
圖書館 數位化

我們先就此告一段落，下面來考慮生產與流通（交換）這兩個“領域”的狀態。這兩個領域都是上面已經描述過的資本循環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由許多個資本所組成，其中的每一個資本都由資本家直接控制，但是許多資本家通過市場交換聯繫在一起；資本主義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並且由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經濟規律的盲目作用所支配。這些不同資本的循環相互交織：一個資本必須從另外一些資本那裡購買生產資料；工人要用一個資本支付給他們的工資，到另外一些資本那裡去購買生活資料。因此，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包括了許多獨立的生產過程，以及把它們連接在一起的交換過程。這兩者都是社會生產過程的不可分割的、必要的組成部分。有些馬

克思主義者試圖論證，狹義的生產在某種意義上是首要的要素，而流通是次要的要素。根據上述討論，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當生產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進行，另一部份在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進行，並且通過交換把兩個部分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問題就變得更加難以解答了。美洲生產棉花的奴隸種植園為產業革命中心蘭開夏郡的棉紡業提供原材料，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一例。一些作家想把這種情況說成是純粹資本主義的生產（具有非正統形式的勞動紀律），而另外一些作家則把它說成是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這問題至少有一部分是語義學的。重要之點在於存在著一種社會生產過程，它既包括資本主義的，又包括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這種可能性是商品生產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是，這些話說得未免早了些，現在我涉及的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的制度的基本特徵在馬克思關於這個制度再生產的論述中表現得最為清楚。他主要是在《簡單再生產》一章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簡單再生產就是，在每一個生產周期以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又像以前一樣重新建立起來這樣一種事態。這種方法僅僅為分析簡便而採用。真正重要的情況是擴大再生產，在那裡，利潤被當作新的資本積累起來，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就發展了。請注意一個簡單的“生產周期”的思想，它從生產資料、用於工人消費的消費品開始，而在這些東西被消耗掉、由新生產的商品所代替時結束。這是另外一種分析的虛構，它使整個過程簡化，但不影響有關的原則。

首先考慮工人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在生產周期開始時，工人一無所有，“除了他們的勞動力外沒有什麼可出賣的”，因此他們除了找工作以外，沒有別的選擇。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進行生產，因為他們不能獲得生產資料。資本家支付給他們足以滿足他們的（社會地決定的）需求的工資。在生產週期結束時，工人花完了他們的工資，又回到他們的出發點，

被迫重新尋找工作，自始至終，馬克思一直假定有一支產業後備軍，一大批失業工人，他們為職業而競爭，使工資處在一個低水平上。假如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大吸收了所有這些失業工人，以致失業的威脅不再能壓低工資和維持勞動紀律，那麼就會發生危機，危機會縮減生產，推動節省勞動的投資，並且重建後備軍。

另一方面，資本家一開始有足夠的購買力（貨幣資本）來支付工資（可變資本）和購買生產資料（不變資本）。在生產過程結束時，他得到足夠的收入，除了補償支出外，還有剩餘（利潤），資本家或者把剩餘全部用於自己的消費（簡單再生產），或者取出一部分進行新的投資（擴大再生產）。

這樣，生產周期從商品所有者（資本家）同一無所有的工人對抗的局面開始，以這兩個階級同樣對抗的再生產結束，然後周期重新開始。馬克思強調指出，這並沒有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關於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我們以後再談。

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決定性特徵是，資本主義是一種商品生產，所以生產是由許多競爭著的各個資本進行的，沒有一個中心的協調計劃。這就給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只說資本家必須以交換價值的形式得到剩餘價值，這是不夠的。同時還必須生產出如生產資料、消費必需品等等使用價值的正確的混合。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最後幾章中，從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的交換方面分析了這個問題。第一部類是生產生產資料的產業，第二部類是生產消費品的產業。馬克思用數字例子或者再生產圖式表明了這兩個部類之間存在著與簡單再生產相適應的某種關係，存在著與擴大再生產相適應的另外一種關係（有賴於積累率）。這就不難看到，可以運用這種分析去更具體地觀察每一部類內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必要比例。

社會資本再生產的矛盾，決定了資本



• 1910 年及 1924 年倫敦地區的失業工人正排隊登記工作機會

主義再生產過程生產和消費不可能相適應。消費不足論的中心思想是：由於某種原因，消費需求比生產資料的需求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後者祇是為了向前一種需求提供產品而存在。這種理論，在帝國主義理論當中，可以用來解釋尋求國外市場以彌補國內需求不足的現象。

馬克思對再生產的分析中引起了無休止的爭論，而且與帝國主義理論有重大關係的一個問題，就是市場問題。資本家如何能希望銷售

他們的全部產品呢？有一種論點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採用的，我把它稱作消費不足論。它的最簡單的形式是這樣的：如果工人不能購買全部產品，那麼資本家如何能把它賣掉呢？在簡單再生產的圖式中，馬克思回答道：資本家自己消費剩餘產品。這就需要他們之間相互出售，因為每一個資本家專門生產一種特定的產品，而希望消費其它的產品。資本家消費掉他們的利潤的思想只是為保持簡單再生產的思想所必需的分析上的虛構。事實上，資本家節省和積累，而且競爭迫使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參見下文），但是，這並不能根本改變事態

。資本家仍然在他們相互之間交換剩餘產品，他們購買的不是消費資料，而是生產資料，而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的比例必須相應地不同。這些論證由於下述假設而有些複雜化，這個假設是：工資是預付給工人的；某些新的投資採取了向追加的工人支付工資的形式，然後工人把貨幣花費在消費品上。用貨幣進行這種交易不是什麼問題，因為貨幣只從一隻手轉到另一隻手，並沒有被用掉。在每一周期的末了，貨幣又回到出發點，準備重新周轉。

消費不足論的中心思想是：由於某種原因，消費需求比生產資料的需求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後面一種需求只是為了向前面一種需求提供產品而存在。人們往往爭辯說（斯威齊1942年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中的觀點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消費是靜止的，就不會刺激投資。這完全是錯誤的，因為投資方向不僅可以是消費品產業，而且可以是資本貨物（生產資料）產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投資方向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重要的問題完全在於投資是否有利可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消費需求沒有固定的狀態；大部份需求來自工人，而工人只有能帶來利潤才會被僱用，所以消費和投資兩者都是主要來源於旨在取得利潤的資本家的開支。

這的確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如果利潤的前景不好，投資就會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就要削減投資、減少就業的工人，從而會降低需求，並引起連鎖反應。另一方面，如果預期可以得到高額利潤，這種連鎖反應就朝另一個方向發生作用。馬克思預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將經過一系列的高漲（這確保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衰退或者“周期性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是分散在許多地方的。很難駁倒認為馬克思是一個消費不足論者的看法，因為從原文中摘出來的某些孤立的詞句是可以做出這樣的解釋的。重要的問題是，他分析問題的邏輯與消費不足論是不一致的。擴大再生產的圖表表明需求與供應相應地擴大在原則上是可能的，儘管資本主義制度遭到危機也同樣是可能



• 1929年經濟大恐慌：馬克思預期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

的，而實際上它也確實反復遭到危機。資本主義制度遭到危機的原因，必須到決定利潤率的諸因素中去尋找，而不是到需求內在的問題中去尋找。

我將按照出現的先後討論消費不足論的各種不同的表現，尤其是討論盧森堡、巴蘭和阿明的消費不足論。消費不足論者的觀點在帝國主義理論中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尋求國外市場以彌補國內需求不足的這種現象。

競爭和資本主義的動力

我們已經看到，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剩餘價值產生於工人生產的價值（即勞動日的長度）與勞動力價值之間的差額。馬克思把勞動日中與工人用他的工資購買的商品價值相當的那一部分叫做必要勞動，把其餘部分叫做剩餘勞動。剩餘價值可以通過兩條途徑來增加：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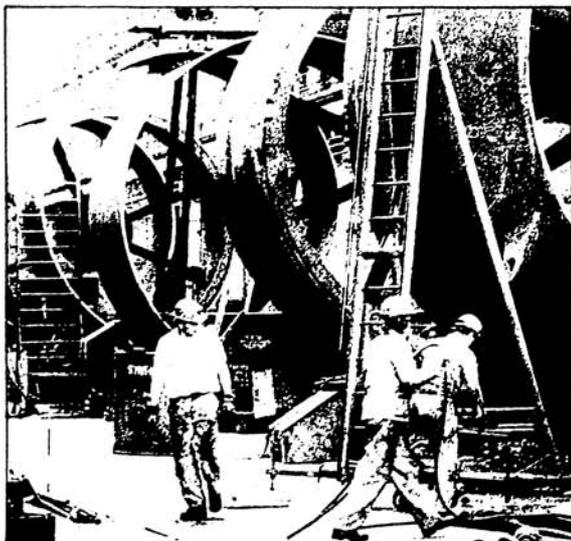
延長勞動日（馬克斯稱之為絕對剩餘價值），或者減少必要勞動。減少必要勞動的辦法可以是提高消費品工業（或者用於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資料）的生產率，從而降低勞動力價值（以相當的勞動小時來計算），但不減少工人實際得到的商品。馬克思稱之為相對剩餘價值。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增加工人生產的剩餘產品的辦法，或者可以是使工人勞動更長時間（絕對剩餘價值），或者可以是改進生產方法，在同樣多的時間裡生產更多的產品（相對剩餘價值）。絕對剩餘價值受體力耗盡的限制，而相對剩餘價值則不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以及在殖民地，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在那裡勞動時間延長到最大限度，工資壓到最低限度。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相對剩餘價值起著支配作用。

競爭的壓力迫使資本家盡最大的可能來積累再投資，以便擴大生產規模。透過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這兩種方式，資本有機構成（ C/V ）不斷上升，而且它上升的幅度大於剩餘價值率（ S/V ），從而使利潤率趨於下降。這就是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都是競爭的壓力強加在資本家身上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是主要的動力。在價格水平普遍降低之前，能夠降低成本的新的生產方法（不管它是技術上的改進還是勞動紀律方面的“改進”）會給迅速採用它的人帶來超額利潤。一旦新的生產方法被普遍採用，競爭會迫使價格降低到與降低了的成本相適應的水平，並且掃除那些仍然維持高成本的生產者。

馬克思假定（一般說這是正確的）大規模的生產比小規模生產效率更高。所以，競爭迫使資本家盡最大可能來積累和再投資，以便擴大生產規模。通過利潤的再投資來實現



● 競爭迫使資本家擴大生產規模，增強了集中的趨勢。

的增長，馬克思叫做資本積聚。那些在競爭中名列前茅的人就能夠更好地生存下來，尤其是能夠在衰退時期生存下來，並且能夠兼并一些較小的廠商。用合并資本的辦法擴大生產規模，被稱作集中。

儘管這些過程使效率不斷提高，馬克思斷言存在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我認為這個想法是很重要的，因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帝國主義是對利潤下降的一種反應。馬克思的論證是這樣的：讓 C 代表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V 代表勞動力的價值， S 代表剩餘價值。那麼 S/V 就叫做剩餘價值率，即剩餘勞動除以必要勞動。然而，利潤率是 $S/(C+V)$ ，因為資本家把他的利潤與所投入的全部資本（表現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購買中）相聯繫。現在，把分子和分母都除以 V ，那麼利潤率就是：

$$\frac{S}{C+V} = \frac{S/V}{C/V+1}$$

這個分式的分母中所出現的分數 C/V 是資本的價值構成。

馬克思把生產資料的實物量和雇佣勞動量之比定義為資本的技術構成。資本的價值構成是兩者的價值之間的比率。馬克思說：“我把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並且反映技術構

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但是他似乎忘記了這個定義，實際上把有機構成和價值構成變成了可以互換的術語。

他斷言，隨著資本的積累， C/V 會上升，而且它的上升幅度比 S/V 大（由於相對剩餘價值即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從而使利潤率趨於下降。這就是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

他然後承認，存在著相反的趨勢。相反的趨勢有這樣幾種： S/V 可能上升，工資可能被壓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等等。最重要的是，如果生產率提高，一定量生產資料的價值就會下降，因為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減少了。馬克思把這種現象叫做不變資本要素的低廉化。因此，盡管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實物量增加了，但其價值量並不一定增加。“利潤率下降”的理論主要是以下面的情況為依據的：消費品工業中技術進步很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實物量日益增長，但生產資料生產中却沒有相應的技術進步。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將由利潤率下降而自行崩潰。但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預見的主要依據，是私人佔有和日益增長的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尤其是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趨勢，在日益緊密地一體化的經濟制度下，把工人集中成為越來越大的團體，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

我們必須提到的另外一種相反的趨勢是對外貿易。顯然，這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馬克思認為，投入對外貿易的資本會取得更高的利潤。其理由包括：資本的本國可能比較先進，從而可以像首先創造一項革新的廠商一樣得到超額利潤；本國的勞動可能具有較高的生產率，但並沒有得到較高的報酬，在殖民地的剝削率很高。諸如此類的理由，很少有理論根據；

如果沒有一種適當的世界經濟理論，這些理由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無論如何，這種理論觀點還處於對封閉的、單一的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分析的階段，不需要考慮上面這些因素。

決定性的論點是上面討論過的不變資本要素的低廉化，因為這種低廉化，正像資本技術構成的提高一樣，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固有的。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來預期資本有機（價值）構成會提高或降低。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明，資本家只會採用新技術，因為新技術可以在當時的工資水平上增加利潤率。一旦降低成本的技術革新被普遍接用，它會提高一般的利潤水平。

儘管我認為上述觀點是很重要的，但是這種摒棄利潤率下降的做法還是有爭議的。這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重大的影響，因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將由於利潤下降而自行崩潰。但是，這並不是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的預見的主要根據。馬克思的預見的依據是私人佔有和日益增長的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尤其是資本積聚和集中的趨勢，在日益緊密地一體化的經濟制度下，把工人集中成為越來越大的團體，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這種革命還沒有在最發達的國家裡發生，而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却在相對欠發達的國家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研究帝國主義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要解釋這個事實。

人們用利潤率下降的理論解釋資本輸出，從而解釋帝國主義，而且把它看作“調動阻碍利潤下降的反趨勢”的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利潤率的下降對這些觀點來說是非常不必要的，因為這些觀點等於說資本尋求廉價勞動和高額利潤，其本身就是很好的解釋。

競爭帶來另一個十分明顯的結果是生產價格的形成。其基本思想是：為了尋求更高的利潤，競爭中的資本會從一個工業部門流動到另一個工業部門，那裡的利潤高，資本的流入就會通過增加供應和壓低價格的方法使利潤降低。這就是說，價格會背離價值，因為，如果價

格與價值一致，那麼在那些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工業部門裡利潤率就會高，反之也一樣。這樣，競爭的結果就會形成單一的平均利潤率。

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並不能生產任何的剩餘價值，但是它們却在資本循環當中，履行著明顯的、非生產性的職能，參加剩餘價值的分割。平均利潤率乃是剩餘價值在各個部門的資本家之間重新分配的結果。政治活動與國家的職能之一就是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進行調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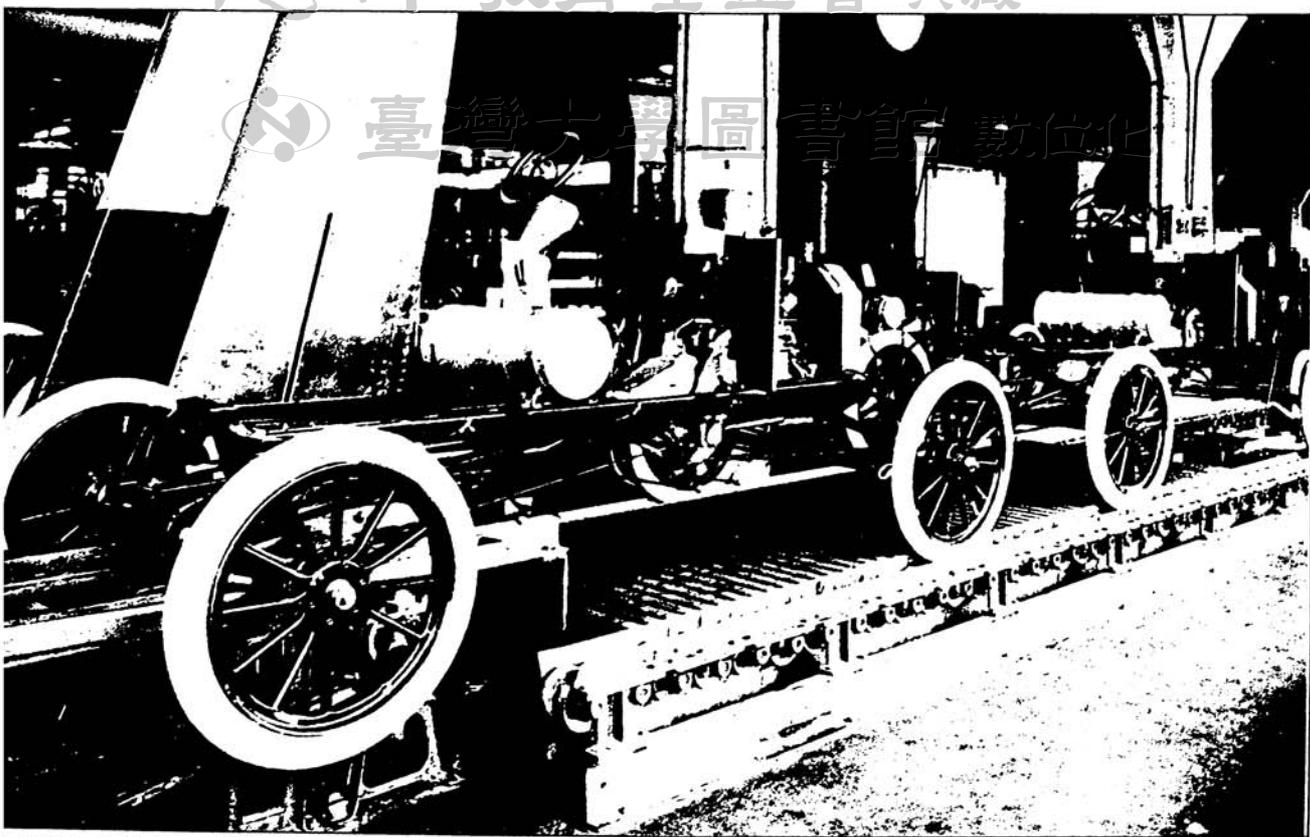
這種分析使馬克思能夠討論商業資本（或商人資本）。這是資本的特殊部分，它從產業（生產）資本那裡把買賣的職能接受過來。根據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產生於生產過程，而不產生於交換過程，所以商業資本不生產任何

剩餘價值。但是，它確實履行著一種必要的職能，因為商品的買和賣是資本循環的必要部分，所以必須取得與平均利潤率相等的利潤（來自買價和賣價之間的差額）。商業資本的利潤和商業經營費，是從產業資本的利潤中支出的。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開始時所起的作用比在馬克思對純粹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中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資本（商業資本）不是產業資本（比如紡織工業或者農業資本）的一個特定部門。它履行著明顯的、非生產性的職能，這種職能對產業資本的所有部門來說是共同的。產業廠商本身可以，而且確實履行著這種職能，它們直接相互銷售商品，在較少的情況下也賣給消費者。但從馬克思時代以來，商業資本從屬於產業資本的情況已有了很大進展。

資本的另一部分職能是銀行資本（馬克思經常把它叫做貨幣經營資本）。它履行的是多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1913年亨利·福特設立了第一條汽車生產線，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勞動強度及勞動效率

種多樣職能的集合體。由於這些職能都涉及到經營貨幣，而且促使貨幣資本的集中，這就把這些職能統一起來了。在產業資本的周轉中，資本家往往發現自己有閒置的貨幣餘額，這筆餘額必須或者當作儲備金或者留作以後使用。如果有一家銀行能夠把這些閒置貨幣全部集中起來，它就可以大大節省實際掌握的貨幣，並且將剩餘的貨幣借給那些暫時缺少貨幣的其他資本家。各個個人（歇業資本家、非資本家階級的成員，等等）的儲蓄也可以集中起來使用。

資本的這些不同部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決定著資本家階級中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部分。資本家階級內部還有其他的劃分，如按企業的大小，按不同生產部門（農業、工業等等）的資本來劃分。政治活動和國家的職能之一是在這些不同利益集團之間進行調解。

總結一下上述論點：馬克思以雇佣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關係來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定義，揭示了封閉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可以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進行自身的再生產，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具有一種由競爭所驅動的動力，它推動積累、提高生產率並促進資本的積聚。下一步是分析資本主義在最初是完全前資本主義性質的世界中如何產生和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在包括其他生產方式在內的社會形態中發生作用。

原始積累：資本主義的起源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取決於以前的社會結構，而這種社會結構在世界各地是不同的。歐洲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孕育了資本主義經濟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則不然。這主要是由於封建制度，包括一種土地私有形式，而亞細亞生產方式則建立在土地村社所有制的基礎上。馬克思這一思想頗引起爭議

。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作用的理論不能解釋它的起源。資本主義從它存在的時候起，就具有可以用抽象理論來把握住的邏輯。但是它的起源是必須放到它所出現的歷史背景中去解釋的一次完成的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決定性特徵是一無所有的、自由的工人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者的關係，所以問題的實質就是要解釋這兩個階級是怎樣出現的。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在歐洲。它被移植到歐洲移民的殖民地（美國、澳大利亞等等），部分地在那裡成長起來。在日本，它是在獨立的基礎上發展的。在世界其他地方，資本主義是當作一種往往靠槍杆子引入的異己的產物從外部進入的。很明顯，資本主義起源的這種型式在解釋以後各個時期內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軌道方面，一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沒有把這種地理上的型式看成偶然的。他提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景，關鍵是取決於以前的社會結構，而這種社會結構在世界各地是不相同的。在歐洲（以及日本），封建的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而在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在印度和中國）則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特徵。

他說：封建的生產方式的衰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而亞細亞生產方式則不是這樣。這首先是因為封建主義包括一種土地私有形式（土地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的主要生產資料），而亞細亞生產方式則建立在土地村社所有制的基礎上。“伯尼埃爾正確地看到，東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的一切現象的基本形式就在於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開啓東方天堂的真正鎖匙。”

由於對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是有爭議的，所以我在此引用《資本論》中的幾段話，以證明在馬克思看來以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對決定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重要性。這一點我將在探討馬克思論印度的文章中再進一步發揮。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在亞洲的各種形式下，高利貸能夠長期延續，這除了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以外，沒有造成別的結果。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其他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和時候，高利貸才表現為形成新生產方式的一種手段；這一方面是由於封建主和小生產遭到毀滅，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動條件集中為資本。”

“它（商業）對舊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並且，這個解體過程會導向何處，換句話說，什麼樣的新生產方式會代替舊生產方式，這不取決於商業，而是取決於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這種解體工作也是進行得極其緩慢的。在中國，那就更緩慢了，因為在這裡直接的政治權力沒有給予幫助。

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是：一方面有佔有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有除了出賣自己所能支配的勞動力外，無以維生的勞動者。這須靠資本的原始積累來達成，也就是，用暴力掠奪農民土地，使原本生產自己糧食、日用品的農民變成只能賺取工資的無產階級，從而為資本主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於是造成工業與農業的分離，生產主要為了銷售而進行，不再是自給自足。

不管是純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還是純粹的封建生產方式，都包括農民家庭為本地使用而

進行的生產，它們生產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同時還養活用超經濟強制榨取剩餘產品的統治階級。在封建的生產方式下，主要的社會關係把每個人（或者說是家庭；權利和義務的繼承常常是世襲的）聯繫起來；地主有權佔據一定的領地，而且可以通過勞役的、實物的和貨幣的形式榨取地租，剝削這塊領地上的農民。與此相適應，每個農民都被束縛在特定的土地上，他們有權耕作這塊土地，也有相應的義務為地主提供剩餘勞動。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聯繫發生在國家（代表著統治階級）和村社之間，村社佔有土地，按照慣例把土地分配給它的成員，並受到“稅租”的剝削。與兩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政治組織反映了其經濟組織上的差別；封建主義的特點是在許多半獨立的封建地主之間“分割”主權（這個措詞來自安德生《專制主義國家的世系》），而亞細亞社會則是“專制的”。關於亞細亞方式的概念，自馬克思以來一直被人們忽視，最近關於這個概念的討論復活了。關於這一問題的更充分的探討，請參看克拉德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安德生的《專制主義國家的世系》。

這兩種生產方式的概念中都存在著一些難點。適用於歐洲的封建的生產方式的概念已經很好地確立起來了，但是它的定義是有爭議的（參見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正像資本主義的定義有爭議一樣。這些爭議主要來源於對西歐以外的社會所提出的分析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並未很好地確立起來；安德生在《專制主義國家的世系》中竭力摒棄這種概念。問題的一部分在於：封建生產方式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分界並不像乍看起來那樣明確，因為有許多土地佔有形式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中間形式。總之，在資本主義滲透以前，亞細亞經濟組織形式的真實歷史十分複雜，而且很少為人們了解，所以歐洲與亞洲的差別仍然有待於解釋。

隨著封建制度在歐洲的解體，它變成了獨立的農民生產者的社會，有些人給地主交付地租，地主還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牲畜，等等。當



● 印度民衆燒燬英國進口貨物，進行反殖民示威活動。

時存在著維持生計的農民生產、為本地使用的手工生產和為市場而進行的小規模生產，所以生產是混合的。但是，封建主仍以地租形式對土地享有某些權利，並且對公共土地擁有沒有規定的權利。

具有決定意義的階段是這些（私人擁有的）封建權利轉變成完全的土地私有權，包括剝奪土地佔有者的權利；這種權利一般說來在典型的封建社會制度中是不存在的。

資本主義決定於一無所有的自由工人與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關係。通過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生產資料便集中在地主手裡，同時被驅趕的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而以前在自給自足單位中進行的許多活動的相互分離創造了市場。接著，馬克思抽象地闡述了這個過程的邏輯。列寧在與民粹派的爭論中，也進行了頗為類似的分析，表明資本主義是如何創造（國內）市場的。實際上，在此同時發生了其他變化。

馬克思的論述主要適用於英國，其他國家則有不完全相同的發展。馬克思還強調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其他要素如：掠奪殖民地、奴隸貿易、為奪取美洲金銀而奴役、剝滅當地土著等。馬克思也強調國家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用暴力鎮壓工人階級，壓低他們的工資。

首先，農民大部分生產用於維持他們自己生存的產品（包括農村手工產品），只是將剩餘部分拿到市場上交換。他們與城市手工業者進行小規模的交易。地主除了把地租花費在維持僕人等方面外，還用地租購買農民的產品和質量較好的手工產品。

在驅逐農民之後，少數的農業工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產同樣多的糧食，他們的生活水平更低；因此剩餘的農產品增加了。大多數被剝奪的農民成了城市或者農村工業的僱傭工人，

他們吃的是剩餘農產品。他們的產品可以（由雇主）賣出去，因為前資本主義的農村手工業已經大部分垮台了，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者可以進入的空白。

如同馬克思所說，這個過程原則上可以在生產力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完成：用同樣的生產方法，在同一塊土地上，使用同樣的生產資料，生產同樣多的產品。所發生變化的是：生產的社會關係已經完成改組了。以前，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直接使用而進行的；現在，工業與農業、城市生產與農村生產已經分離，而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銷售而進行的。以前，生產者佔有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現在，他們是沒有財產的、掙工資的勞動者。

馬克思把這個過程叫做資本原始積累。這裡積累的意思不是創造以前不存在的生產資料。從整個社會角度看，這根本不是積累。它之所以是資本原始積累，是因為原來不是資本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現在轉化成了資本。“我們知道，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

當然，這個過程實際上經歷了很長時期，在這期間，生產方法在發生變化，其他力量也在瓦解前資本主義組織形成中起了作用。以上的論述是一種抽象。

轉變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解釋的另一個方面，是資本主義農場主的起源。英國是一個典型，地主不像資本主義農場主那樣自己經營全部土地，而是把土地租給雇傭著農業工人的資本主義的租地農場主。這裡，馬克思的論述頗不清楚（歷史事實上也是如此），但是，似乎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租地農場主首先來源於富裕農民，他們在圈公地的鬥爭中與地主聯合在一起，這個階級後來有一個俄文名稱，叫做Kulaks（富農）。

我們還應該注意另外幾個。首先，馬克思的論述主要適用於英國——第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例如在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建

立了自由農民制度，農民主要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而資本主義農民的發展緩慢。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殊的環境。

第二，馬克思強調了其他因素（同時總是把主要的著重點放在無產階級的形成上）：從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掠奪的財富流入英國，世界市場的建立和商人財富的大量增長，等等。這些因素的真正作用是不十分清楚的。財富的流入估計可以使將來的資本家更易於集中足以開始經營的資金，並且使它們逐步擴大，財富的流入也促使土地所有者階級的實際成員同靠收買沒落的負債的大封建主財產起家的暴發戶之間的地位顛倒過來。所有這一切對於不可抵抗的、但仍然十分緩慢的資本主義的進步起著潤滑的作用。

現在的許多作家，尤其是巴蘭和法蘭克完全顛倒了馬克思在這裡所強調的重點，認為掠奪的財富流入歐洲是資本主義起源（以及資本主義不能在別的地方發展）的主要因素。馬克思確實對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國內因素和國外因素都進行了探討，上述看法只不過是一種可能的解釋，我認為這種看法既符合馬克思論述的邏輯，也符合他的論述的分量。強調國外因素，同描述以世界範圍內中心與外圍的劃分作為決定性特徵的資本主義是相一致的，但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定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第三，馬克思強調了國家的作用。國家在原始積累過程中的主要作用（除了為驅逐農民提供合法後盾外）是鎮壓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階級，壓低他們的工資。

“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制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係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